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19年第1期（总第139期）

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 任

万小朋

副 主 任

尹晓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王海燕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张 军 张近乐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 丹 陆 风 刘 怡

田 锦 王 鹏 程凯丽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月

目 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 张耀灿 1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角

/ 杨尚勤 龚玉朝 7

高等教育研究

培养目标达成：关于大学教学原则重构的思考

/ 睦依凡 15

大学故事积淀成就了大学文化

/ 叶志明 陈方泉 杨 辉 27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研究

/ 岳昌君 邱文琪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探讨
/ 秦 燕 葛 曲 40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反向融合：传统媒体衰退背景下新闻业的边缘化与未来进路
/ 丁和根 48

论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
——以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为重点
/ 陈爱敏 57

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
/ 季 淳 65

跨文化的“翻译诗学”对话：傅雷、本雅明与梅肖尼克之理论探索
/ 姜丹丹 74

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构建
/ 邢会强 银丹妮 82

数字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与国际贸易的法律治理
/ 李 娜 沈四宝 90

军民融合研究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及实现
/ 杜人淮 申 月 97

建立基于应收账款的军民融合授信增信体系问题研究
/ 刘硕扬 张健光 106

CONTENTS

Several Basic Issu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Zhang Yaocan</i>	1
Discus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i>/Yang Shangqin Gong Yuchao</i>	7
Achievement of Training Objec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ing Principles <i>/Sui Yifan</i>	15
University Culture comes from University Stories <i>/Ye Zhiming Chen Fangquan Yang Hui</i>	2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Gaps of College Graduat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i>/Yue Changjun Qiu Wenqi</i>	31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i>/Qin Yan Ge Qu</i>	40
Reverse Convergence: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Future Approach of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Media Recession <i>/Ding Hegen</i>	48
On Metropolitan Drama and Urban Spirit: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Metropolitan Plays As A key point <i>/Chen Aimin</i>	57
Origi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Tsung Chi</i>	65
A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al Poetics" Dialogu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Fu Lei, Benjamin and Mesehonnig <i>/Jiang Dandan</i>	74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Robo-Advis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Xing Huiqiang Yin Danni</i>	82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Leg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gital Age <i>/Li Na Shen Sibao</i>	90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Cluster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Du Renhuai Shen Yue</i>	97
A Study on the Issue of Establishing Credit System for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Based on Accounts Receivable <i>/Liu Shuoyang Zhang Jianguang</i>	106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张耀灿

摘要: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高度重视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问题。二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三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问题。四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拓展问题。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意识形态性; 科学性
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01-06

党的十九大,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应当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积极拓展服务社会的新渠道。

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以更好地完成高校作为立校之本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高度, 形成了以“大宣传”“大思政”为核心的工作思路。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党校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全国教育大会、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会议, 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的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讲话。这些讲话突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形成了“大宣传”“大思政”的思路格局,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2016年2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 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创新方法手段, 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新闻宣传工作以及其他引导民众思想的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这些工作都应当自觉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不断创新, 服务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高度重视“大

作者简介: 张耀灿, 男, 广东南海人,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的工作思路，中央专门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同志的“大思政”思路反映特别明显。比如，以专门队伍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是专门力量，明确强调必须立德树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其他的老师，包括各门业务课任课老师、各级干部的工作也都应围绕立德树人，这就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落实课程育人是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核心环节，课程育人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这些思想的指导性很强，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指导性。再比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下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简称31号文件），在“全程、全方位”基础上，加了一个“全员”，构成“三全育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三全育人”“大思政”的思路在该文件中体现得非常鲜明，更是成为直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用这一思想来指导，还必须坚持以完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的深化、拓展、升华。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沿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彻“大思政”的思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首先要学习、消化、领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高校思想工作，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的。

我们应当坚持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注重把个人或他人学习、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加以研究和总结。这样，不仅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而且也是党中央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要求。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指导新实践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有的学者说是首要政治任务，从研究的角度说，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首要政治任务。

二、正确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关系

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工作与实践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这两者之间必须高度结合，实现高度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但是也不能仅仅考虑意识形态性。如果仅考虑意识形态性，搞空洞说教，或者仅立足于、局限于课堂教学，或者搞硬性灌输，那么，显然效果不好，而且也没有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全程、全方位”以外，还提到，要运用新媒体和信息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要讲究科学性、艺术性，也要让大家喜闻乐见。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科学性就是要把这一教育提高 to 增强有效性的高度，即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科学性首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真理性，没有真理性，显然不能说服人，理论不彻底也不能说服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引导大学生如何做人，又要增强他们做事的能力，积极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正面鼓劲为主，这就是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讲究恰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方法、载体、技巧，要让学生喜闻乐见，达到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程度，也就体现了美的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要求体现创新性。实践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创新便是搞好工作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认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提倡理论创新和

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3]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体系,创新是灵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不仅表现在学科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话语体系创新,而且表现在内容创新、方式创新、手段创新、载体创新、基层创新等,其中,基层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落实到基层,还要“抓小、抓细、抓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应用学科,更要求“抓小、抓细、抓实”,不能搞形式主义,否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难以体现。

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学术性、科学性是实现意识形态性的依托、基础。意识形态性必须依托科学性,没有科学性,不但发挥不了意识形态性的导向作用,而且会适得其反,损害意识形态性的形象,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目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科学性,科学性作为条件和依托,又能落实、保障意识形态性的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持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高度重视基础理论。要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高度升华实践经验;基础理论研究做得越好,其实践指导价值就越大,指导现实的力量就越强。我们对待《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写作,就坚持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原则。编教材或者写著作,首先是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理论的总结概括,从根本上看,都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凝炼,并对实践经验做理论升华来实现的。基础理论越是总结得科学,抽象得科学,它对实践的指导越有价值。因此,在现在的学科建设中,在教材编写、专著写作中,把基础理论研究得越好,它的应用价值就越大,指导性就越强。如果理论很科学,它首先就是原理性的,具有很强指导性。不能把理论、原理视为一种说教,理论、原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那种不联系实际、照本宣科、打官腔,就是一种空洞的说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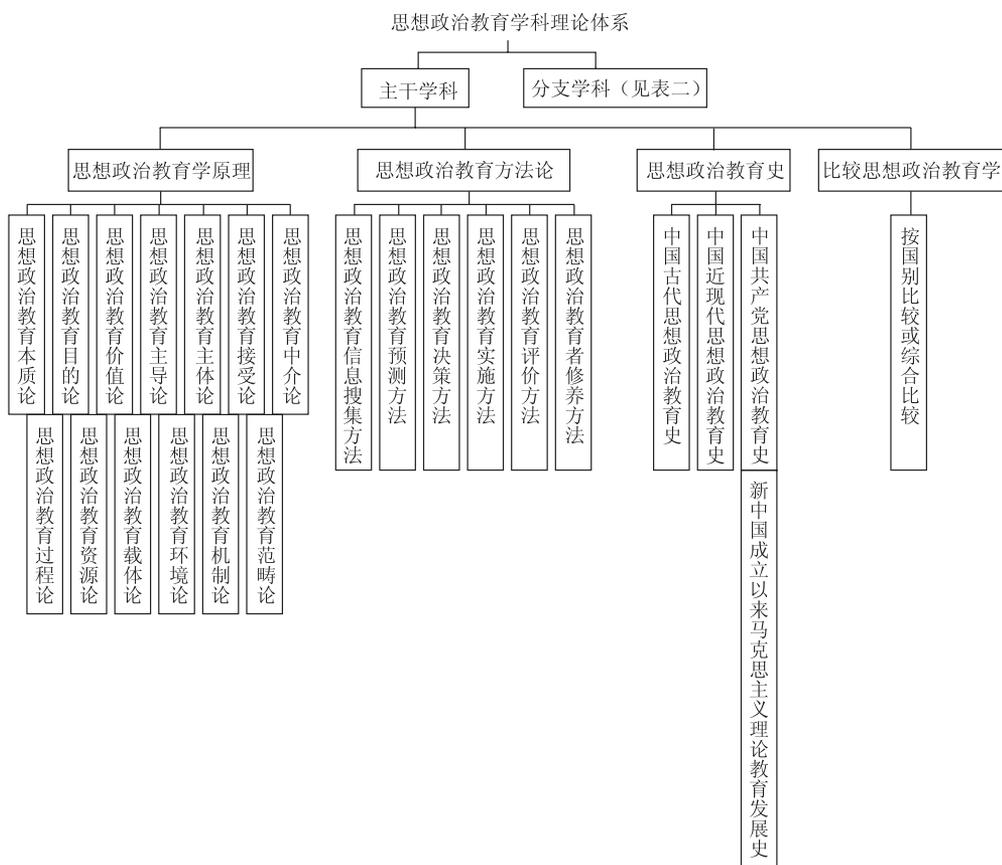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有学者主张要发展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比如,弱势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但是,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学总体上说是一门应用科学,相对而言它还是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不能以发展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来否定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应当坚持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和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可以用三个图表表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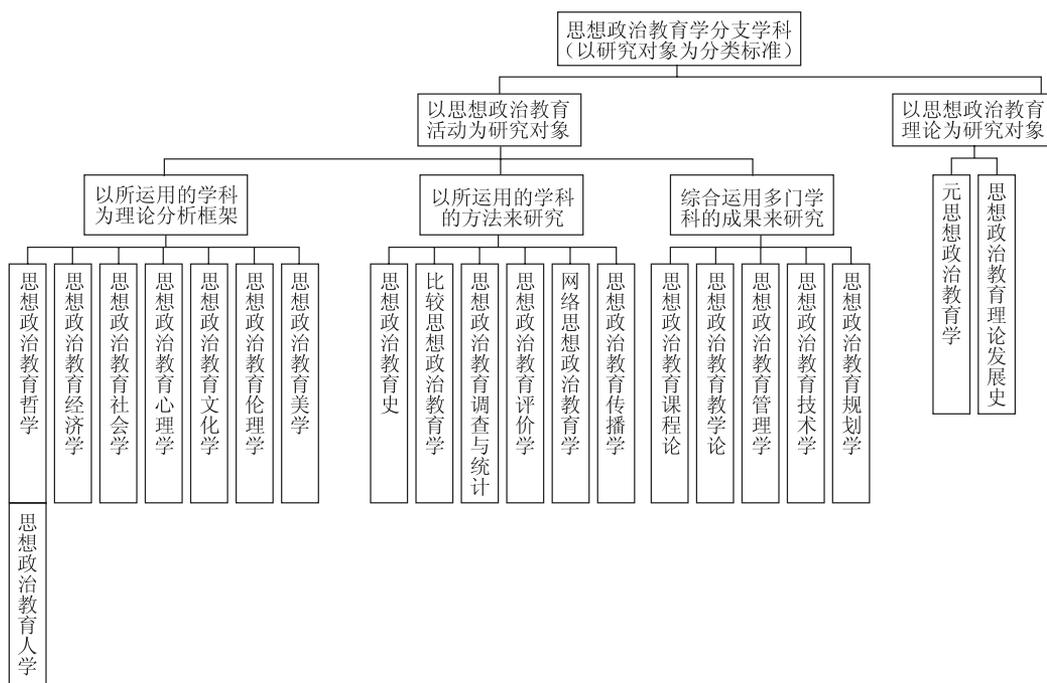
表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主干学科),这些主干学科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史可以研究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国外的相关学科加以比较,借鉴、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避免其中的失败教训。例如,西南大学白显良教授,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借鉴国外的隐性教育的概念,着力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构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这也是借鉴国外教育思想的例子。表二,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等。表三是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其分支学科可以分群体进行研究,如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国有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研究、私营企业的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研究对象不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对象是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具有独特性,它的应用和规律要考虑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探究其有机统一路径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它的特殊性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否则其有效性难以获得提升。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除了分群体研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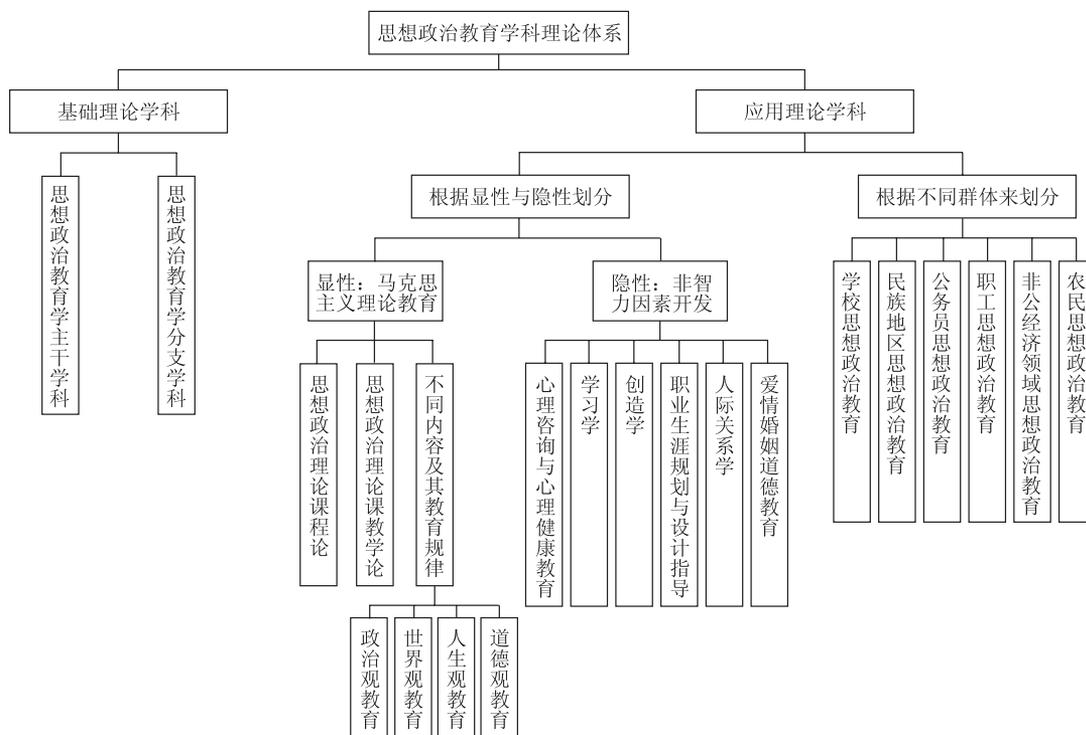
表一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主干学科图示



表二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分支学科图示



表三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分支学科图示



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分支学科，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还有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这些都可以看作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分支。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测评体系研究》，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评估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测评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上——过去是闭卷考试，后来是开卷考试。这个测评要考虑多种测评形式，思考如何提高测评的多样性、科学性、有效性、导向性，这是应用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他方面，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的研究，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有些学者把这三个规律分别作为课题来立项，有的深入研究课程育人等，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发展创新，很有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先进经验推广研究结合起来。对于一些比较科学的、先进的理论成果或者实践经验的

总结，如何推广，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学者从事先进理论或先进经验的推广研究，从事科学成果的推广研究，这种理论推广的方向，或者向生产力转化，或者向实践转化，这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当得到重视和加强。

四、积极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社会新渠道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任务，除了搞好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社会服务。高等教育的五个功能作用，在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中都要全面体现，但是弱项就是社会服务。

首先，社会服务应当积极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阵地、摇篮，是培养中高级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主要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 积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地服务社会。

其次, 在当地社区、中学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服务的首要任务。社会服务不仅是宣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还包括其他一些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的实践活动, 如多种多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也是一种用实际行动在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宣传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这一活动是运用了先进典型, 发挥榜样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也是红色文化、榜样文化的一种体现。

其三, 积极传播和弘扬“红船精神”, 红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把“红船精神”, 红色文化融入各种高校学生教育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去。现在新闻媒体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旋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就是要坚持和弘扬“红船精神”, 红色文化。传播和弘扬“红船精神”, 红色文化, 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而是应该多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形式与活动形式, 多总结一些群众创新、创造的优秀经验并加以理论提升、实践推广, 从而更好地促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好地推进“立德树人”中心环节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 2018-9-11(1).
- [3] 习近平: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N]. 人民日报, 2016-2-20(1).
- [4]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N]. 人民日报, 2016-12-8(1).
- [5]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 光明日报, 2016-5-18(1).

Several Basic Issu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Zhang Yaocan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issues in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ideological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hird i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ourth is about the channel expa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deology; Scientific Social Services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角

杨尚勤 龚玉朝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在作为一种价值观所具有的主体性和时效性上,它在传承中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进行着价值转型,并以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面貌呈现。转型的目的在于价值的实现。当前,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自身的价值在当代获得实现。

关键词: 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观;辩证关系;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07-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在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争相登台争夺思想阵地的今天,从价值论的视角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对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述现实问题,把握价值观更新的背景,实现文化自信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作为一种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对于世界、人生、社会的看法,包括道德理想、精神特质、审美标准和生活态度,而这些恰表征着价值观的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

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2]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时代性色彩。从这一层面上来认识传统文化,它的核心就是一种价值观。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

第一,作为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脱离主体——人而抽象存在的。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有着各种需要、背负各种目的,从而创造各种价值。在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构成了活动结构的核心要素,因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揭示了价值作为主体性现象的本质,这也是认识传统文化的前提。对于主体而言,“对他来说对象如何成为他的对象(客体),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3],这里的本质力量就是人的独特的需要系统。客体要纳入主体的视野,就必须放在主体需要这个“容器”内,才能显示出“地位”和意义。坚持价值的主体性,把文化当作一种主体性现象来理解,是指价值、文化应为人而存在,物的价值为人

作者简介: 杨尚勤,男,山西稷山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龚玉朝,男,河南信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所赋予。人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4]，因此，物之所以具有让人愉悦、高兴等属性，有被人使用的价值，并不是物自身的尺度决定的，而是人的尺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若撇开其主体性单方面的从文化自身的含义和特性出发，就文化而论文化，就是没有理解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的本质。正如“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鲜明指出了文化的人民性，即文化扎根于人民，本质上是“人化”，作用是“化人”，其形成和发展都是主体人的发现、创造、传承、认同，并反过来指导人的社会生活过程，正是在“人化”“化人”的过程中，文化才被赋予了生命。因此，只有把文化看作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才能从主体的需求结构中去历史地、辩证地理解文化，才能分辨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优点和缺点，哪些过时以及哪些需要继承，这样才能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源于主体的多元性，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根据也来自于主体的共同性。不同时期、地域民族文化的冲突、交融都是以主体的差异、交往为根本基础的，正是在此前提下，中华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其独有的多元复合性。总之，忽视了文化的主体，不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无法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时效性。价值具有时效性，这是对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的有力肯定。一方面，价值是即时的。某些价值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续，否则就不能称作这种价值或不再是价值。比如，食物超过一定的保质期就会变质，从而失去营养价值。尽管食物营养价值的消失与食物本身的性质改变有关，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改变导致食物本身已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主体的需要在价值关系的变化中才是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存在。另一方面，价值是持续的。有些需要是某一类主体或不同层次上主体共同的需要，这种需要所形成的价值就具有持续性。一些价值如安全、公正、和谐，之所以具有持续性，本质上说还是因为它能满足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的共同需要。价值的时效性

体现在即时性和持续性的辩证统一，是价值在历时态中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彼此关照。因而，我们在认识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时，也应从价值的实效性出发，做好传承和创新。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于中华民族过去创造的、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包括书籍中记载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中流传的文化都要认真梳理和总结，尤其是至今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文化。另一方面，则要着重揭示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对于先人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影响现代人的，特别是那些“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的传统优秀文化，使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并“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8]。中华传统文化，总是借助于当下的解释，对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作用而产生价值。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要适应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传承”这个概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既需要“传”，也需要“承”，传和承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传承而言，传的一方是古人、教育者、长者和师者，承的一方则是今人、受教育者、晚辈和学生。这种代际关系规定了传者是不“在场”的教育者，他们的价值观念是被学习的对象，是“不在场”的古人要传给后代的。从民族的延续发展上看，每一代人的成长都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而不断成长，正是一代代人的学习、更替，传统文化才得以延续。但是也应该看到，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古人、前代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理解，今人、后代人未必都能承下来。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今人总是会以自身所处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发展条件为根据对价值作出判断、选择，进而对原先的价值观进行添减改造，或形成新的价值观。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现代性表达”，在不断变革中

得到延续,即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用以阐述理念、推动发展,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源于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才获得了源头活水,才在不断变革中绵延不绝。当下,更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当作一成不变的认识是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的表现。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型:当代中国价值观

价值观是价值方面的自觉意识,而非对需要的直觉和直观。^[10]相对于价值,价值观是人特有的精神状态,是人关于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的系统。^[11]所谓当代价值观,就是从当下社会生活的创造者——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说明一定主体的意识对于各种事物、事件价值的选择与判断,是人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存在物的目的和过程是真、善、美或假、恶、丑的“理由”和“根据”。在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判断和选择的活动中有些行为的理由或根据不是那么明显的,而是隐蔽的,特别是在非理性的情感活动评价过程中,看似没有什么根据可遵循,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可以讨论和交流,并可以适用外部方法加以认证的社会意识。总的来说,价值观建立在当下思维的、观念的、具有社会共同方式的自觉水平上,它是关于社会中各种价值关系的认识,本质是对这些价值关系运动的体现,是主体在对各种价值关系进行体验性意识活动中形成的,这同时也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社会中的价值关系运动是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场景”,传统文化则充当着社会“背景”的角色^[12],诸如一定社会、组织及个人作为价值评价、判断、选择的主体,均有着特殊的社会生活阅历、个性的需求结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上述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而形成的,其具体的特质也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于主体而言,在其具有独立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之前,首先是一个“受体”,是被教育、被塑造的对象。前人总是希望用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来影响后人,这包括如何使用语言文字,如何理解各种标志符号,学会用既定的规矩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等等。不仅仅是道理方面的教育,而且通过行为示范的作用,通过一定的奖惩制约,通过舆论的引导,使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形成本位意识,树立起既定要求的欲望、情绪、意志、信仰、理想等,进而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正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有计划地学习和耳濡目染,使自然主体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体,即塑造出了能够认同既有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体。这种塑造的方式对于主体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影响终生的。塑造从内容方面而言,就是用传统文化教育人的过程,是后人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化人”作用形成自身价值观的过程。正如“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3]那些把个人的价值观念看作是先天具有的观点,就是忽略了文化在价值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这里的“历史”包含着价值观念,“条件”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制度、伦理的基本意识框架,也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划定了基本范围和方向。对于一个民族、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有先天的文化“基因”,都必须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它,然后才有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才能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评价、吸收和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其接受的基础之上,是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和其思想精

华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5]因而,中华传统文化对主体的影响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一厢情愿”地忽视甚至是否定。从这层意义上看,对于当代国人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而言,要不要科学对待、正确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和要有效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现实价值关系的运动,每一代人都有着特殊的需求结构和现实问题,因此他们在作为价值主体对自身的需求结构进行判断,对社会问题进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特别当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选择后的价值体验和结果总是与既定传统价值观念相背离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对这些既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论证它们存在的正当性,进而抛弃一些传统价值观念,重新形成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毕竟,从价值的本质上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只能通过主体的实践和认识的方式进行展现,此外不存在其他方式。因而,主体的直接体验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相较于传统的价值观,它起着一种判断、筛选和验证的作用;对于新的价值观而言,它反映了主体的内在尺度和实践活动的特性,是主体对其的角色定位、社会功能,包括社会活动中的权、责、利关系进行充分的认识的外射显现,是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内在规定。而新价值观的形成是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的,它们正是在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作为传统价值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替代,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反叛,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扬”体现了新文化、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弃”则是新文化、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抛弃、修正,是某一传统文化发展的中断。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我们党始终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不搞以古非今、简单复古。认为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6],这就必须“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7]。现行的价值观总会受到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形成一定文化的鲜明民族特质。

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各具特点,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全貌,这些价值观的特点也即民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我们不能脱离整个传统文化的全貌来理解某一历史阶段的价值观,也就不能把某一时代的价值观等同于整个传统文化应具有的特征,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在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即使我们为了概括其时代特征而把当下的价值观在一定场域内归于统一体,也必须清楚,这不过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需求,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也往往彼此之间是异质而非同质的,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不仅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价值观存在差异,而且同一地域的不同阶层,其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关键是从哪一个层次、哪一类主体出发来对价值观进行界定,实质是合理地进行文化比较。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何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应对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会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和情感特征,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所特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形成新的文化。这既是接受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也是不断更新价值观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转型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结构转型,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随着个体意识觉醒,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转型的过程并非总是和平地实现,而是一个充满着价值观冲突的过程,尤其是新旧主导价值

观的整合和分化更为明显,在这一个过程中,文化是不可隔断的,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主导价值观更新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精辟论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看来,新价值观尤其是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虽然伴随着冲突和矛盾,甚至是暂时表现出一种颠覆传统断然决绝的态势,但从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这都不过是传统文化演进总体趋势中所呈现出的分离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健全,文化自信的增强,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状态会被逐步克服,因而价值观的整合和分化是螺旋式上升的,总的来看,主导价值观的分化总会被新的整合所代替,整合多于分化。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上述的状态。第一次是在孔子称作“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中,把“克己复礼”作为己任,这里的“礼”指的是传统周礼,结果他周游列国而四处碰壁,至秦统一六国,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形成。第二次是佛教从外来文化逐步演化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自东汉佛教东来,至唐代发展至鼎盛,一时间信者众多,形成“中国佛教”一枝独秀,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正统形成了严重威胁。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许多士人担心中华传统文化被其所吞没,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倒佛灭佛运动,但既没有将佛教文化灭掉,也没有出现佛教一统天下,最终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合流,实现了一次文化大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后来的元朝、清朝时期,虽然少数民族借助军事实力问鼎中原,在政治上处于优势,但他们的文化并没有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产生威胁。到了清朝末期,由于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等因素而逐步落后于西方。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工业文明随之进入,中华文化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劲敌。在持续了近百年的文化较量中,中华文化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也一直处于守势。一方

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像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沧桑巨变一样。中国社会逐步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待家庭、国家、世界的看法都与百年前判若霄壤。另一方面,在百年间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百年来,在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8]。21世纪是一个文化改变世界的时代,“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9]“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尤其是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从与各民族进行交往中的对比上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我们不能说今日的中国已经从一个文化大国转变为了一个文化强国,也不能说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完全融入到了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今日之中国,已经吸收了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某些领域已经到达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继承与创新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合理的形式将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形成文化的新民族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个人成长进步的传统,人民群众是主体。传统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立足于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明确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不仅如此,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盲目热衷,片面鄙弃传统文化的现象,试图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加速遗失,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巨大压力;二是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下降,对传统文化的珍视程度日益减弱;三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不够清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解释不足,用传统文化关照现实文化的途径还很单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变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更新总是相辅相成,文化的演变酝酿着价值观的更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则指向了对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作了概括。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 展,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不断融合、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处于动态的更新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因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1]那么,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汲取哪些方面的内容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析的问题。

对于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传统文化,不断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内容,让人们在已内化于心的价值基因中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 展,为我们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遵循。我们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来分辨、提取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文化建设和道德培育,以此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任务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结,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我们涵养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其他的价值观,因而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各种价值观念频繁交流和激烈竞争的当

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能站得住脚,能吸引人,就要有民族特色。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的制度安排、社会理想和文化选择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例如,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邦本”等饱含民生民本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升华为党的群众路线,用“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来解释党的思想路线,用“民亦劳止,汙可小康”中的“小康”来论证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和合”“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思想的创造性发 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在逻辑理路、价值理想和标准等方面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许多契合点,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发 展中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要注重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 展了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为了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批判地继承,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一是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在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搞清其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既不能一味地否定,也不能全盘复制,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和时代分析法,做好传统文化的扬弃,使之较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中;二是坚持在社会发 展中不断解构和重构传统文化,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的过程,使其获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适应的内涵;要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有借鉴价值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和陈旧形式进行不断的现代化改造,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新表达形式。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多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内涵上看,我们应从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维度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社会伦理哲学,以及关于个体德性之教化与培养的思想。这些人文精神、价值资源,诸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以及爱国、守法、创新等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积淀,代表着中华儿女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无论是从国家、社会、个人哪个层面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最终都要立足于个人,都要从个人良好道德的培育出发。因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如何让社会道德原则内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行为,这一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而独到的探讨和解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个体道德的培养,从个体道德培育的目标、意义和途径三个层面出发构建起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个体道德培育的目标在于成为君子,即具备“智”“仁”“勇”三德;在儒家文化中,施政的目的在于“以道得民”“以德服民”,能够成人、成德,施政者应能够引导民众实现理想的人格,而非仅仅从经济、军事的角度为民众提供保障。因此,理想的君主应为拥有完备德性的圣贤,个体道德培育则成为“王道”之治所采取的关键路径,此为个体道德之培育作为儒家文化的旨趣;儒家文化虽以“六艺”为教,但重点不在于知识性的学习,而在于德性涵养和化民成俗之用。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这表现在对“礼乐”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儒家文化以礼乐作为个体道德培育的基本途径,通过礼乐教化来使人向善,达到“成仁成圣”的理想目标。

总之,我们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结合社会现实,又要引入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并注重从个体德性之教化与培养方面来借鉴吸收传统文化蕴藏的有益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达到超越以往的“新”境界,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由此自身的价值在当代获得了实现。^[22]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 [2]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21(1).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9.
-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
- [10]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30.
- [11]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5.
- [12]马俊峰.价值论的视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502.
- [13]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2-26(1).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17.
- [1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5-5(1).
-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5(1).
- [18]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7-13(12).

[1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1).

[2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1).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22]王泽应.论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伦理学研究,2015(1):6-10.

Discus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Yang Shangqin Gong Yuchao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flected in its subjectivity and timeliness as a kind of value. It adapts to requirement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rries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and presents itself in the aspec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The transformation aims to target the value. At present,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absorb the thoughts and idea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ral norms from the individual, soci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cultivate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uld be transformed in a creative way, and its own value could be achieved in the contempora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Value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Value Realization

培养目标达成：关于大学教学原则重构的思考

眭依凡

摘要：教学原则是在大学教学活动中引领和规范教学过程不可或缺的教学理性，针对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原则已出现衰微的问题，在讨论大学教学原则为什么重要、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原则的关系何在之学理性分析基础上，提出大学教学原则有必要重构的学术观点，以及教学原则重构必须遵循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学生创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养成的原则。

关键词：大学人才培养；培养质量；培养目标；教学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1-00015-12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良好的教育，另一是不良的教育。两种教育其效果截然相反。换言之，教育是把双刃剑，其一面是造就人、塑造人格、发展才智的天使，另一面则可能是摧毁人性、扭曲心灵、扼杀智慧的恶魔。大学教育亦然，所以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在其《笔记》中说：大学能培养一切能力，包括愚蠢。但是作为一名大学理想主义者，笔者一直倡导并坚持“学校教育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发明”“学校教育是一项以改善、提高、发展人的素质为旨要的伟大事业”^[1]这一学术观点，由此演绎可以得出结论：学校是一项绝不能出现“次品”的人的“生产”的社会活动。英国有位哲学家曾这样告诫教师：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能轻犯，教育上的错误如同配错了药一样，绝不能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生洗刷不掉的。而我国台湾作家张晓风对学校教育的得与失亦有形象比喻：教学改革之可怕有如女人整形，整坏了连一张本来勉强可看的脸也没了。

学校教育之重要决定了以实施教育为己任的教师极其重要。所以，古语有云：“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又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正是教师之于学校教育的得与失及成与败具有决定性，具体言之即每个教师其言其行都可能对自己的学生造成终身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故教师必须具备优良的德才素质以避免不良教育在学校的发生，大学亦然！由于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而教学工作是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其他不能替代的基本途径，教学之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决定了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在人才培养活动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法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教育的成功取决于教师，教育的不成功也归咎于教师。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好教师与好学校一样不可或缺。

大学老师是从事通过与学生密切的思想和知识交流的教学活动从而被大学生认可或被否定的极富挑战的职业。由于大学教学绝非是一项简单的知识传授的过程而是涉及诸多教学要素共同参与且彼此交互影响的高度复杂的人际交往活动，如果教师不能富有成效地满足学生求学探知的需要，即胜任教学，颇具质疑批判精神的学生则可能采取两种选择：不来甚至不再听你的课或来了也不听你的课。如同失去了学生的大学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

作者简介：眭依凡，男，江苏镇江人，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

样，失去了听课学生的教师不可能是称职或胜任的教师。

在信息化时代，虽然学生的知识积累及能力发展即获得学业进步的途径多样化，但大学的课堂教学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途径，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由此决定。由于大学的教学过程绝不止于知识的传授，还有人际情感的交流、科学态度的养成、思维方式的影响、学术文化的熏陶、专业兴趣的培养、问题敏感性及破解难题意识的形成、师生品性的展示等等诸多影响的附加。由此可以推断，大学的教学活动之于大学生身心发展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并非单一的而是具有整体性。一个优秀教师的教学甚至一堂课的作用或许就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人生。事实亦然，譬如笔者在早期关于科学家教育思想研究中就发现，不少科学家就是在学校受到名师教学的启蒙，产生了影响其一生的学科兴趣，并对该学科有了经久不衰的热爱，进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以上讨论足以说明教学的意义及其作用之大。然而，大学的人才培养是既复杂又极富个性化的人际交往过程，其活动主体教学没有唯一的成功定式。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大师讲课的方式虽“千奇百怪”，但无不受学生的欢迎和喜爱。综合有关资料记载：辜鸿铭上课时要对学生约法三章，他进教室学生须起立，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方能离开；要求学生背诵课文，授课时若背不出要一直站到下课；讲到得意处他还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梁启超给清华学生上课，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己，或掩面或顿足或狂笑或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而声震屋梁，而悲伤处则痛哭而涕泗滂沱，学生说听他的课是种享受。陈寅恪上课常常喜欢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膝头另一只手放在椅背上，说到精彩处自个儿发出笑声。刘文典是个学广才高、倚才自傲的狷介狂生，自诩为全世界两个半《庄子》研究权威中的半个，他讲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且一支接一支，虽旁征博引，但一小时只讲了一句；他教《昭明文选》，一学期才讲了半篇内容玄虚的《海赋》。沈从文第一次上讲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口，10分钟后才开始念稿子，一个小时的课程内容10分钟念完

后望着大家无话，最后在黑板写道：今天第一次登台，人很多我害怕了。闻一多喜欢把早晨的课调到黄昏上，说这样有气氛，他讲课好像说书有声有色，比手划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速也愈来愈快。一阵热烈激昂的演讲之后，他会压低嗓音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学问渊博为文古奥，然性情怪僻，教学方法亦有问题，因其湖北口音学生听不懂，故他从不布置作业甚至还不肯批阅试卷，据说教务处催急时则写一字条“每人80分”上交了事。金岳霖的课亦很有个性，有次被沈从文请去讲《小说与哲学》，大家颇为期待，不料他讲了半天最后的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北大的文字学由新派钱玄同和老派黄侃分别执教，听钱玄同讲课的学生不时会听到对面教室同时在讲课的黄侃大骂钱玄同，钱先生闻之并不在乎，照样讲自己的课。

大师的课堂教学虽然风格迥异，但均不失吸引学生的魅力及让学生从中受益的实效，其奥秘在于他们的教学均重视并遵循了教学的基本规律及恪守了必要纲领，而后者即教学原则。由此足见教学原则的重要。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教师似乎已经不在乎教学原则了，其后果是大学的教学活动的魅力似乎渐渐呈衰微之势，此即思考和讨论大学教学原则问题之必要性。本文提出并讨论三个问题：大学教学原则为什么重要？培养目标及其达成与教学原则的关系何在？基于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教学原则重构应遵循哪些原则？

二、大学教学原则为什么重要？

大学专业教育的属性及其教育对象是身心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且具有相对独立自主诉求及较强思辨判断能力的大学生这一事实，使大学的教学活动具有了多样性并由此导致人们对从大量大学教学实践提炼出来的有较强一致性要求的教学理论包括教学原则的忽视。然而，大学的核心使命即大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理由就是人才培养，而教学活动是人才培养最不可或缺的途径，由此决定了教学活动是大学最为重要也是最为频繁的一项活动类型，是大学通过教师对学生发生影响从而达成人才培养目标

的基本手段。教学的重要性由此凸显，而教学原则不仅是教学规律的反映，更是旨在在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指导教学活动富有效率进行的理论基础。

（一）大学教学原则之重要的学理性分析

早期人们把大学的社会职能归纳为“教学、科研及服务社会”，现在多称为“人才培养、知识贡献与服务社会”。就概念的严谨性而言，教学与科研仅是大学的两类活动而非社会职能，就“教学”与“人才培养”间的逻辑而言，两者亦非等同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尽管笔者在早前的研究中就提出过“人才培养质量是人才培养体系诸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制度、文化环境、教师素质等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2]这一结论，但教学是人才培养最为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载体，其唯一功能就是服务于人才培养并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由此笔者形成如下学术立场：其一，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大学之文明首先是主宰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文明；其二，人才培养是一项高度理性的智力活动，必须以理性尤其是教学理性来指导。何谓人才培养的理性？即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把握及其坚守，其操作意义就在于把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教育理论以指导人才培养实践，而教学原则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亦为教学理性的表达。强调大学的人才培养理性首赖于重视教学理性，唯此，大学的执教者及教学管理者才能全面、具体而深刻地把握大学的人才培养及教学的本质，并从大学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整体框架的分析视角去认识并遵循大学的人才培养规律和教学原则。

（1）关于教学原则。所谓原则即人们之社会行为依据的准则或行动的规范，原则具有人为的定义性，是对行为者做什么及怎么做的具体规定。而所谓教学原则即教育者根据学校教育目的、反映教学规律而制定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它既指教师的教也指学生的学，贯彻于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始终。^[3]关于大学教学原则，潘懋元先生强调：教学原则既是教育和教学规律的反映，又是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考试考查以及教学工具的运用等一系列活动的准则。^[4]笔者在早期出版的《高等教育学》一书对教学原则给予了如下的界定：“教学原则是根据一定的教学规律和教学

目的而提出的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决定教师教学活动和学生认识活动性质，指导教学与学实践的原理”“由于教学原则反映了教学过程的本质规律，是对教育工作者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教学原则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5]随着对大学人才培养认识的深化，笔者把大学的教学原则进一步提升为：大学教学原则是大学教育者在对人才培养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科学引领和正确规范提出的要求，教学原则是指导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教育基本理论，是教学理性的具体体现。

（2）关于教学原则的讨论。由于人才培养受制于三个教学要素，即人才培养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过程（教学过程包括由谁教、如何教、教学评价等），教学原则不仅不能独立于这三个教学要素而且受三者所决定。故关于教学原则的讨论可以据此进行。

首先讨论教学原则与人才培养规律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及社会的运动均有其规律，规律是事物及社会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定性，规律对事物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人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但绝不能改变自然和社会运动的规律。人才成长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违背人才成长基本规律的教学不仅不利于人才素质改善、提高和发展，而且一定程度上会扼制人才的成长、成熟和成才。人才培养活动可以因国家、地区、文化、大学、专业及受教育者的身心差异等不同而呈多样化的特点，但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变的一致性，即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培养具有不因国度、地区、大学、专业等而有所不同的统一性。譬如大学本科教育本质上是中等教育后的专业教育，但是就整体而言，未系统接受过中等教育者其既有的知识积累就很难适应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具有循序渐进性）；又如创新能力是各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若仅满足于知识积累及其考试而无视学生个性发展和质疑、批判精神培养及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这样的大学教育就很难培养出充满创新活力的创造性人才；如果大学教师仅仅喜欢那些不如自己的或假装不如自己的学生，

他们的教学就会把满脑子充满疑惑的学生教得不再有问题或不敢挑战书本和权威，如此大学就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具有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理想和能力的

人才。综上所述讨论得到结论：人才培养有其独立的规律，由此决定了担负人才培养主要责任的教学活动必须遵循的教学原则，是人才培养规律的具体反映。换言之，教学原则虽然具有人为规定的主观性，但其却是人才培养规律之内在客观性的反映；就教学原则提炼的逻辑程序而言，其是依附于人才培养规律的衍生物。由于人才培养规律不能无视更不能逾越，由此决定了对教学活动具有引领性、指导性的教学原则也不能违逆人才培养的规律。所以，教学原则本质上是对人才培养规律的一种阐明，是人们运用一系列的学术概念或命题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表达。由于人才培养规律是客观存在且具有必然性和不变性，由此决定了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原则也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是我们在教学原则讨论中必须建立和明确的认识。基于上述认识如下观点就有待商榷：由于教学原则是人为规定的，所以教学原则可能符合人才培养规律也可能不符合规律甚至完全与规律相悖，所以教学原则需要长期的教学实践的检验，即教学原则并非人才培养规律的直接反映，这种反映取决于人们对人才培养规律主观认识的程度，在同样的人才培养规律面前可以提出了不同的教学原则，由于人们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不同，因而提出的教学原则也不尽相同，教学原则与人才培养规律彼此之间不一定是单一的联系，由此便可以理解关于教学原则的“众说纷纭”。对此笔者欲表明态度是：由于人才培养是一个关系到人身心发展及人际关系的复杂系统，人们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发展的，由此决定了受人才培养规律影响的教学原则亦非一成不变、一劳永逸，以及教学原则是随着人们对人才培养规律认识的深化而有所发展的。

关于教学原则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其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笔者始终强调教学原则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这一针对性即引领和指导教学活动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脱离了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及其教学原则没有意义。这是本文在后面专门讨论

的问题。

关于教学原则与人才培养过程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所谓教学过程是个动态进行中的概念，指大学师生共同完成彼此密切关联的教与学任务的活动过程。根据教育学基本原理，教学过程包括教学活动的启动、发展、变化和结束，是上述要素在时间上连续展开的程序结构。教学过程不单纯是知识传播中的认识过程，也是师生人际交流中的心理活动过程及学生参与社会化的成长过程。因此，教学过程是认识过程、心理过程、社会化过程的复合，由此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6]人才培养目标也是通过一定的教学过程实现的，所以教学过程的质量对人才培养质量亦有不能轻视的影响。由于大学教学过程涉及诸多的活动要素参与且具有活动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由此导致大学教学过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智力交流和师生交互影响的活动，故此教学原则是大学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主要起引领和控制教学活动作用的基本要求，其不仅对教学过程中的各项活动具有规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提高教学过程的效率进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教育理念引领和教学规范保障的意义。遵循教学原则的大学教学活动是成功教学的前提，反之就可能失败。

（二）大学教学的现实问题

关于教学原则的学理性清晰之后，需要再来看看大学教学的现实。据早些年前一项全国性的大学教学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对整个教学“很满意”和“满意”的只有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达53%；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占79%。而同期据一项美国全国范围的大学学情调查发现：超过80%的本科生对所在大学的教学状况感到满意，超过75%的校友对本科经历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2/3的受询学生表示如果有机会再做选择，他们仍会选择母校就读。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些受批评越激烈如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其学生的满意度越高。对此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作出的解释是：美国大学生对母校教育满意度较高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大学教育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知识面、道德推理能

力、数理能力等都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无疑处在世界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却在不断地反思自己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诸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博克等人就在不断地告诫“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必须“提醒自己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美国大学课堂发生的一切”。相较而言，我国的大学包括一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群体的研究型大学都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及需要教学改革创新危机意识。

如果说理科人才培养的目的在于发现，那么工科人才培养的目的更多在于发明，发明之于创新国家的建设更具现实意义。我国拥有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即接近1/3的大学生学的是工程专业，以技术立国的德国也只有20%的大学毕业生学工程技术。然而，据近十多年来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在6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科技研发人员的国际竞争力”徘徊于中游，但“合格工程师”排名居后甚至靠近末位，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工程教育难以为市场提供具有胜任能力的合格工程师。一项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主持的对全国5000名工程科技人员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工程教育培养的人才远不能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工程专业的学生普遍创新能力不强，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存在到工程实践岗位上不适用、不能用的问题；58.8%的工程师认为“大学教育不完善”是当前工程科技人才开发中的突出问题。^[7]甚至有21.8%的受询者认为，高校培养的学生完全不符合或基本不符合国家技术发展需要；52.4%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高校培养的工程专业学生质量一般，大约只有10%的人具备从事所属行业的技能，这使得我们适合到跨国公司工作的年轻工程师比例仅占供给的1/10。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先生在一次“新形势下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同样指出了我国工程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

当下大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在我国日益强调“立德树人”的时代背景下，笔者指导博士生进行了一项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调查研究，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

评价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其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总体评价持满意态度的约占65%左右，而其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满意的学生只占25.79%左右，约有35%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持不满意态度，其中5.36%的学生持“不满意”甚至“非常不满意”的态度。而在关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是否满意”的问项中，亦有34.78%的学生选择了“一般”及以下的答项，其中4.63%学生选择了“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8]由此可见，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满意程度并没有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和理想效果。

就大学教师而言，教学不受大学生欢迎既存在教师“不愿教”的问题亦存在“教不好”的问题，前者属于教师的主观态度问题，但更具普遍性的是后者即大学教师客观上存在不知道如何教好的教学问题，其中包括是否重视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和教学原则进行教学的问题。

三、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原则的关系何在？

哲学家杜威就教学问题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教之于学犹如卖之于买。道理很浅显，若没有学及其学的效果，教的意义何在？所以西方的教育理论常常把“教学”拆分为“教”与“学”两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概念进行讨论，其目的就在于强调教学不是教师单边的教，还要重视学的另一端即学生的学，尤其是学的兴趣培养、学的效果达成，后者才是教学的价值所在。大学教学亦然。所谓学生学的效果即教学质量，确切地说即人才培养质量。由于人才培养质量不仅受制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且受制于在很大程度上受教学原则影响的人才培养过程，其间的逻辑即通过人才培养质量这个变量，不难建立起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达成与教学原则的关系，究竟两者间有何关系及其这种关系是否重要即为本节需要讨论的要点。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系

所谓人才培养目标即人才培养必须达到的基本标准及大学培养什么人的价值主张及具体要求，是人才培养活动得以发生的依据和人才培养制度安

排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人才培养目标既是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亦是衡量和检验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依据和标准。^[9]何谓人才培养质量？如果把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视为一项组织管理活动，那我们不妨借用管理科学关于管理质量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任何组织管理活动均始于组织活动的目标设计并终于该目标的实现，管理质量即组织活动适切于管理目标并达成了管理目标，以界定人才培养质量即人才培养活动适切并达成了人才培养目标。基于这一界定可以明确，所谓人才培养质量是以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与否来检验的，缺失了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活动不仅无法开展，其效果及质量也无法衡量。由此说明，人才培养目标是检测和判断人才培养质量的逻辑前提，培养目标不明确则人才培养工作无所适从，其人才培养质量就会因失之标准而无法检验和判断。

关于人才培养质量，笔者在早前的研究中就提出，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受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即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培养模式、教学制度、大学文化、教育者等诸多要素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决定的结果而并非单一要素的产物。然而，由于诸如知识结构、培养模式、教学制度等均是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和安排，因此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第一要素。^[10]由此可以得出的另一结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质量，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是确保大学人才培养应有质量的逻辑前提，亦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

以上关于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系及人才培养目标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在理论上的清晰，有利于我们根本改变以往多从就事论事的视角去讨论及整改人才培养的问题，而是从人才培养体系之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前端去根究人才培养的问题。这样一种从碎片式的仅对单一人才培养要素讨论问题的思维方式向整体的顶层思维的诊断问题过渡，使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一个更重要且不被重视的原因在于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质量不好。坦率地说，在人才培养方面，欧美大学其实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其一就是他们的人才培养活动完全基于既有实现难度

又有极强操作性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普遍存在诸如“对培养目标的期待太低”“满足于书本知识而非知识创造、问题解决及能力培养”“目标模糊笼统缺乏能力素质结构分解”“缺乏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时俱进”等一系列问题。^[11]而欧美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最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他们具有既具体明确、要求又高、对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如课程结构、培养模式、制度设计及文化营造具有价值引领且能够根据社会发展进步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目标。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大学负有强烈的创新知识及培养既掌握最新知识又具有创新知识能力之人才的使命。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乎人类想象力的时代，具有知识垄断特征的大学若不能敏感世界发展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无异于大学放弃自己知识创新及具有知识创新能力之人才培养的使命继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正是认识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性，欧美研究型大学几乎每几年就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加以调整并以此引领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比如，自2015年起在知识创新及卓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斯坦福大学就不甘维持人才培养的现状率先挑战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启动了以所谓“开环大学（Open-loop University）”取代“闭环大学（Close-loop University）”的《斯坦福大学2025年计划》（Stanford 2025）。笔者研究发现，该改革计划提出的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最具颠覆性意义的三大举措，如“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的‘自定节奏的教育’（Paced education）”“体现能力优先教育理念的‘轴翻转’（Axis flip）”“旨在对人类社会负责的‘有使命的学习’（Purpose learning）”，无不是以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为引领的改革。^[12]坦诚言之，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缺乏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创新，尤其缺乏针对国际竞争加剧带来社会发展变化后对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出的反应，由此导致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总体上滞后社会发展需要，其后果即人才培养质量滞后社会发展需要。

（二）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原则的逻辑关系

就概念严谨性而言，人才培养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丰富的概念，并非等同于教学，这亦是笔者不赞成把教学和科研视为大学社会职能的原因。但是，教学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最重要途径，由此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质量。上述讨论虽然使我们获得了人才培养目标之于人才培养质量之重要性的认识，但如前所述，在关于教学原则的讨论中，笔者基于人才培养主要途径教学的视角还提出了人才培养质量不仅受制于决定教学目标的人才培养目标，还受制于决定教学规律的人才培养规律和决定教什么、由谁教、如何教及教学评价等的人才培养过程即教学过程，由此足见教学过程之于人才培养质量绝不能忽视。但教学过程作为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要素之一，并非是随心所欲的活动，它不仅是需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并依据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理性设计，而且其全程及全要素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价值、教学规范的引领下进行，这一教学价值及规范就是教学原则。

教学是大学组织最为频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大学人才培养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及其目标能够达成，均得益于教学发挥的基础作用，所以失之教学，大学便不再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真正意义的大学。那么，一个好的教学的标准是什么？简言之，即有效实现了教学目标。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实现教学目标呢？答案是：遵循基于人才培养规律及有利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教学原则。教学原则是基于人才培养规律认识的产物。认识和守持人才培养规律的目的是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脱离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原则失之意义。所谓教学原则的针对性及引领性亦在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否则，即便实施了教学但其并不一定是好的教学。人才培养目标是通过教学原则贯穿于教学活动全要素及全过程的价值所在，失去教学原则对教学过程亦即人才培养过程的导向和规范，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既失之方向亦失去载体，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也难以确保。此即本文何以将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原则这对看似关系并非紧密的概念加以专门讨论的原因所在。

四、基于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的教学原则重构应遵循哪些原则？

大学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教育理性的产物，其人才培养亦是需要教育理性引领的活动，而教学原则是大学及其教师在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炼并必须在教学活动中加以遵循的教学理性，由此决定了作为教学理性之客观反映的教学原则之于教学活动的重要性。掌握科学的教学原则并自觉运用于教学过程，这是大学教师必要的教学理性和专业素养，绝非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所以，凡《高等教育学》无不辟专门篇幅讨论大学教学原则。如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学》就提出了如下十条之多的教学原则：科学性 with 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知识积累与智能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师主导下发挥学生自觉性、创造性与独立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原则、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系统性与循序渐进原则、少而精原则、量力性原则、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13]之后，薛天祥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亦提出了六条大学教学原则，即：科学性 with 思想性相结合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动性相结合原则、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统一原则、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14]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百废待兴的初期乃至中期，无论是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学原则体系还是薛天祥先生总结的教学原则体系，在指导大学的人才培养及规范大学的教学秩序中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大学教学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以知识传授和习得，并由此积累知识、形成概念、发展能力等为旨要的，由师生共同参与且十分复杂的智力及情感交流活动。此外，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专业教育，其所有教学活动均有专业教学的属性且必须遵循不同学科专业教学应有的规律，由此决定了大学教学原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笔者早在1990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关于大学教学原则的章节中就强调：大学的教学原则必须客观地反映教学过程的本质、规律和特点，必须有高度的概括性、确定性和

公理性, 有利于教师通过教学原则的掌握, 很好的控制教学全过程并产生最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原则是需要与时代发展俱进的教学理论, 而非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教条; 富有成效的教学活动是遵循一组既有所区别又彼此密切关联的教学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教学原则的产物。^[15]这段文字旨在阐明的观点是: 尽管大学的教学活动是诸多教学要素共同参与的富有专业个性的复杂活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引领和规范大学教学活动的教学原则多多益善, 教学原则的制定应该遵循数量适当、内涵丰富、可塑性大、既避免空洞又防止碎片化及一成不变的原则。基于此, 笔者认为在大学教学原则受到普遍轻视的当下, 一方面我们必须唤醒大学及其教师对教学原则加以重视的意识, 另一方面有必要针对当前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新时代对大学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讨论并重构大学的教学原则。

首先, 就当前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而言, 包括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关于大学教学有关“水课”的批评, 教学原则自身不足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据笔者研究发现, 现有的教学原则至少存在如下的问题: 其一, 缺乏针对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的强调; 其二, 缺乏针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强调; 其三, 缺乏针对学生职业道德养成的强调。因此, 大学教学原则的重构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作为引领和规范大学教学活动及其过程的有效工具, 教学原则的重构其目的并非教学原则本身而在

于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 即教学原则重构必须指向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及其质量的保证, 这才是教学原则的价值。基于上述逻辑, 笔者提出如下结论: 大学教学原则的重构必须遵循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的原则, 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一) 教学原则重构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

前面笔者用了较大篇幅从学理上讨论和阐明了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与教学, 以及教学质量与教学原则之间的关系, 教学原则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逻辑关联因此已经明确。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讨论, 我们认识到教学原则的意义作用不仅止于引领和规范教学活动从而确保教学过程必要的稳定秩序, 其根本价值在于针对并确保培养目标有效达成。教学原则若缺失了针对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的鲜明指向, 其很可能由于失之高屋建瓴的方向性及目的性继而流俗于就事论事的碎片化设计, 不具有对整体教学活动进行顶层设计的引领价值。当然, 就概念逻辑的严谨性及其之间的关系而言, 教学原则是服从于并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有强烈人才培养目标意识的教学原则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完善产生反作用。不仅如此, 如果教学原则具有了人才培养目标有效性的强烈意识和指向, 我们还可以借助其去审视和发现诸如知识体系构建、培养模式、制度设计等其他要素是否有碍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的问题(见表1)。

表1 传统学习和带有使命的学习目的比较

传统学习	带有使命的学习
学生选择专业后, 只围绕具体的标准进行学习	学生有长远的愿景和使命, 将自己的兴趣融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学生较为盲目地选择专业	学生通过学习和做项目来实现意义和影响
许多校友的工作领域与所学专业无关	校友通过使命来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
学生在人生后期才开始从事社会工作	有全球影响力的实验室拓展了研究的平台

资料来源: 佚名. 斯坦福大学发布2025计划, 创立“开环大学”, 彻底颠覆传统高等教育! [EB/OL]. 搜狐. 教育. (2016-06-25) [2018-02-06]. http://www.sohu.com/a/85980366_372406.

以《斯坦福大学2025年计划》为例, 该计划对大学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最具颠覆意义的就是其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构。但是, 仅有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构是不足以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 尤其对传统教育具有颠覆性的人才培养改革而言。所以, 斯坦福大

学为了实现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能力优先发展”及“具有领导力之社会领袖”的人才培养目标, 其进行了必要的而且是大动作的教学改革, 如实施“自定节奏的教育”“能力培养与知识教学的翻转”“有使命的学习”, 而这些所谓的教学改革

举措无不是为了实现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之相关教学原则引领的改革。如表1所示，“传统学习”和“带有使命的学习”的教育目的有着很大不同，若没有与“带使命的学习”目的高度吻合的教学原则以引领教学活动的改革，并建构有利于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新的教学秩序，不把人才培养目标转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活动，上述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就难于实现。

（二）教学原则重构必须基于学生创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人工智能超乎人类想象力的快速发展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大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亦提出了严峻挑战，且有些挑战甚至极具颠覆性。譬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换代及“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及化，知识收集、存储、查询及运用的方式及获取各类知识包括最新知识的迅捷性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知识高度共享的时代。这一时代具有两大特点：其一，知识创新成为时代的新宠，由此导致人才概念的变化，学富五车的“学霸”地位被颇具创新能力的“极客”取代；其二，知识创新的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学科的知识体系让位于多学科交叉的新知识系统，任何人仅凭单一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单一的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完成知识创新的使命，仅凭个体的知识积累决定成败的时代一去不返。对此，大学的人才培养不得不积极做出如下应对，即以记忆为主的知识积累式教学向以知识创新能力培养为特征的教学转型。在知识共享的时代，“互联网+大学”甚至“互联网+人工智能+大学”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新模式和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倒逼大学必须对传统人才培养的观念及模式做出自我创新的选择。仅就“互联网+”技术对高等教育的渗透而言，其不仅为大学之人才培养提供了获取途径十分便捷的且极其丰富的优质知识资源，而且“打破了大学之间尤其是普通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封闭的堡垒，使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跨越空间距离的限制，得以更广泛地对外辐射，促成了大学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和联合开发，不同区域及国别的大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大学’新型模式下的资源平台比如‘慕课’

等，共享卓杰学者包括世界名校大师开设的优质课程，实现优质资源的最大化利用”^[16]，大学生获取知识尤其是最新知识的方式多样性和便捷性，导致以知识积累为目的的传统教学较之以培养知识创新能力的现代教学不再具有主导地位。

正是基于对知识共享时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发展趋势的这样一种判断，不仅斯坦福大学率先提出能力与知识翻转，即能力优先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大学教学模式；同时，诸如麻省理工学院为防止学生由于受时间精力限制“贪食”过多课程导致“食而不化”的问题，对学生选课数量进行了加以控制的教学改革；而芝加哥大学则要求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小班讨论课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其实在美国，除了上述那些标榜旨在培养各领域精英人才的研究型大学基于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而敏感地加快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许多教学型大学也认识到新技术革命对人才培养带来的严峻挑战，从而加快了“以知识为本”到“以能力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张首晟生前在多次的讲座中都谈到美国大学关于人才培养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大学人才培养最重要者并不在于既有知识从10到100的存量增加，而在于从0到1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飞跃。因为只有获得从0到1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飞跃的人，才能产生自己的创新活动并为社会做出新知识增量的贡献。据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由该校师生们创建的所有公司创造的GDP占全球的第四名。^[17]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但由此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斯坦福大学从0到1的人才培养理念及其教学模式创新之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活动需要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且积极鼓励思想活跃、自由创新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及与之吻合的教学原则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教学原则的重构亦特别需要强调教学过程对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欧美大学有一种普遍运用教学活动的被称为“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这种教学模式的逻辑起点及遵循的教学原则就是“基于问题解决”。当然，这种教学模式还可以衍生为基于项目

研究、基于案例分析等其他类似于问题要素导向的教学。由于任何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等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因此针对问题解决的教授，其实是一种对学生从获取必要知识到培养发现和把握问题本质的敏感性、研究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最后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的全面训练，其本质就是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

我们的人才培养长期以来偏重于既有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创新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原则的重构中必须针对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单一，教学模式长期“停留在‘教材教学’‘课堂教学’‘教师教学’‘集中教学’缺乏多样性、有效性等问题，通过加强科学实验、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个性化教学、独立学习等富有参与性、启发性、发展性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创造宽松自由、独立思考、有利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批判性、创造性，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环境，根本改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被动学习地位，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转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获取并处理信息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质疑批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造能力”^[18]。教学方法之于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也必须加以改进。耶鲁大学校长雷文曾严厉批评教学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教学原则是人才培养全过程全要素包括教学方法必需守持的教学理性，如果教学原则都不能反映针对知识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的教学原则就不可能对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及全要素产生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导向作用。

（三）教学原则重构必须基于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

早年，有位受聘我国一所医学院的外籍教师应邀为大学生做一个讲座，他的开场白讲述的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清晨，一成年人来到海滩散步，远远看见一个小孩不断弯腰拾捡着什么，然后将之抛向大海。于是他好奇地向小孩走去，发现小孩是在把退潮后留在一个个水坑里的鱼

抛回大海。于是该成年人对孩子说：你能把那么多的小鱼都抛回大海吗？谁在乎你这样做呢？小孩一脸严肃地继续干着自己的事，他弯腰拾起一条鱼抛向大海说，这条鱼在乎我这样做，然后又拾起另一条鱼说，这条鱼也在乎我把它抛回大海。故事讲完后，这位演讲者对听众说：“在座的都是医学院的学生，未来的白衣天使，你们虽然不能救治所有需要救治的人，但你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救治一些人，这就是救死扶伤的精神，也是你对社会必须给予的回报。”“救死扶伤”就是医学人才必需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正是医学及其人才使命的神圣，自2400年前的古希腊时期至今，《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医生就职前必须宣誓守持的道德圣经。记得留美学者薛涌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志在从事医生职业并以攻读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为理想的年轻人，首先选择了耶鲁大学念历史学本科而不是医学。其理由不仅在于耶鲁大学有全世界最好的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教育，更在于医生的职业是治病救人的职业，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能给予他对人性的更好理解和予以病人更多的人文关怀。

由于大学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因此与专业人才培养高度相关的职业道德或伦理养成的问题往往被忽视，在大学的教学原则中也几乎未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问题在于，在知识之于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日益重要以至于知识既可造福人类社会亦可损毁人类社会的今天，所谓人才的概念绝非仅是专业技术水平的反映，德才兼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衡量人才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或文化时代后，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对自己所处的小到组织、大至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在受技术至上主义影响的当下，以及史蒂芬·霍金等著名科学家已经发出“科学技术无限制地过度发展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警告的人工智能和遗传基因技术，可能出现超人类伦理发展的未来。我们的“大学不仅面临如何培养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之‘人才’的挑战，亦面对如何把大学生培养成自觉于社会责任担当之‘好人’的挑战”^[19]。这是技术社会赋予大学人才培养的新内涵，亦是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必须面对的崭新而敏感尖锐的问题。

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育人也, 大学亦概莫能外! 而育人的概念并不仅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有知识有能力的人, 更在于他们能够具有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为国家乃至人类的社会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的道德担当和道德自律。所以, 古人云: 人以德立, 邦以德兴; 德者才之帅也。所以党和国家始终把“立德树人”明确为大学的立身之本及大学办学治校的首要任务, 并且把“立德树人”写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20]。

对道德教育的关心并非我国的独有, 西方教育同样对道德教育予以高度重视。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就指出: 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 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可以称其为自律于科学道德的楷模, 他认为: 人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 而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 在全面发展教育的统一体中, 德育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成分。因为, 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过程中, 人的所有各方面特征的和谐, 都是由道德这一主导成分和首要因素来决定的。^[21]正是基于大学在科学技术知识创新及其人才培养具有垄断性的事实和认识, 斯坦福大学提出了“有使命的学习”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其说“有使命的学习”目标旨在激励和鞭策学生立志和努力于奋发向上的成才目标, 不如说这种要求“带着使命感去学习”人才培养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获得“他们职业生涯中指引方向的航标”^[22], 在认识到自己必须有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前提下明确学习的意义并选择有意义的学习, 从而使自己成为对人类社会负责及具有应对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以及目前未知领域风险的领袖型人才。

职业道德虽然是一般伦理道德的组成, 但任何一个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并以自己的专业特长立足于并影响于社会的职业人才而言, 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决定着他的社会作为, 所以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处理问题时应该更具专业理性, 在职业行为中以专业的道德自律判断及处理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是是非非, 尤其是在影响社会的重大决策选

择中, 必要的职业道德之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还是倒退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参考文献

- [1] 眭依凡. 当代教育社会职能之我见[J]. 江西教育科研, 1989(6): 1-5.
- [2] [10] [11] 眭依凡. 大学: 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兼谈美国著名大学的成功经验[J]. 中国高教研究, 2006(4): 3-9.
- [3] 教学原则[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5%AD%A6%E5%8E%9F%E5%88%99/10689975>.
- [4] 潘懋元. 高等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168.
- [5] 眭依凡. 高等教育学[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102.
- [6] 教学过程[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5%AD%A6%E8%BF%87%E7%A8%8B/5708103?fr=Aladdin>.
- [7] 工程科技人才开发的问题与出路[EB/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12-10/content_10777571.html
- [8] 梁纯雪, 眭依凡. 课程体系重构: 基于增强思政理论课针对性和亲和力的调查和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11): 63-77.
- [9] 眭依凡. 高层次人才素质问题的研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119-124.
- [12] [22] 项璐, 眭依凡. 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价值引领——基于斯坦福大学“开环大学”计划的启示[J]. 现代大学教育, 2018(4): 103-111.
- [13] 潘懋元. 高等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168.
- [14] 薛焕玉. 高等教育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10-213.
- [15] 眭依凡. 高等教育学[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0: 116.
- [16] [19] [21] 李芳莹, 眭依凡. “互联网+”时代大学如何守持育人使命[J]. 清华教育研究, 2018(2): 44-51.
- [17] 姜澎, 李斯嘉, 张首晟: 用从0到1的思维来创新[EB/OL]. http://www.sohu.com/a/280112143_465915.

- [18] 眭依凡. 杰出人才培养：大学必须守持学术理性[J]. 中国高教研究, 2012(12): 1-12, 25.
- [20]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http://www.cac.gov.cn/2018-09/10/c_1123408490.htm.

Achievement of Training Objec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ing Principles

Sui Yifan

Abstract: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are the teaching rationality that is indispensable in gui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have declined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personnel training.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s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university's teaching principles need to be reconstructe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principles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eative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ethics.

Key words: University Personnel Training; Quality of Training; Trai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Principles

大学故事积淀成就了大学文化

叶志明 陈方泉 杨辉

摘要: 文化传承是大学重要的任务与使命, 大学文化由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构成。这些文化并不是空洞虚构的, 而是通过蕴藏在大学校园里口耳相传的大学故事得以传承, 人的故事构成了大学的精神文化, 事的故事集合成了大学的行为文化, 规则的故事体现了大学的制度文化, 楼的故事反映了大学的物质文化。这些故事经过了一代代师生的淘洗凝练或虚化重构, 其核心精髓反映了大学的精神选择和价值取向, 进而形成了一所大学师生的共同价值认知和文化理解。大学故事是大学重要的精神遗产, 是大学文化形成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大学文化; 大学故事;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27-04

一、引言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 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 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因此, 对一所大学来说,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项根本任务中, 文化传承是大学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 既要传承也要引领社会文化, 并发挥文化的教化育人功能, 丰富大学文化的建设, 继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大学文化应该是具有差异性的, 应该是千校千面、百花齐放的。但是, 大学文化又有其根本的价值追求。一所大学的文化不是空洞虚构出来的, 而是大学经过一代代师生共同的淘洗、凝练和积淀形成

的, 更多的时候是存在或者记录于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之中。一所大学的精神或者说传统, 正是借助这所大学一代代的人、事或者物的故事累积起来的。正如陈平原指出: “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 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1]如果将大学文化分解成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2]四个层面的话, 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这些文化的背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大学故事为起源, 是在大学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 并逐渐积淀和传承下来, 进而形成的一所大学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

大学的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 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取向的具体反映或者是保障和具体映射, 而这些文化则是在大学里的故事的口耳相传中产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师生, 进而形成社会文化的推动剂。大学的精神文化传递和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的故事才更加富有张力和感染力, 才更加能被广大师生们所认可, 大学的故事来源可能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生动,

作者简介: 叶志明, 男, 上海人, 博士, 教授, 上海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为工程力学与结构工程、高等教育管理; 陈方泉, 男, 浙江余姚人, 上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杨辉, 男, 安徽舒城人, 上海大学政策研究室主管,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流传中会被添加很多的感情色彩, 经过大学精神文化指引下的理解和重构, 形成了大学师生的共同认知和文化理解。

二、“人的故事”形成大学特有的精神文化

大学精神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 一所大学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会引领一代代学子成长。大学的精神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精神特质, 而这些特质是由大学的大师级学者倡导、追求并积淀下来的价值追求。如梅贻琦所言: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 可以说不仅仅因为其学术知识及地位, 更因其个人魅力和精神追求给大学带来的气质共享。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 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提出的“共同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让芝加哥大学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毕业生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其演变自通识教育的理念至今在世界高等教育界影响深远。

比如余杰笔下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罗尔斯教授的《遥远的掌声》的故事。每当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 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 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 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 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 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 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 于是他频频挥手, 快步走出讲堂。可是, 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 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一位刚去的中国留学生双手也拍得又红又痛, 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 到底还要拍多久? 美国同学回答说: “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还比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 给北京大学带来精神底蕴。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用人故事。^[3]蔡元培执掌北大时, 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 他提倡学术民主, 主张不论什么学派, 只要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就应允许其存在; 不同主张的教员, 无分新旧, 应允许其自由讲学, 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蔡元培礼聘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来北大讲课, 他还接受持有复辟论, 身穿长袍马褂的辜鸿铭

在北大讲英国文学, 聘请西装革履的章士钊、胡适讲课, 还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当教授。可以说正是蔡先生“不拘一格降人才”, 让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并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

这一个个大师用鲜活的故事及其精神追求构成了大学的精神, 构成了大学的校训精神, 形成一所大学师生们的共同认知, 进而形成了大学特有的精神文化。概览国内外著名学府, 皆可寻找到这所学校的大师们的人文品格给这些学校带来的影响, 并让代代师生们乐于传颂。

三、“事的故事”形成大学的行为文化

大学的行为文化是一所大学在其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所体现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 是一种在大学精神文化感召下的行动主张。从某种意义上看, 大学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具体体现, 是大学精神特质的生动诠释。行为文化是一代代大学师生的具体行为实践给大学带来的行为取向所形成的。

比如我们现在谈到某一所学校是不是具有改革创新的文化, 通常看它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是不是有师生们突破传统禁锢的行为故事。具有代表性的如: 上海音乐学院当年创作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的“一勾、一争、一点”的故事。^[4]一勾: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提出要用优异的创作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当时提出的题材集中在“大炼钢铁、女民兵、梁祝”三个上面, 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是配合形势的新闻宣传, 有一千种理由选择《大炼钢铁》或《女民兵》, 有一万种理由扼杀《梁祝》。原因很显然,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梁祝》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 不能拿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音时任党委书记孟波收到意见后毫不犹豫地《梁祝》上打了一个勾, 并作了解释: “梁祝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 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 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 就可以献礼。”《梁祝》就是在这样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机遇中孕育, 在狭小的不能再狭小的缝隙中诞生。一争: 当时, 作曲者陈刚是四年级学生, 极具音乐天赋, 但是启用他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因为陈刚的父亲有“历史问题”, 不能参加向

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孟波书记力排众议,“儿子不等于老子,重在个人表现”。解放思想在当时被看成是极端另类,历史也在坚定、执着和不经意间被造就。一点:《梁祝》初稿的结束乐章是“投坟殉情”。作曲者去掉了“化蝶”部分,怕被人说是宣传封建迷信,孟波书记坚持加上,“‘化蝶’并非迷信,而是反映封建社会人们美好理想的追求”。就这样成就了历经半个世纪,久演不衰的世界乐坛经典,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个个“事的故事”构成了大学的行为文化,而大学的行为文化又会影响大学师生的行为选择,良好的大学文化和创新的大学文化必然会引领师生积极向上,自觉抵制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之风,一所大学追求真理、追求科学、改革创新的行为也会影响师生,影响社会,进而引领社会的发展。

四、“规则的故事”形成大学的制度文化

大学的制度文化是由学校的一项项具体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所构成。制度是刚性的,但是制度文化却是柔性的,各个大学的一项项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互相拷贝,而是根据每所学校独特的行为取向制定的,是服务于学校的精神文化的。制度文化本身具有价值引领和教育教化的意义,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育人氛围则更加是大学所看重的。

比如哈佛大学“让校规看守哈佛的一切,比让道德看守哈佛更加安全有效”的故事广为流传。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原名新市民学院,因为纪念1638年约翰哈佛牧师将自己所有图书和一半房地产捐献给学校,学校1639年更名为哈佛学院,后改名为哈佛大学,可以想象这些捐赠图书对于哈佛的珍贵意义,因此哈佛大学规定这些书不可以携带出图书馆。然而1764年,一场深夜的大火烧掉了哈佛大学的图书珍藏馆,哈佛牧师的遗赠图书付之一炬。但是在大火发生前,正好一名学生违规将一本名为《基督教针对魔鬼、俗世与肉欲的战争》的珍藏书带出了馆外,打算在宿舍阅读。大火发生后,学生如果不告诉学校,保存下来这本书能卖很高的价钱,但是会陷入不诚信的精

神折磨,于是他把此书还给了哈佛时任校长霍里厄克。霍里厄克校长感谢他的诚实,但是因为违反了校规下令开除了他,因为“让校规看守哈佛的一切,比让道德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

就是这一个个“规则的故事”形成了大学的制度文化。不存在没有规则的自由,制度的约束恰恰是保障学校的价值选择和行为选择,保障了整体的公平公正。规则约束限定了边界条件,使得大学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承。师生们也会在这些规则的约束和制度文化的影响下更加理解一所大学的文化价值取向。

五、“楼的故事”形成大学的物质文化

大学的物质文化是大学校园内各种物质形态的文化的组合。大学的物质包括各种楼宇、校门、绿化景观、雕塑、校史留存或标志物等等。评价这些物质自然生态,我们往往用漂亮这样的形容词,但是我们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物质,把这些冰冷的建筑上升到物质文化的高度,会发现物质的文化也是为大学人才培养服务的,也是服务于大学的理念的。大学好的物质文化是会让师生在其中受到熏陶和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的。

比如说上海大学鱼骨天线般的院系综合楼的故事^[5]就让一代代的上大师生在学习的时候理解钱伟长老校长对“拆除四堵墙”(拆除教与学之间、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拆除院系与专业之间、拆除学校于社会之间的四堵墙)的办学理念。1997年上海大学新校区工程作为国内第一个大学新校区建设被确定立项开工的当天夜里,85岁高龄的钱伟长校长彻夜绘图,绘制他心中的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蓝图,绘制了一张有2号图纸那么大的新校区建设规划图,并写了近万字规划图的详细解释。尤其是院系综合楼,从设计思想到具体要求,大到楼群布局,小到走廊多宽、厕所有多少个位子,都有仔细的计算和推敲,老校长的缜密心思和对学生的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这张图纸将院系综合楼用四条“大通道”相连,整体的布局如鱼骨天线一般。钱校长还曾这样跟学校的领导们具体解释道:“综合性大学必须做到文理相通、理工结合、文理工互相渗透,造通道把楼连起来,就是为了方便教师与教师、不同学

院的教师之间相互往来,方便学生在不同学院选课,方便教师与学生沟通,更加具体地体现办学理念。”而且在随后的搬迁过程中,钱校长还要求不能是一个学院一幢楼,最好是几个学院交叉安置,防止一个学院占据了一幢楼以后,又把自己圈得严严实实的。包括随后上海大学新校区名人塑像的设置和人工湖洋池的建设等等,无不体现了这位老人对办好这所综合性大学的良苦用心。

由此可见,物质文化不是空洞的,也都是由一个个“楼的故事”形成的。我们今天在很多大学校园里说着风景优美,设施齐备,但是多为外行看热闹。其实学校的这些建筑物背后的故事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会让大学的师生们感受到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存在。

六、结语

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名校,就是因为校园里流传着这些动人的、被后人永远记载和传颂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构成了每所大学所特有的传统,形成了大学独特的气质。每所大学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故事所组成的特质成就了其个性鲜明的大学文化,

并熏陶着大学的师生们,形成和大学相同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进而形成了对大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学的故事是一所大学重要的精神遗产,也是大学文化形成的重要载体。只有传承好、讲述好这一个又一个大学故事,才能更好地传承大学文化,让大学的优秀故事从大学走向社会,更好地影响社会文化,用大学故事演绎大学精神、成就大学文化,继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陈平原.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J]. 教育学报, 2005 (2): 58-67.
- [2]McCallum, L. W. A. meta-analysis of course evaluation data and its use in the tenure decision[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84 (21).
- [3]陈平原. 老北大的故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4]马信芳. 还一部真实的“梁祝”诞生史——何占豪、陈钢、孟波话“蝶”五十年[J]. 上海采风, 2010 (1).
- [5]曾文彪. 校长钱伟长[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University Stories building up University Culture

Ye Zhiming Chen Fangquan Yang Hui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task and mission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 culture is composed of spiritual culture, behavior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 culture is not an empty fiction, but is spread by stories i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The storie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reflect the spiritual culture of university, the stories of events have become the behavior culture of university, the stories of rules reflect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university, the buildings stories reflect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university. These stories have been spread by the generation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condensing or virtual reconstructing.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stories reflects the choi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a university, and also forms the common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mong students of a university. Stories of a university are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heritage of the university,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University Story; Cultural Heritage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研究

岳昌君 邱文琪

摘要: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和计量回归方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学科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工科生的工作落实率最高,理科生的就业起薪最高,而人文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较差。第二,不同学科毕业生工作落实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求职状况和学校背景对于人文和社科毕业生的工作落实均有显著影响;而理工科毕业生则更多受人力资本和学校背景的影响。第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起薪存在显著差异,学历层次对毕业生的起薪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不同学科门类下学历层次所引起的月起薪差异较大。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 学科差异; 就业状况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31-09

一、引言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的数量也逐渐增加,由1999年的90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820万人^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日渐明显,不同学科高校毕业生的供给与社会对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从不同学科来看,2010年工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最高,为88.9%,其次为管理学(86.1%),第三是经济学(85.7%),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最低,仅为70.8%^②,不同学科之间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自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以来,2017年这一比重达到51.6%^③,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对不同学科毕业生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1]。因此,高等教育学科以及专业的结构和数量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变化。

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并存的背景下,不同学科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结果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特点如何、影响不同学科毕业生就业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的解决,将对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因此,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毕业生就业分布研究”,项目编号:71473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6JJD880005。

作者简介: 岳昌君,男,山东荣成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邱文琪,女,河北衡水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 理论基础

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和市场歧视理论有助于解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从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看,当劳动力供给量与社会需求量相一致时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两种形式并存。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引致社会用人结构发生变化,对理工科等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而人文社科的需求相对减少,由此可能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

市场歧视理论中的统计性歧视认为,如求职者的个人特征不能对其实际生产率做出准确预测,企业进行雇佣决策时就会同时利用求职者的个人信息和其所属的群体信息来共同作为决策的依据^[2]。由此可见,高校毕业生在求职时会受到其所属学科的影响,不同学科毕业生就业结果会有所差异。一方面,不同的行业领域和单位类型对特定学科有所青睐,如金融领域更倾向于金融人才而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我国用人单位的发展规模和结构趋向多元化,对不同学科的人才需求呈现显著差异,如IT领域近年发展规模迅速壮大,人才缺口较其他领域更大。

(二) 文献综述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方面,荆德刚(2015)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分析了新常态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指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专业结构问题凸显,文科类专业毕业生比重过大而有效需求不足。^[3]刘敏等(2015)基于东中西部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专业毕业生在工作落实、薪酬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平均薪酬显著高于人文社科,专业设置的供求失衡是造成专业差异的主要原因。^[4]岳昌君的研究发现,城乡背景对高校毕业生工作落实和起薪具有显著影响,城市背景高校毕业生落实工作的概率显著更高。^[5]究其原因,王玉洁等(2016)认为,专业选择可以解释部分农村学生在

就业起薪和进入高收入行业时的劣势^[6]。此外,贺凌等(2018)还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专业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发现理工科毕业生就业的性别差异高于其他专业^[7]。

在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因素时,马廷奇(2013)指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8]苏丽锋等(2016)在分析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配置特征后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是由于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岗位的技能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9]杨翠芬等(2017)发现不同学科本科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理工科本科生就业影响因素中学习成绩和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优势更明显。^[10]杨中超等(2016)的分析发现,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理工类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回报高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同时,专业领域有利于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11]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鲜少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专门从学科差异的角度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特点的学科差异进行专门分析,并运用计量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造成不同学科毕业生就业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样本包括我国21个省级行政区的33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河北、辽宁、山东、江苏和浙江等9个省市的15所高校;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5个省份的9所高校;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9所高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7478份。本文根据核心变量进行清洗,剔除毕业去向、学科门类等关键变量缺失的个案,最

终得到包含13344个观测值的样本。

问卷中的学科门类包括13个, 本文将其合并为人文(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社科(包括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理科、工科和其他(包括农学、医学和军事学)五类。在有效样本中, 人文类毕业生有2328人, 占比为17.45%; 社科类毕业生有5177人, 占比为38.80%; 理科类毕业生有1624人, 占比为12.17%; 工科类毕业生有3427人, 占比为25.68%, 其他类毕业生有788人, 占比为5.91%。

依据学历层次划分, 专科生占25.5%, 本科生占64.2%, 硕士生占9.3%, 博士生占1.0%; 按性别划分, 男、女生占比均为50.0%; 依据学校类型划分, 原“985”、原“211”、普通本科、高职高专和独立学院高校毕业生占比分别为11.3%、17.3%、47.4%、21.0%和3.0%。

(二) 研究方法

由于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并不参与求职, 因此, 剔除样本中选择国内升学、出国出境和其他三类去向的毕业生群体, 设置代表毕业生求职结果的二分变量, 建立如下logit模型, 采用分样本

回归方法, 分析不同学科毕业生工作落实情况影响因素的差异。

$$\text{logit}(P) = \ln[P/(1-P)] = \alpha + \sum \beta_i X_i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P 表示已落实工作的概率, $P/(1-P)$ 为已落实工作与没有落实工作概率的优势比, 即找到工作的机会比率。自变量 X_i 为影响毕业生工作落实的因素, 主要包括毕业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学校背景和求职状况等, 系数 β_i 的符号表示某因素对求职结果的影响方向。 ε 为随机扰动项。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已落实毕业去向的毕业生群体进行分析, 估计各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ln(Y) = \alpha + \sum \beta_i X_i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Y 表示毕业生的月起薪, 对其取对数作为因变量。自变量 X_i 为毕业生月起薪的影响因素, 除上述影响毕业生求职结果的因素外, 还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系数 β_i 表示自变量对月起薪的边际影响, 即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百分比的变化。

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具体说明	
因变量	是否确定单位	否(对照组)和是	
	收入对数	已确定单位毕业生的月工资对数	
自变量	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	女(对照组)和男
	家庭背景	家庭所在地	农村(对照组), 县镇和城市
		家庭人均年收入	3000元及以下(对照组), 3001—5000元, 5001—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1—50000元, 50001元及以上
		父亲受教育年限	根据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推算(文盲与半文盲=2年; 小学=5.5年; 初中=9年; 高中或中专=12年; 专科=15年; 本科=16年; 研究生=19年)
		父亲职业类型	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对照组)和管理技术类职业
		家庭社会关系	不广泛(对照组), 一般和广泛
	人力资本	政治面貌	非党员(对照组)和党员
		学历层次	专科, 本科(对照组), 研究生
		学生干部	否(对照组)和是
		奖学金	没有获得(对照组)和获得
双学位(或辅修)		没有获得(对照组)和获得	

续表1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具体说明	
自变量	学校背景	学校类型	原211高校(含985)(对照组), 一般本科, 独立学院, 高职高专
		学校所在地	东部(对照组), 中部, 西部
	求职状况	实习经历	没有(对照组)和有
	就业状况	就业地点	非大中城市(对照组)和大中城市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对照组), 国家机关, 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 其他企业, 高校和科研单位, 中小学, 医疗卫生单位, 其他
		就业行业	科教文卫(对照组), 农林牧渔业, 采矿、制造或建筑业, 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运输和商业, 房地产、金融和IT,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其他
		岗位类型	专业技术工作(对照组), 行政管理, 企业管理, 办事人员或有关人员, 商业和服务人员, 农林牧渔民, 工人, 其他
		学用匹配	不匹配(对照组)和匹配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学科差异的统计描述

(一) 毕业去向

问卷中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为十类, 本文将“待就业”“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和“其他”四项归为“未落实毕业去向”, 其他六类归为“已落实毕业去向”。由表2可知, 工科类毕业生的工作落实率最高, 为87.6%, 其次为社科

86.0%, 理科毕业生的工作落实率为83.9%, 而人文和其他类学科毕业生的工作落实率较低, 分别为82.6%和82.4%。

在十类毕业去向中, “已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占比最高, 其中, 社科的占比最高, 为41.6%; 而理科毕业生国内升学和出国出境的比例最高, 分别为27.3%和8.8%; 人文毕业生国内升学的比例最低, 为16.9%; 工科和其他学科毕业生出国出境的比例不足5%; 人文和工科毕业生选择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比例相对更高。

表2 毕业去向的学科差异(%)

	人文	社科	理科	工科	其他
已确定单位	37.6	41.6	31.9	40.1	35.5
国内升学	16.9	19.0	27.3	22.4	25.1
出国或出境	7.2	7.2	8.8	3.6	3.0
自由职业	6.5	4.3	3.8	4.9	5.1
自主创业	5.3	4.3	3.5	5.6	3.7
灵活就业	9.0	9.7	8.6	10.9	9.9
待就业	11.8	9.2	11.9	7.1	11.3
不就业拟升学	3.5	2.7	2.6	3.0	3.9
其他暂不就业	1.6	1.3	0.9	1.5	1.4
其他	0.6	0.8	0.6	0.8	1.0
落实率	82.6	86.0	83.9	87.6	82.4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综上所述,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相对更高且毕业选择较为丰富,社科类毕业生确定单位的比例最高,理科毕业生更倾向于继续深造,而人文类毕业生的工作落实情况则相对较差。

(二) 就业起薪

根据毕业生对自己月起薪的估计,本文选取

“已落实毕业去向”的样本,剔除月起薪低于500元和高于50000元的奇异值后,汇总的不同学科毕业生的就业起薪情况如表3所示。总体而言,不同学科毕业生的月起薪存在显著差异。理科毕业生的起薪最高,为5737元;人文、社科、工科和其他毕业生的月起薪均值均低于5000元。

表3 就业起薪的学科差异(元)

	人文		社科		理科		工科		其他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专科生	3090	3000	3313	3000	3364	3000	3562	3000	2749	2600
本科生	4814	4500	5051	4500	4866	4500	4578	4000	4700	4000
学术硕士生	7779	8000	7990	7000	12635	12000	9547	8000	6313	5250
专业硕士生	6311	6500	9823	8000	8500	6500	7375	7000	6136	6000
博士生	9000	9000	9267	8000	11900	10000	14231	14000	8167	8000
总体	4468	4000	4996	4000	5737	4200	4621	3800	4133	3500

学历是造成毕业生起薪差异的重要因素,学历层次越高的毕业生,起薪越高。从不同学历水平来看,就业起薪的学科差异依然存在。在专科生和博士生中,工科类的起薪均值最高;在本科生和专业硕士生中,社科类的起薪均值最高;在学术硕士生中,理科类的起薪最高。理工科和社科都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也较高。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学科差异的回归分析

(一) 求职结果的学科差异

剔除继续深造的观测值后,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9625个观测值。根据模型(1),对不同学科毕业生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人文类毕业生,家庭年收入在5001—20000元的毕业生比3000元及以下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担任过学生干部、有过实习经历的毕业生落实毕业去向的概率显著更高;与原211(含985)高校相比,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与东部地区高校相比,西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在工作落实方面则显著处于劣势。

对于社科类毕业生,男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家庭人均年收入相对较高的毕业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与家庭社会关系不广泛的毕业生相比,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易落实工作。党员、学生干部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更高,毕业生的实习经历对工作落实有显著的正影响;与本科生相比,专科生更有可能找到工作;独立学院的毕业生落实工作的概率显著更低,而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更高;与东部地区毕业生相比,中部地区高校毕业生更有可能找到工作。

对于理科类毕业生,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家庭在城镇的毕业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更高。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落实工作的概率显著更高;与原211(含985)高校相比,一般本科高校毕业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更低;学校所在地在中部的毕业生比在东部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对于工科类毕业生,男生落实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党员、曾担任学生干部、拥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更容易落实工作;与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和研究生落实工作的概率更高;与学校所在地在东部的毕业生相比,中部高校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表4 求职结果影响因素的学科差异

类别	变量及具体说明		人文	社科	理科	工科	其他
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	男	0.213	0.278***	0.335*	0.431***	0.635**
家庭背景	家庭所在地	县镇	0.054	-0.146	0.391*	-0.319**	0.211
		城市	0.079	-0.112	0.621**	0.0819	-0.446
	家庭人均年收入	3001—5000元	0.282	0.321*	-0.146	-0.206	-0.223
		5001—10000元	0.392*	0.162	-0.151	-0.075	-0.255
		10001—20000元	0.502**	0.335*	0.053	-0.364*	-0.261
		20001—50000元	0.400	0.141	-0.257	0.061	0.317
		50001元及以上	0.315	0.572***	0.478	-0.361	-0.947**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16	0.025	0.0004	-0.023	0.030
	父亲职业类型	管理技术类	0.234	-0.124	0.302	-0.0196	0.407
	家庭社会关系	一般	-0.072	0.082	0.019	0.049	0.202
广泛		-0.103	0.334**	-0.020	0.200	-0.300	
人力资本	政治面貌	党员	0.055	0.373***	0.320	0.277*	0.536*
	学生干部		0.656***	0.364***	0.393**	0.244*	-0.0271
	学历层次	专科	0.376	0.512***	0.327	1.010***	-0.074
		研究生	0.129	0.168	1.182***	0.991***	0.128
	奖学金		-0.064	-0.113	0.155	-0.109	0.033
	双学位(或辅修)		-0.219	0.074	0.187	0.095	-0.462
求职状况	实习经历		0.404***	0.678***	0.244	0.327**	-0.014
学校背景	学校类型	一般本科	-0.116	-0.008	-0.471**	-0.208	-0.541*
		独立学院	0.867	-0.635***	0	-0.121	0
		高职高专	0.805**	0.416*	1.410**	0.067	1.041**
	学校所在地	中部	-0.197	0.556***	1.176***	0.954***	0.481
		西部	-0.390**	-0.206	0.327	0.242	0.608*
常数项			-0.331	-0.478	-0.728	0.881**	0.147
N			1619	3510	952	2312	505

注：*、**和***分别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达到10%、5%和1%

(二) 起薪的学科差异

选择已落实毕业去向且月起薪在500—50000元之间的观测值作为样本, 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观测值有5403个。根据模型(2)进行回归, 方程 R^2 为0.433, 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低于1%, 模型总体显著, 回归结果见表5。

与人文类毕业生相比, 工科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更低; 理科、社科、其他学科毕业生的月起薪与人文类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月起薪存在较大差异, 学历层次越高的毕业生, 月起薪越高, 与本科生相比, 专科生的月起薪低26.1%, 而研究生的月起薪显著高出本科生24.6%。根据前文描述统计的结果, 不同学科门类的毕业生在不同

学历层次下的月起薪存在差异, 因此, 加入学科门类与学历层次的交互项。从回归结果看, 在不同学科门类下, 学历层次带来的月起薪差异较大, 与人文类学科相比, 社科、理科和工科研究生的收益更大, 而社科和工科专科生相比人文类的收益更大。

从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其他因素看, 男性比女生高9.2%; 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 月起薪越高; 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更高。党员、学生干部、有过实习经历的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更高。与原211(含985)高校相比, 一般本科、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学校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更低; 与毕业于东部高校的毕业生相比, 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月起薪显

表5 就业起薪的学科差异

类别	变量及具体说明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	男	0.092	0.013	0.000
家庭背景	家庭所在地	县镇	0.005	0.016	0.745
		城市	0.004	0.018	0.840
	家庭人均年收入	3001—5000元	0.028	0.023	0.224
		5001—10000元	0.059	0.023	0.009
		10001—20000元	0.087	0.024	0.000
		20001—50000元	0.050	0.025	0.044
		50001元及以上	0.173	0.027	0.000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02	0.002	0.309
	父亲职业类型	管理技术类	0.048	0.015	0.002
	家庭社会关系	一般	-0.015	0.014	0.285
广泛		0.041	0.021	0.053	
人力资本	政治面貌	党员	0.024	0.014	0.081
	学生干部		0.037	0.013	0.004
	学科门类	社科	-0.022	0.023	0.344
		理科	0.013	0.028	0.635
		工科	-0.049	0.028	0.082
		其他	-0.049	0.053	0.357
	学历层次	专科	-0.261	0.051	0.000
		研究生	0.246	0.043	0.000
	奖学金		0.016	0.013	0.233
	双学位(或辅修)		0.022	0.019	0.228
求职状况	实习经历		0.031	0.016	0.055
学校背景	学校类型	一般本科	-0.203	0.018	0.000
		独立学院	-0.333	0.045	0.000
		高职高专	-0.370	0.041	0.000
	学校所在地	中部	-0.151	0.016	0.000
		西部	-0.262	0.021	0.000
就业状况	就业地点		0.103	0.018	0.000
	单位性质	国家机关	-0.142	0.041	0.001
		私营企业	-0.008	0.017	0.617
		三资企业	0.117	0.028	0.000
		其他企业	0.015	0.024	0.530
		高校和科研单位	-0.030	0.039	0.449
		中小学	0.015	0.036	0.680
		医疗卫生单位	-0.030	0.058	0.609
		其他	0.010	0.029	0.726
	就业行业	农林牧渔业	-0.093	0.042	0.024
		采矿、制造或建筑业	-0.042	0.023	0.067
		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19	0.038	0.611
		运输和商业	0.002	0.025	0.948
		房地产、金融和IT	0.074	0.022	0.001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0.008	0.029	0.771
		其他	0.045	0.029	0.124
	就业状况	岗位类型	行政管理类	-0.017	0.024
企业管理类			0.025	0.020	0.200
办事人员或有关人员			-0.061	0.022	0.005
商业和服务人员			0.003	0.021	0.884
农林牧渔民			-0.011	0.047	0.814
工人			-0.061	0.031	0.048
其他			-0.085	0.025	0.001
学用匹配			0.042	0.013	0.001

续表5

类别	变量及具体说明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交互项	社科*专科	0.120	0.042	0.004
	社科*研究生	0.119	0.049	0.016
	理科*专科	0.058	0.059	0.327
	理科*研究生	0.270	0.068	0.000
	工科*专科	0.211	0.044	0.000
	工科*研究生	0.167	0.057	0.004
	其他*专科	0.140	0.067	0.037
	其他*研究生	-0.053	0.092	0.562
常数项		8.327	0.056	0.000

注：表中给出的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著更低。就业状况方面，在大中城市就业、选择学用匹配工作的毕业生月起薪显著更高；与进入国有企业的毕业生相比，在国家机关工作月起薪显著更低，而在三资企业工作的月起薪显著更高；与进入科教文卫行业的毕业生相比，进入房地产、金融和IT业更容易获得高起薪，而进入农林牧渔业工作的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更低；办事人员或有关人员、工人等毕业生的月起薪显著低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在求职结果和起薪上的学科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在毕业去向和就业起薪方面，工科毕业生的工作落实率最高，理科毕业生的就业起薪最高，社科类毕业生的月起薪其次，而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工作落实率和月起薪均较低。

第二，不同学科毕业生求职结果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于人文和社科类毕业生而言，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社会关系、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实习经历、学校类型和学校所在地等对毕业生的工作落实具有显著影响；而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背景对理工科毕业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学历层次、学校所在地等人力资本和学校背景特征对理工科毕业生工作落实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三，不同学科毕业生的就业起薪存在显著差异，与人文类毕业生相比，工科毕业生的月起薪显

著更低；学历层次对高校毕业生的月起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历层次越高，月起薪越高；学科门类与学历层次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学科门类下，学历层次所带来的月起薪差异较大。

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和市场歧视理论，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现状，为缩小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科差异，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国家在大力发展创新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大环境下，应继续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将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强国。本文的研究显示，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但收入却最低，说明市场对工科毕业生的需求很大，但工科就业单位中国企业的占比较大使得收入的刚性较大。为此，政府应调节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在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工作的毕业生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学子选择工科学习，让更多工科人才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专业知识，提升我国制造业及相关行业的整体水平。

第二，为解决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高校应重视学科专业建设，依据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求，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结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地区结构，动态调整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

注释

①数据来源：就业促进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EB/OL].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803/t20180312_289571.html, 2018-3-2/2018-9-26.

②数据来源: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2009-2010)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③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018-2-28/2018-9-2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2018-09-10) [2018-09-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 [2] 伊兰伯格, 史密斯, 刘昕等. 现代劳动经济学(第8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荆德刚. 新常态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与任务[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12): 37-40.
- [4] 刘敏, 陆根书. 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差异的比较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5(7): 202-208.
- [5] 岳昌君.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城乡差异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2): 92-101.
- [6] 王玉洁, 刘雅丽, 李泽冰等. 户籍差异与大学生就业——基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 劳动经济研究, 2016(2): 72-94.
- [7] 贺凌, 岳昌君. 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高校不同专业毕业生就业结果的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和2015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7): 60-66.
- [8] 马廷奇. 产业结构转型、专业结构调整与大学生就业促进[J]. 中国高等教育, 2013(Z3): 56-59.
- [9] 苏丽锋, 陈建伟.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配置状况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4): 2-15, 126.
- [10] 杨翠芬, 孟雪. 不同学科本科生就业影响因素差异分析[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7(12): 62-66.
- [11] 杨中超, 岳昌君. 学历、专业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研究, 2016(10): 65-7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Gaps of College Graduat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Yue Changjun Qiu Wenqi

Abstract: Based on a national scale survey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2017,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gap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by using the statistical and quantitative regression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 work rate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s the highest, and the monthly starting salary of science students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humanities graduates is poor. Secondl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orking implementation of 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their respective focus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mily background, human capital, job search condition and school background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graduates; wh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human capital and school background. Third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tarting salary among college graduate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arting salary, and the difference in salary from the level of education under different disciplines is also greater.

Key words: College Graduates;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Employment Situation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探讨

秦 燕 葛 曲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仍存在需要完善和可创新之处。本文主要从博士生课程体系建设、学位论文写作两个方面分析了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40-08

从200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位点和招生规模迅速扩大,成为目前我国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点最多、覆盖面最广、发展最快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实现了超常式发展,面临着极佳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发展过快使得学科在基础因素方面出现不够扎实的问题,目前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学科建设必须从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其中作为学科建设重要内容的人才培养问题更应得到充分重视。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其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样,也是衡量一个学科发达程度以及该学科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和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志。因而,创新能力是博士生人才培养的重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要求是“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1]不难看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创新型的学术人才。

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现行培养模式之间有密切关系。我国学者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众说不一,主要集中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位论文、管理制度、招生、导师指导、质量评估等。随着培养模式日趋多样化、制度化、科学化,总的趋势突出了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的实践中,有许多问题和疑惑需要思考和探讨。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与其它学科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否应有不同?怎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本文认为,在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中,课程体系建设与学位论文写作是最基本的两个环节,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核心要素,体现了创新能力的系统训练。因此,以下围绕创新能力的培养,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中的课程体系建设和学位论文写作的问题。

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GZ0101;2019年度博士论文创新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化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CX201930。

作者简介: 秦燕,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葛曲,女,河南长葛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提高博士生创新型思维能力

学科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整个学科人才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博士生掌握系统理论知识从而提升创新型思维能力的基础条件。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普遍重视课程学习,并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设立了博士生资格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博士生对相关研究领域文献和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只有通过了资格考试之后,他们才能真正开始学术研究的主业。正是由于课程学习阶段掌握了广博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之后的科研过程中博士生才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潜质。

但是,从目前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实力雄厚的综合大学之外,相当一部分学校和学位点开设的博士生课程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由于各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高校根据自身教师学历背景设置课程,所开设课程不能有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特点。一部分课程属于本学科的核心课程,另一部分课程则与本学科相关程度比较低,导致对博士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体系的系统训练不完整。课程学习的随意性,严重限制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另外,已开设课程缺乏前沿性、课程内容更新慢、学术性不足,对学生缺乏吸引力,也满足不了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为,需要遵循课程体系建设的原则,从完善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层次、提高课程质量等方面着手,使课程学习真正起到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作

(一) 遵循课程体系建设的原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05年下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指出:“马克思主义既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

系。”^[2]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基本思路的重要说明,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构与建设研究》提出:遵循一级学科内在逻辑体系要求,按照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原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原则;人才培养的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三者相统一的原则;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设置一级学科层面的课程。总体上说,应该按照二级学科招生,一级学科培养的培养模式进行课程体系建设。^[3]

(二) 明确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层次

课程体系建设应体现学位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以及跨学科课程的结构和层次。学位基础课应当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学科基础课和学科专业课中提炼出,如设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等课程,作为六个二级学科的通开课程,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层面的课程。此外,还应根据各二级学科的学科特点、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有针对性地开设符合二级学科定位的专业核心课。这类课程不仅要与一级学科的学位基础课有一定的契合度,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二级学科的边界性。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范畴与体系研究课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开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前沿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学说史课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课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开设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课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开设史学前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专题研究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专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专题研究课程。

在各二级学科的专业课程中,学术史课程、方法论课程非常重要,是课程体系中的基础课程。

学术史课程是对博士生进行学术谱系和学术语境的学术训练,主要在于培养其学术研究的素养和眼光,能够对研究选题的定位和研究的前沿领域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辨识性。它在某些博士生培养方案中被称为历史性课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具体地说,设置学术史课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使博士生了解某一研究领域的源流与发展,尤其是该领域中的著名学者及他们的主要观点,以及这些观点产生的学术语境;第二,学术谱系不仅是学术流派,有助于博士生明确其研究领域在学科发展链条中所处的学术定位,还是学术流派中所关心的议题,有助于博士生全面把握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第三,建立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防止学术的碎片化,这实际上是博士生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文献梳理过程,也是对其写文献综述的学术训练过程。目前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中忽视了学术史课程的开设,对理论和知识的孤立性讲授易造成学术谱系的断裂,造成学术的碎片化,最终难以建立起学科的话语体系。反映在博士生的科研工作中,由于不了解某一学科或某一理论方法的发展史,易造成对其内涵、切适性、适用范畴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难以构建起系统性、整体性的专业知识体系。

方法论课程指的是教授“方法的方法”的课程,无论是学位基础课还是专业核心课,都属于知识性范畴的课程,而方法论是一种理念、观点、立场等观念形态,表现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具体形态。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就是要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通过什么样工具和方式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范式包括张耀灿提出的人学范式^[4]、余双好^[5]和沈壮海^[6]提出的多角度多学科研究范式、万美容^[7]和余双好^[8]提出的行动研究范式等;研究方法包括郑永廷提出的经验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理论思维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现代科技方法、质性研究方法等^[9],陈万柏和张耀灿提出的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社会调查法、总结经验法等^[10],它是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办法。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只有建立具有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才能清晰界定学科边界,形成“科学共同体”并持续稳定发生效应,才能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化。

对于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而言,方法论犹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道”,犹如“授之以渔”之“渔”。掌握了方法论,博士生才能明确一个问题是否属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才能判断研究对象所属的研究领域,才能在本学科的话语体系内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方法论课程的开设,致力于开发博士生的综合研究素质,培养训练博士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型思维。在目前博士生诸多培养环节中,科研论文撰写水平尤能反映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大部分博士生表现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欠缺,这往往就是因为博士生还没能掌握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少高校在博士生课程体系中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案例课、信息检索课。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课程,作为一级学科层面的方法课,通过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从事实出发、矛盾分析、总体性方法等,使博士生能够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备更深层次的哲学思维。此外,部分二级学科又增设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课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课程,主要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及其创新与难点,把握重大理论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规律以及科学方法。^[11]

确定了学科、专业的核心课程,还需要确定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培养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自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基础支撑,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参与和辅助,优化师资配置,聚合专业知识,这也是多角度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必然要求。开设跨学科课程的目的是要拓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前沿学科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以完善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渗透,开展深刻对话,可以深化专业教育,帮助博士生整体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和独立出来的,与其他相

关学科存在密切联系,诸如,“它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学科,与政治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与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等”^[12],都是相互联系且不容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理所当然地要参照、借鉴其他学科的某些课程,且选修这些跨学科课程对于拓展博士生多学科、多层次的理论知识具有重要基础作用。然而,部分院校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在博士生培养“合力”上的自觉认识,科际资源整合效果欠佳,课程设置只注重本学科知识体系,并未涉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课程,相当程度上局限了博士生研究的学术视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知识体系与方法协同、跨学科基础理论借鉴与思维逻辑建构、多学科平台合作与对话体系搭建等方面都亟待加强和改进。^[13]

(三) 在课程讲授内容和教学方式上狠下功夫

要提高博士生课程质量,还必须在课程讲授内容和课程教学方式上狠下功夫。好的课程设置不仅能保证研究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重视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博士生课程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具有“难、精、深”和“广博”的特点,必须体现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即导师通过对学科前沿信息的把握和综合,引导学生关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思考。在课程教学中,宜采用专题性讲授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使讲授的内容更深入,学术性和专业性更强;另一方面可以体现各位导师的研究特长,便于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引导学生尽快进入某一研究领域。课程教学方式也应该是研讨式的,除教师课堂讲授外,更要注重在讨论中对学生进行理论、方法的训练,对博士生提出课外大量阅读文献的要求,培养学生为真理而求知的热忱,增强学生独立研究的主动性,以及探究和创新的自觉性。建设高水平的博士生课程,师资水平是关键,一支高质量的导师队伍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条件。综合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其他学校师资有限,因人设课情况较多,必然影响课程质量,造成该学的没有学,该深入的不能深入。可以通过外聘教师,专家

讲学、授课的方式,还可以考虑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体系,以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四) 重视“第二课堂”,提升学术交流能力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还要注意将课上课下相结合。博士生经常性地参与读书会、研讨会,作为课程学习成果的补充和加强,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创造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引导博士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同时从丰富学科视野的角度,研读一些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通过研读,既掌握经典文献的基本内容,又能深入了解这些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当代价值。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其未来职业规划大多倾向于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教学、科研、宣传教育与党政工作,这要求博士生在拥有广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还能够具备一定的口头表达、合作、沟通、组织协调等能力,而读书会、研讨会恰是培养学术交流能力的第二课堂;二是博士生自己准备演讲、汇报的题目,并向大家展示其研究成果,分享阅读心得,通过博士生之间互动交流、专家点评的方式,博士生可以学习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如何接受质疑、回应批评,并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而对别人的研究提出挑战,同时迎接同行的挑战,对提高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提升学位论文写作质量,激发博士生创造性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的核心要素,也是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博士生进行创造性研究、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成果。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的几种表现:“一是简单移植,只是对他人方法的应用和重复;二是简单揭示表面现象,没有深入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三是简单延伸,只是进一步证实他人的工作;四是简单推理,只是采用一定的实验证实已知的结论。”^[1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以上的这些不足。比如常见的论文

写作套路,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只是简单罗列几代领导人的讲话,不做应有的学理方面的深入分析,导致所谓“简单揭示”。方法是工具,目的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揭示、论证新的思想和观点,但在一些博士学位论文中,所谓多学科、跨学科往往成为装饰性和应景性说法,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显得较为生硬,对理论和观点创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出现所谓“简单移植”。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关注论文的选题、论文写作的逻辑训练、导师指导和评价标准等问题,提升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激发博士生创造性研究。

(一) 学位论文选题强调具有较高价值

博士生作为其所在领域的研究骨干,可以说在国家自然科技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其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应该能够对重要问题进行评价,提出批判,做出辩护,同时也能独立或与他人协作提出和定义重要问题”^[15]。换言之,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求学生涯乃至未来研究方向的“代表作”,必须集学理性、实践性为一体,具备一定的创新创造力,以学术热情和“学术冲动”在个人研究领域为学术发展尽其绵薄之力。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学科的研究视域及学科发展状况。选题蕴涵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反映博士生的学术阅历和素养,考验博士生的洞察力,选题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学位论文的质量。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要具有高起点,敢于探索未知的新领域。例如,能够填补理论研究的空白,研究具有前瞻性,这类具有高价值和高难度的选题对于真正有学术潜力、立志做学术的学生来说,具有挑战性,能够唤起创新的热情,激发创新的潜力,从而产生出创新的成果。选题是否有较高的价值,取决于学生的学术积累和悟性、导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当一批学位论文创新点不突出,质量平庸,其原因一是生源数量虽多但质量一般,专业基础薄弱,因而无法找到真正可以创新的选题;二是一定程度上的功利思想泛

滥,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把获取博士学位当作改善就业机会的阶梯,因而选择难度较小质量平庸的课题以尽早毕业。

总体上来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立足于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涉及学科知识面很宽,需要各学科的综合知识,一级学科上的选题,利于科研的宽度和厚度,也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来源复杂的现实状况。但是选题的广泛性并不意味着漫无边际,还应注意学科的界限性,避免选题庸俗化。选题一般有以下来源:第一,阅读文献。关注本学科的核心期刊,这些期刊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学术前沿以及当下热点问题。第二,关注学科代表性人物。他们代表着本学科的研究水平,研读其著作,可以了解学科前沿问题,学习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还可按照其著作的参考文献“按图索骥”,对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三,紧盯前沿动态。参加学术研讨会、聆听学者报告也是获取学科前沿动态的有效途径。^[16]第四,社会热点。一般出现于新闻、微信微博热搜,这是产生于中国实践的社会聚焦点,但是这类材料需要谨慎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判断该问题的真伪,提炼问题意识。

(二) 学位论文写作应加强逻辑训练

写作即思考。博士学位论文展现的是博士生对研究领域已有学术成果的掌握程度,揭示的是博士生总结、分析、解释信息的能力,因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博士生将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内化并将其外化为文章的过程。^[17]在这之中存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文字表达与行文内容。文字表达是形式的方面,直接影响到行文内容的呈现和可理解性,但它并不能代替内容,这就需要文字表达和行文内容都要合乎逻辑。逻辑是指研究者的思维形式、思维的基本规律及思维方法,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判断、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按照教育规律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系统而深入的逻辑训练有助于培养博士生正确的思维习惯,提高思维效率,可以锻造博士生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创新思维是逻辑思维过程的产物,在提高博士生逻辑思维素质的基础上,能够提升其创造

性研究,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有学者总结了目前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所选主题的已有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不能作出客观全面的叙述,对所选主题应使用什么研究方法不能作出清晰的交代,对逻辑结构的安排及叙事理路的展现不能作出合理的和有利的表达,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18]一般而言,逻辑上不严谨可能是由于掌握知识的片面性造成的,但是与缺乏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和文字表达的训练也相关联。导师指导博士生,要注重博士学位论文的逻辑训练过程,把控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是否具有科学性和条理性,能否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得出研究结果并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地表述出来。

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强调逻辑论证的严密性,是指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19],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强化逻辑训练。学位论文是由学术理论观点及对其的逻辑论证过程构成的,是用概念、判断、推理来表达的。为开展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博士生必须从全局性的角度展示自己的学术再构能力,完成一篇核心概念清晰、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的学位论文。具备较强思辨能力的同时,博士生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以充分、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进入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前提。^[20]学位论文写作要以扎实的汉语功底为基础,没有好的语言表达,往往会“词不达意”,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的表达和使用,都要经得住打磨、分析和推敲,还应注意以叙为主,叙议结合,注意逻辑顺序,不能混淆写作秩序。此外,多写多练是加强博士生逻辑训练的基本功,要创造更多条件,给博士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鼓励将博士学位论文与研究项目相结合、与课程学习相结合,由导师指导学生写科研课题申报书,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

(三)注意解决好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还应特别注意解决好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与

学术性的关系。“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特征。”^[21]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为其理论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与丰富;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学科教育的根本任务,着力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靠谁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强调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其学术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建立伊始就显示出其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统一,学术性是意识形态性的科学根据,意识形态性是学术性的发展动力。^[22]有学者指出,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着轻视现实、重视文本,轻视中马、重视西马,追求学术性、回避政治性的“逃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生”。^[23]

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纯粹学术性的问题,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有时会掩盖了价值判断,似乎显示出价值中立,而真正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不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研究问题的指向以及理论框架的选择已经显示其前提预设,这即是学科所言“范式”问题。它代表了学者的立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依据一定的语境,可以是学术语境,当然也包括社会语境、时代语境,这也正是一名学者的社会关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如果忽视了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脱离了对时代发展的价值需求,其理论研究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彰显学科特色,发挥学科功能,忠于本学科的学术使命、社会发展和时代担当。

(四)导师个别指导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大多为“师徒式”的导师责任制,导师承担培养学生的主要责任,包括科研方向的选取、研究

方法的训练、文献资料的归纳检索、学术观点的分析甄别、论文写作的训练等。因此,导师的学术素养、科研水平、研究视野将会直接影响与制约学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一项针对全国44所高校博士生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4]应创造条件让教师参与国内外的高水平学术会议,与同行专家交流沟通,接触把握学术前沿,了解同行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趋向。还可以到国外去进修,引进国外专家讲学,开阔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在培养方式上也应将导师个别指导(第一责任人)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学院及学位分会要指导和检查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从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正式答辩,每一个环节严格要求,保证博士学位论文高质量完成。

(五)制定本学科学位论文评价标准

要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评价标准。目前我国博士生培养以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为目的的取向,重视结果评价,轻视过程评价,使实际培养的效果大打折扣;即使在现有评价标准下,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问题,评阅专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学位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应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对学位论文的评价指标、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做出明确的界定,强化过程评价,突出能力评价,以减少论文评价的模糊性,突出对学位论文创新性的要求,改变多学科共用一套评价标准的现状。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该有其博士生培养的学科特色,按照其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敬业精神;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具备一定的学术敏锐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承担学科发展、传承的使命和责任,在保持学科活力以及创新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对理论上的创新和

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均有较高的要求,这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EB/OL].2004-8-28.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19/200407/1315.html.
-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EB/OL].2005-12-23.http://www.moe.gov.cn/s78/A22/s7065/201410/t20141021_178219.html.
- [3]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总体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07(11):7-8.
- [4]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 [5]余双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0):83-89.
- [6]沈壮海.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2):40-46.
- [7]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8]余双好.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推动行动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11-15.
- [9]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01-308.
- [10]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9-22.
- [11]张雷声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367-409.
- [12]周向军.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若干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08(19):48.
- [13]康秀云,郝厚军.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2):21.
- [14]瞿海东,章丽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几点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2(10):70.
- [15]夏元清,邓志红,戴荔,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法探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5):19.
- [16]袁毓林, 王恩旭. 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5):44.
- [17]余双好.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6(17):41.
- [18]杨乐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的系统化路径探讨[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1):69.
- [19]朱建平. 作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逻辑[J]. 学术界, 2017(1):140.
- [20]田心铭.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要言之有物、有理、有序[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3):81.
- [21]张雷声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282.
- [22]潘莉, 黄志斌.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色[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1):54-55.
- [23]陈先达. 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培养我们的博士生[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3):74.
- [24]黄海刚, 白华. 博士生需要什么样的导师? ——基于对全国44所高校博士生的问卷调查[J]. 高教探索, 2018(8):40.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Qin Yan Ge Qu

Abstract: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area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innova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s about the cultiv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from two aspects: construction of course system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 words: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Cultiv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反向融合：传统媒体衰退背景下新闻业的边缘化与未来进路

丁和根

摘要：在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处于衰退之中，新闻业也在逐步边缘化。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新闻业以其独特的秉赋成为一切信息传播当之无愧的中心，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运作系统和运行机制，并以此作用于整个社会，成为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因素。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虽然是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但它们并不必然能继承和发扬传统新闻业的优秀传统。媒体融合是传媒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既往的融合主要是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单向靠拢，无法解决新闻机构的赢利问题。反向融合旨在建立新闻机构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新型商业关系，使新闻业得以再中心化。

关键词：新闻业；边缘化；反向融合；再中心化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1-0048-09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新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社会存在，但没有人否认，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其实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指通过专业化的机构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最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新闻业也就是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新闻机构的集合。自从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介出现之后，人们发现新闻这种带有鲜明专业性色彩的信息不再是专业新闻机构垄断的专利了，新闻不再像原来那样按照既定的轨道和方向向前运动，而是在网络丛林中像水一样自然漫流。特别是建立在互联网这个基础平台之上的各种新媒体的日益兴盛，新闻传播不再不再是新闻机构的专利，甚至传播的话语权也不再那么肯定地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人们看到的是传统媒体不断衰退的景象，看到的是新闻业的逐渐边缘化。新闻业的命运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从容有常，而似乎随时都将有被革命的危机。传播是连通社会和一切人类生活的必经之路，新闻传播是一切传播中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部分，新闻业悬而未定的地位和命

运，使社会发展正遭遇着潜在的传播危机，这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的一种共识是，必须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能享受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红利，又能纾解传统媒体之困，使新闻业保持正常发展的状态。但此前的融合主要是传统媒体为解决与受众的连接问题而单向发力的行为，它无法解除新闻机构的赢利困局。因此，媒体融合还要在原有基础上再辟新路，通过反向融合使新闻机构与互联网商业平台之间建立起内容交易的新型商业关系，这样才能使新闻业重回传播中心化的位置。

一、传统媒体危机与新闻业边缘化的典型镜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引进中国，传媒业界或许没有想到，这将是整个传统媒体走向危机的开端。新世纪初，报业迎来第一个寒冬，许多人这

作者简介：丁和根，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媒介经济与管理。

时还抱有乐观态度，然而在经过几年的短暂恢复期后，第二波冲击接踵而至，这次报业可谓毫无还手之力，彻底跌入了低谷。这种困境同样体现在电视身上，只不过时间比报纸稍稍延后，冲击程度不如报纸那么惨烈而已。

传统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的第一个景象是受众的纷纷逃离，其直接传导的后果表现为报纸发行量的下降和电视开机率的降低。都市类报纸昔日动辄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盛景已成明日黄花，许多家庭中原来难以离开的电视机现在也成了摆设。数据表明，全国报纸发行量持续多年下滑，2017年全国出版报纸种类较上年降低0.5%，总印数降低7.1%，总印张降低15.1%；^[1]2018年上半年，全国人均收看电视时长较上年同期降幅为8.33%，日均观众规模降幅为8.06%^[2]，中青年群体观众流失严重。这其实都是在前几年已经非常糟糕的基础上的数据。

受众流失、发行量下降和开机率降低进一步传导的结果是传统媒体广告收入的直线下跌。自2014年以来，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已连续四年负增长。^[3]2017年广播电视广告收入首次负增长，较2016年下降1.84%；报刊广告和发行则继续“双降”，整体市场下滑14.8%，其中报纸广告市场的跌幅更是超过了30%，市场整体规模已不足150亿元。^[4]2018年，传统广告刊例花费、刊例收入同比继续下降，广告时长和广告面积同比减少仍很显著。传统报业和电视业的正常运转，建立在成熟的商业模式即内容价值通过广告变现的基础之上。当广告这个经济支柱发生动摇甚至断裂的时候，报纸和电视陷入经营困境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由于行业不景气，不少媒体只能靠裁减人员和缩减开支来应对困难，还有一些报纸则直接停刊。近年来，多家报纸宣布停刊休刊，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上半年停刊的报刊就有20多家。^[5]这使得传统媒体中曾以新闻事业为光荣梦想和人生志业的许多精英骨干或陷入苦闷彷徨，或选择直接逃离。2018年，《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北京青年报》总编辑余海波、《萧山日报》社长、总编辑王平先后转行，南都报系总经理钟育彬、21世纪报系副总经理戴远程等也纷纷离职。^[6]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媒体精英的精神苦闷和纷纷逃离，必然导致传统新闻机构新闻生产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从数量上看，各大报纸竞相缩减新闻版面，减少出版期数；从传播方式上看，一些报纸停印纸质版，而将内容转移到新闻客户端上发布；从质量上看，一些传统新闻机构缺乏严格把关，频频出错。以情况比较突出的2015年为例，新华社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错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写成“奥马巴”，导致《烟台晚报》《东南快报》《亚太日报》《今日早报》等十数家报纸集体错报^[7]；《南方都市报》《佛山读本》将“众创”错写为“重创”，“致辞”误写为“辞职”^[8]；《三亚日报》的《三亚下拨3 000万元建19个村级活动场所》一文将“组织部”错写为“贪污和受贿部”^[9]，等等。这些错误，无疑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传统媒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互联网以及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各类新媒体的高歌猛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10]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各类社交媒体也是方兴未艾。近年来，社交媒体已形成平台型、社群型、工具型和泛在型四种网络社交模式和社交网络生态^[11]，成为互联网第一大流量来源。^[12]虽然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并非有我无他的关系，但两者的此消彼长以及前者流失的受众和广告大多迁移到了后者身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的10多年中，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载体，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和智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受众的信息接受行为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境中，人们用在媒体接触方面的时间和精力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据统计，2018年6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人均使用时长已达到280分钟/天^[13]，这超过报刊日均接触时长的十倍以上。《第十四次中国新媒体接触习惯报告》表明，网民微信使用率已达近九成，近六成用户习惯通过“腾讯新闻”浏览新闻，习惯通过微

博和微信媒体账号浏览新闻的也超过四成，这表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已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渠道。^[14]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也往往是通过社交媒体首先加以关注并进行讨论的。2018年7月21日，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刷屏各大社交媒体，收获近200万阅读量，引爆网络舆论，推动“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微博（86.64%）、论坛（3.55%）和微信公众号（3.20%）是该舆情事件的主要传播平台，《问题疫苗已打入21万孩子身体：比问题疫苗更可怕的是拒绝疫苗》等多篇自媒体文章阅读量达到10万+。^[15]据统计，相关舆情主要是集中分布在社交平台（90.68%），远远超过其在新闻和APP平台的关注度（分别为3.20%和2.85%）^[16]。这说明，一些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舆论，其最初的发动者变成了新媒体，传统媒体只是充当了跟进者的角色。以上案例只是就公共事件而言的，至于其他的娱乐性事件，就更是新媒体自由驰骋的疆场了。这不能不让人对传统新闻机构的舆论影响力感到担忧。

中国的情况如此，国际新闻界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以报业为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表明，近年来美国报纸发行量、广告量均大幅减少，报业发展陷入危机。^[17]2017年美国日报在工作日和周日的总发行量与2016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1%和10%。^[18]为维持运营，自2017年以来，近四成美国大型报业集团裁员，报业精英快速流失。^[19]

可见，无论是经验性的观察还是来自各种渠道的分析结果，人们都不难感受到，随着传统媒体陷入衰退，传统新闻业正在被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它有这样几个典型的表征：一是传统新闻机构在与新兴媒体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大量新闻机构不仅陷入了经营困境，而且出现了新闻数量与质量、影响力和公信力都在下降的趋势。二是受众更多地转向以新媒体为中介接触信息，而在所接触的媒介信息中，严肃的新闻信息所占的比例远不及娱乐性新闻以及其他非新闻类的信息，传统新闻业似乎正在被受众逐渐疏离或淡忘。三是传统新闻机构的议程设置力和舆论影响力正受到有力的挑战。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为什么民主

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证明了民主社会不能没有“不可爱”的新闻界，但他所说的传统形态的“新闻界”正在遭遇着传播新技术和新兴媒体力量的瓦解，而新形态的新闻业并未随着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崛起而水到渠成地出现，新闻界对社会发展所承担的各种功能不是被削弱就是被抛弃，人们所关注的更多是传播变迁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而对有可能存在的负面维度的影响却缺乏足够的警觉。

二、传播新技术和新兴媒体的认知迷思

互联网以及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各种新兴媒体，天然带有新传播技术的基因，因而在技术亲近性、信息生产机制、资源整合模式与传播方式创新等方面都在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中拥有相对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

从技术亲缘角度来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与大数据、云计算、VR/A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着更密切的相关性，而传统媒体则由于路径依赖作用，与这些新技术存在较大的隔阂。由于诸多新技术的运用，人类传播出现了移动化、社交化和智能化等趋向，这些概念无疑更像是新兴媒体的专用标签。传统媒体尽管也强调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融合转型，但收效似乎并不理想。

在信息生产机制方面，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互联网和其他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正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用户生产内容（UGC）、机构生产内容（PGC）、机器生产内容（MGC）以及混合生产内容（PUGC）并存的格局。一些新的新闻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对原有的手段和方式形成了更新或替代。例如，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新闻日益兴起，也使得新闻生产的流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互联网的存在，让全球的信息汇聚到一起。传统的新闻业不可能做的一些新闻报道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对全球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从而做一些全球化的新闻报道。这在技术上和路径上实现了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说，新闻记者报道的范围增大了，记者可利用的素材增多了。”^[20]这份荣光显然

也主要属于新兴媒体。

在资源整合方面，由于互联网不仅自身具有媒介的属性，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基础平台的特征，使得多种形态的新媒体形式可以借助这一平台找到用武之地。新兴媒体可以依托平台化传播，将“技术要素、资源要素、社会要素关联起来，新闻与数据、用户、平台之间的联动也更为紧密”^[21]。2017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托尔数字新闻中心发布《平台新闻：硅谷如何重塑新闻业》的报告指出，美国新闻业正迎来第三次浪潮，平台公司与新闻机构正在加速融合，重塑新闻业态。^[22]而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科技公司迅速发展，深刻改变、塑造了整个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发展路径。平台依靠算法筛选内容，定向发布，既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提升传播效率，却又限制了媒体的编辑决策，攫取了大量广告收入。2015年，全球数字广告76%的收入被谷歌和脸书收入囊中，而在201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4%。^[23]

在传播方式方面，移动新技术使得传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并且将传播变成了一种日常社交行为。数据化和智能化技术使得新闻呈现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外，视频、音频、漫画、3D立体人像、交互直观、超链接、动态数据地图等形式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这样的内容呈现显然比传统媒体固定单一的呈现方式更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此外，由于算法对于新闻业的接入，平台媒体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以及内容的聚合分发，这既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们接受新闻的习惯。有研究表明，移动互联网用户中的大多数人接触新闻，是通过算法推荐来完成的。比如，2017年牛津路透新闻研究所在对欧洲、美洲和亚太地区36个国家的7万名受众的分析后发现，超过一半（54%）的受访者更喜欢通过算法来筛选的故事。^[24]

这样的认知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和新兴媒体必能顺利接过传统新闻业的接力棒，从而对传播新格局中新闻业的前景持有更偏向乐观的态度。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认为新闻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

数量更多，传受主体与新闻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由于在线、实时、移动等变成常态，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传播和接受新闻，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接受到巨量的内容，可以用搜索引擎按主题进行内容检索而省去传统的人工分类搜寻的烦恼。对于财经、体育等规范化程度比较高的新闻，机器新闻不仅生产速度快，而且稿件的产量也远远大于记者所撰写的稿件。计算机软件24小时随时待命，不需要休息，可以不间断地高强度工作；伴随着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不断升级换代，基于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也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25]“未来传感器的普及，将意味着自动化信息采集的大规模应用。作为信息采集工具的传感器，可以达及人的感官不能达及的深度与广度，这将为机器写作带来全新的可能。”^[26]

二是认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从告知转向对话，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而且可以自由地进行角色转换。大数据新闻丰富的呈现方式、多元化的描述方法，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新闻表达方式，促进杜威的“对话新闻”表现形式替代李普曼式的“告知新闻”表现形式。……多元化的数据新闻呈现方式能够使新闻受众群体与新闻作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实现观众与新闻主持人的实时交流，提高新闻传播的实时性、高效性以及互动性。^[27]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过对不同语料库语言风格的智能化机器学习，结合对每个用户阅读习惯的自动化分析，机器新闻可以自动生成适应不同人群语言习俗的表达方式，能够针对同一新闻事件生产出不同风格的内容版本，以适配不同受众的需求。^[28]

三是认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权力发生转移，作为新闻传受主体的草根民众在社会传播关系网络中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权力。在传统媒介格局中，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是新闻源、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垄断者。而在移动互联时代，新兴媒体为草根民众赋权，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新闻接收者，新闻从业者也不再是新闻垄断者，受众与传播者的角色常常互换，公众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新闻的挖掘、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同时，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可以进行实时的讨论和分享，传播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了普通大

众手中。

必须承认，新传播技术和新兴媒体是社会发展的全新变量，它顺应了人类新的时代需求，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新的变量也正在逐渐动摇甚至是瓦解一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传统新闻业。这个行业最核心理念是，新闻传播是为建立和巩固社会民主制度服务的，由此也便决定了它在社会整体结构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从西方到中国，从近代到当下，尽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各异，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人们对新闻业的地位和功能仍有着一些普遍的共识。美国人认为新闻业是“第四种权力”，因而记者是“无冕之王”；中国人认为新闻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因而记者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和“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虽然两者的内涵有着本质差异，但两者都认为新闻业及其从业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和作用。这些作用可以集中概括为：议程设置、舆论监督或引导、民意收集、社会粘合。

如果说，无论新闻业态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传统新闻业的这些功能仍能得到保持，那自然也就不必杞人忧天。因此，我们所关心的真正问题其实是：在传统新闻机构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新闻业的主导力量能被新兴媒体顺利取代吗？新的媒体生态尤其是新的媒介技术能否保障社会公众接触到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严肃新闻，以便使新闻业仍然能发挥它对社会应有的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

现实的状态是：一方面，在传统媒体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处境的困顿和新闻的乏力；另一方面，在新兴媒体身上，我们又很难看到对新闻业固有传统的有机传承，很多时候所能感觉到的却是反向解构的力量。

新兴媒体在新技术的作用下，可以进行更快更丰富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但这些所谓的新闻大多是碎片化的，很难构建起一幅幅关于现实世界的完整图景。其原因在于新媒体的组织形式、生产机制和传播目标，无意也无法承担起复杂和重大新闻事件的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报道。传统新闻业以专业化的科层制新闻机构为组织形式，其生产机制是中心化的，其传播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广泛的社会认

同感；互联网和新兴媒体发展的总体趋向是平台化的组织形式和去中心化的生产机制，其首要目标是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数量巨大、接触方便、分散孤立、社交娱乐，当这些特征标签无机地聚合在一起时，人们与新闻的关系便有如无边的丛林中透过枝丫缝隙瞭望浩瀚的星空，所得不过是无法辨明方向和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孤立印象和转瞬即逝的愉悦快感。长此以往，拉斯韦尔（Lasswell）等人所强调的新闻传播的环境守望功能终将不复存在。

新兴媒体既可以使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平等化，而且角色转换也变得更加容易，但也使得媒体的把关人属性、议程设置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弱化，由此终将导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沙砾化。传统新闻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精英化思维：媒体及其从业者负有比普通大众更多和更高的社会责任，因而必须对所生产和传播的新闻严格把关。新闻媒体应该通过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议程设置，使大众通过接触新闻而想其所能想和所应想，从而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新闻媒体还应该通过新闻报道对握有权力的政府进行监督，以使权力运行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上。在新媒介环境中，由于生产主体、生产渠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每天都有巨量的信息被轻而易举地生产出来，而对这些信息的筛选机制却难以跟上信息的生产速度，以至于新闻业这一需要特定生产和传播机制的领域经常会出现把关的真空，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不复往日的活力。更令人不安的是，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的目的是为了给用户精准画像，从而传播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但如果用户长期只接触自己感兴趣、博眼球的信息而非高质量的新闻内容，不仅会使他们的视野和思维受限、观点和理念固化，甚至会使他们形成社会偏见，在特定的事件和时间节点形成非理智的情绪共振，从而造成极端性的网络舆情。在这种情境中，人与人之间很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公共协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无数沙砾的集合，时聚时散，随风飘零。长此以往，新闻业的议程设置和社会粘合功能亦将逐步丧失。

新兴媒体既可以给草根大众赋权，也可以给政治家、明星或某些利益集团赋权，在西方语境中，这会从根本上动摇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独立新闻业的根基和新闻真实性的标准。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对新媒体游刃有余的运用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算法推送新闻也显示出，新闻传播的权力并非真正转移到了草根民众的手中，而是更多地转移到了掌握新技术的媒介平台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沦为算法或者平台的内容打工者”，“新闻本身的客观全面真实等要素由于并不会给流量带来太大效果而不被重视”^[29]；“新闻偏见、新闻失衡难以被发现和控制”“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削弱”^[30]。长此以往，舆论或将更容易操纵在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的手中，新闻的公共性将再难有立足的根基。

此外，还有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在新技术的作用下，人们对新闻本体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以数据新闻为例，这种依托数据挖掘和数据计算所生产的新闻，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新闻，它与传统新闻最大的不同是不再依赖于即时发生的客观事实，这种新闻所表达的也不再是（或不主要是）人对客观事实的感知，而是对事物联系的分析 and 判断。“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思·李（Tim Berners-Lee）说过：“新闻的未来是数据新闻。”^[31]果真如此的话，未来的新闻业将不再主要依赖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对新闻事实的采集和记录。如此来说，人类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到底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再如虚拟现实新闻，当现实与虚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的现实还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现实吗？正如有学者告诫的那样：忽略“网络化关系”的传播格局，高估虚拟现实新闻的创新价值，断言虚拟现实新闻会使新闻业“重构”或“转向”，不仅会给未来的新闻业指错方向，也会使学术研究陷入盲目跟风的境地。须知，并不是每一种新技术都拥有互联网一样的变革力量，并不是所有的创新（新闻创新）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32]

看来，如何重振新闻业，的确已经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三、反向融合：重振新闻业的可能性路径

新闻业的重振，不可能是传统新闻业的简单复兴，因为传统新闻机构已经失去与受众有效连接的最佳通道，故而要振兴的是新闻业的实质而非其传统形式。新闻业的重振，也不可能以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皈依来完成，因为新兴媒体的特质决定了它无法担当起传统新闻业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功能。新闻业的重振，更不可能以外在压力迫使新兴媒体向传统媒体屈服来实现，因为人类历史中上演的永远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活剧。对待传播新技术和新兴媒体的正确的态度，只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充分放大和加速其正面效应的同时，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33]

在这样的语境中，只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一条路可走。近几年来，媒体融合在中国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此前已经进行的融合从实质上看，就是传统媒体的一种自我救赎行为，是传统媒体单向地向新兴媒体靠拢的努力。现实中，我们之所以只看到传统媒体在高喊融合，却不见新兴媒体操持同样的话语，原因盖在于此。

对于新闻业来说，既要保留传统新闻业的内在精神，又要利用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红利，所面临的真正考验无非是两个：一是专业新闻机构如何打通与受众有效连接的通道；二是专业新闻机构如何与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之间重构有效的商业模式。

对于如何建立起与受众的有效连接，业界、学界和国家管理层抱有共识，就是要建立起报（视）网端微屏五位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其高级形态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34]。这方面主要有两个着力点，其一是建立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据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2015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自2014年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后，到2015年底，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排名前100的报纸中就有89家拥有了新闻客户端。^[35]时至今日，中国大多数传统媒

体都构建了自己的全媒体矩阵。但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运营仍存在不少困难，受众对传统媒体的认可度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其二是内容的数字化和建立付费墙让用户付费消费，但这类努力的成效也无法令人乐观。以美国为例，“2017年，在盈利泥沼中苦苦挣扎的传统新闻机构似乎迎来一些好消息：《纽约时报》《卫报》等品牌媒体高调宣布付费收入上升，《卫报》甚至首次实现读者付费超越广告收入。不过，若仔细比对数据，不难发现媒体‘报喜不报忧’背后的真实危机：《纽约时报》数字订阅的突飞猛进和数字广告业务的轻微上涨无法挽救以印刷业务为主的收入结构下总体收入下降的趋势；近10年内超过六次累计上千人的大幅裁员和2017年5月引发巨大争议的‘公共编辑’职位裁撤，都映射着传统机构的财务困境。……为了进一步削减开支，《卫报》从2018年起将原来的‘柏林式’（Berliner）报纸尺寸‘瘦身’为小报形式（tabloid format）。另一方面，原生数字媒体情况也不容乐观，Buzzfeed、Vox、Vice和《赫芬顿邮报》等都在短暂风光之后相继陷入增长停滞”^[36]。实证研究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报纸而言，所谓的全数字未来只是不切实际的幻影；而在美国报业对数字化不合理性追求的背后，则是媒介观察家和数字拥护者根深蒂固的数字崇拜心态”^[37]。

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表示：“新闻具有文化价值，新闻的文化力量能对抗技术和经济决定论”；“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38]。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实践似乎还未能给这种新的形式划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清晰轮廓。

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依靠第一条路径，同时也应该考虑第二条路径，即传统新闻机构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商业模式重构。新兴媒体可以解决接点和到达点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问题，传统媒体的问题正好相反。如何使得两者能够互补甚至互利共赢呢？只要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分野，就必然存在市场交易关系，而在这种交易关系中，能让双方都得益的做法只有依靠建立起一种新

型的合理的商业模式。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要能够使传统的或新的新闻机构既扬长避短，又取长补短。此处所说的“长”，即能使新闻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职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所谓“短”，是指与受众连接的不畅或弱效。在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看来，“新闻业若想以某种可识别的形式生存，新闻媒体组织，不论是新的还是传统的，必须认识和明确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39]。他们所强调的，正是新闻业之长。这种长处的发挥，必须依赖这样的新闻生产模式，它以价值理性为指引，以中心化的结构模式为组织依托，以议程设置为影响舆论的常规手段，以多层次把关为流程特征，以打造新闻精品为成果导向，以对社会运转和公众产生健康影响为最终旨归。显然，可以承载这种新闻生产模式的只能是专业化的新闻机构。诚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后所指出的那样，“应该纠正‘技术中心论’对于数据新闻、虚拟现实新闻或人工智能新闻等创新科技所代表趋势的热拥，科技创新未必带来新闻编辑室的革命，也未必会颠覆新闻业的基本范式。”^[40]由此看来，新的商业模式是指专业性的新闻机构在保持内容生产独立性的前提下，要谋求以新闻精品形成对互联网平台型媒体的议价能力。换言之，要达到这样一种结果：如果互联网平台型媒体不与专业新闻生产机构进行合作，它们就没有高质量的新闻精品可以传播。原来所说的媒体融合，实际上只是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单向靠拢，而一旦后者也必须借助专业性新闻机构的产品才能完成高质量的新闻传播，那么这种融合就成了所谓的“反向融合”。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和新兴媒体对专业新闻机构产品的使用，基本上是以无偿或极低廉的代价就可以得到满足，因此反向融合实乃新商业模式能否形成的前提。而反向融合能否变成现实，则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专业新闻机构专注于高品质的新闻产品生产；二是形成规范的新闻产品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三是对专业性新闻机构实施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且需要形成合力。显然，这无法仅仅靠媒体或企业的市场行为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

总之, 我们希望未来的媒体融合, 可以建构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它既融合了传统新闻业的精神, 又利用了媒介新技术的动能与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 从而使新闻业走出被边缘化的阴影, 重回人类传播的中心地带, 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上)[EB/OL]. 第一中国出版传媒网, [2018-07-30]. <http://www.cabbr.com.cn/article/123452.html>.
- [2] 大数据解密电视收视市场, 2018上半年表现到底如何?[EB/OL]. 搜狐科技, [2018-10-17]. http://www.sohu.com/a/259936078_613537.
- [3] 独家: 2018年传统媒体广告市场趋势向好[EB/OL]. 青年记者, [2018-01-26]. <http://wemedia.ifeng.com/46722217/wemedia.shtml>.
- [4] 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完整版)[EB/OL]. 报业转型, [2018-06-22]. https://mp.weixin.qq.com/s/68HxqRtOpf9ssh1H4D_VCw.
- [5] 2018年这些报刊杂志休刊、停刊、合并, 纸媒行业洗牌加剧[EB/OL]. 搜狐科技, [2018-10-28]. https://www.sohu.com/a/271841695_351788.
- [6] 那些2018转型的媒体大佬, 他们去哪儿了?[EB/OL]. 海城论坛网, [2018-07-03].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LQEAA430514PFTQ.html>.
- [7] 新华社为何把奥巴马写成奥马巴? 多家媒体为何没察觉[EB/OL]. 齐鲁财富网, [2015-12-03]. <http://www.qlmoney.com/content/20151203-135200.html>.
- [8] 金兰. 互联网时代媒体编辑该如何维护新闻真实[J]. 大东方, 2016(5): 43-43.
- [9] 《三亚日报》就“错写贪污和受贿部”道歉[EB/OL]. 凤凰资讯, [2015-11-13]. http://news.ifeng.com/a/20151113/46233339_0.shtml.
- [10]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ac.gov.cn/2019-02/28/c_1124175686.htm.
- [11] 谭天, 张子俊. 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J]. 编辑之友, 2017(1): 20-25.
- [12] 权威发布: 2017年传媒生态报告[EB/OL]. 搜狐科技, [2016-11-04]. http://www.sohu.com/a/118165289_465245.
- [13] 2018上半年移动媒介概览[EB/OL]. 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 [2018-8-14]. <http://www.199it.com/archives/759982.html>.
- [14] 益派咨询. 第十四次中国新媒体接触习惯报告[J]. 市场研究, 2017(2): 9-10.
- [15] 长春长生疫苗造假事件[EB/OL]. 蚁坊软件, [2018-07-27]. <https://www.eefung.com/hot-report/20180727162910/>.
- [16] “权健事件”网络舆情分析[EB/OL]. 识微, [2019-01-11]. <https://www.civiv.com/report/20190111094859>.
- [17] 美国报纸发行量广告量大减, 编辑人员10年下滑45%[EB/OL]. 中华网, [2018-08-01]. <https://3g.china.com/act/news/10000166/20180801/32755319.html>.
- [18] 2018皮尤报告|报纸概况简报[EB/OL]. 网易订阅频道, [2018-08-24]. <http://3g.163.com/dy/article/DQOFTB3A0525AR75.html>.
- [19] 皮尤报告: 一年间, 近四成美国大报都在裁员[EB/OL]. 网易新闻学院, [2018-07-28].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NQLKK805118VJ5.html>.
- [20] 陈积银, 宋春妮. 数据新闻发展现状宏观扫描[J]. 青年记者, 2018(10): 10-11.
- [21] 彭兰, 刘琳琳. 拓展“关联”: 新闻网站专业性重塑[J]. 编辑之友, 2016(2): 65-69.
- [22] 方师师, 周炜乐. 哥伦比亚大学托尔数字新闻中心报告第三次浪潮: 平台公司如何重塑美国新闻业[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7): 70-74.
- [23] 方师师. 算法如何重塑新闻业: 现状、问题与规制[J]. 新闻与写作, 2018(9): 11-19.
- [24] 方师师, 周炜乐. 艰难转型中的新闻业——皮尤、路透新闻业报告综述[J]. 新闻记者2017(7): 45-50.
- [25] 杨名宜, 吴海荣. 探讨“机器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势[J]. 视听, 2016(11): 131-132.
- [26] 彭兰. 机器与算法的流行时代, 人该怎么办[J]. 新闻与写作, 2016(12): 25-28.
- [27] 杨名宜, 吴海荣. 探讨“机器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势[J]. 视听, 2016(11): 131-132.
- [28] 孙伟.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的变革、困境与对策[J]. 传播与版权, 2018(7): 5-9.

- [29]方师师. 算法如何重塑新闻业: 现状、问题与规制[J]. 新闻与写作, 2018(9): 11-19.
- [30]靖鸣, 娄翠.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中伦理失范的思考[J]. 出版广角, 2018(1): 9-13.
- [31]沈浩, 谈和, 文蕾. “数据新闻”发展与“数据新闻”教育[J]. 现代传播, 2014(11): 139-142.
- [32]张明新, 叶银娇. 传播新技术采纳的“间歇性中辍”现象研究: 来自东西方社会的经验证据[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6): 78-98.
- [33]吴绮敏. 习近平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6-09-04(1).
- [34]习近平: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J]. 中国广播, 2019(2): 4-5.
- [35]宋黎, 葛岩. 从“报网互动”到 Instant Articles——“新媒体与新媒体合作”取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6): 154-160.
- [36]谭小荷. 加密经济重构媒体生态? 区块链驱动下的新闻商业模式创新——基于Press Coin的案例[J]. 新闻界, 2018(6): 10-17.
- [37]齐湘. 美国报业数字化: 现实与幻影[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8(43).
- [38]周红丰, 吴晓平. 重思新闻业危机: 文化的力量——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文化社会学反思[J]. 新闻记者, 2015(3): 4-12.
- [39][美]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 真相: 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 陆佳怡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95.
- [40]李艳红. 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 “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对三家新闻组织采纳数据新闻的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9): 40-60.

Reverse Integration: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Future Approach of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Media's Recession

Ding Hegen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is in a recession, and journalism is also gradually marginalized. In the past 100 years, journalism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al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th its unique endowment. It has 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operational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thus acts on the whole society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 for democratic society. Although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ar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s of traditional journalism. Media integra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dustry, but the previous integration is mainly the one-way interfere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to Internet and new media, and it can't solve the profit problems of news organizations. Reverse integration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et platform, enabling the journalism industry to be re-centered.

Key words: Journalism; Marginalization; Reverse Integration; Re-centralization

论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

——以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为重点

陈爱敏

摘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都市、大都市乃至特大都市将会很快崛起。都市精神是都市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它引领着都市发展,都市精神又来源于都市文化。都市戏剧作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对培育都市精神、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针砭时弊,弘扬优良的都市精神,为都市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家园精神”“共同体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社会正义战胜邪恶的诉求,是构成美国都市精神的重要部分,也是都市发展的重要动因。美国城市化中的经验与教训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好参考书。

关键词: 都市精神; 都市戏剧;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57-08

一、引言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1]这是因为城市是精英聚集之地、人才荟萃之所,这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价值所在。城市是伟大的,早在1588年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就构想构建“城市伟大文化”的愿景,并对构建伟大的城市文化充满信心。但他同时指出:“要把一切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2],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凝聚人心的城市精神。

都市精神来自何处?来源于都市文化。都市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凝聚、培育都市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戏剧作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参与社会主流文化和都市精神的建设,对培育、践行都市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都市

戏剧中的“家园精神”“共同体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社会正义战胜邪恶的诉求,是构成美国都市精神的重要部分,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样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变成大都市。可以想象,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会相伴而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而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中反映出来的都市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无疑为中国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二、都市化·都市精神·社会核心价值观

都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也是一定时期的产物。都市发展好坏,与都市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市精神是优良的社会价值观的凝炼,而优良的社会价值观则是形成都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7BWW091。

作者简介: 陈爱敏,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戏剧,英美文学,族裔文学,易卜生研究。

市精神的重要基石,两者对都市发展速度和质量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都市精神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是一座都市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是人的价值、境界、理想、文明程度和道德追求的人文精神的体现。^[3]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曾经给都市精神下过定义:“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追求,是内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法则,是体现城市独特风格的显著符号,是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抽象理念。因此,城市精神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城市的文化精神。”^[4]施本格勒作为跨越19到20世纪的人物,他清楚地揭示了城市精神的本质,即城市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当然,这种文化精神的内蕴十分丰富、复杂。今天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迅猛发展,都市、大都市、特大都市应运而生,因而施本格勒所说的城市精神在今天同样适用于都市精神,其本质仍然与文化精神紧密相关。

都市精神来源于都市文化,都市文化孕育着都市精神。但“都市文化属于一种特定的区域文化,如同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队文化、乡村文化一样,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体系,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5]而在社会文化大体系中包含着社会价值观体系,在社会价值观大体系中,又有社会主流价值文化和非主流价值文化之分,其中,社会主流价值文化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价值追求和前进方向,理应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因此,作为社会亚文化的都市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应该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同样,作为都市文化一部分的都市戏剧在主题与内容上应该时刻围绕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与表演。

社会的灵魂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的存在决定于多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然而,一个民族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则取决于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向心力,而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理想追求,并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存在方式产生着持久而稳定的影响。”^[6]

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全社会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层次结构和丰富内涵的概括和提炼。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阐释了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他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并指出:“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8]习总书记的讲话无疑明确提出了当下我国人民应该坚守的价值观念。

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全体国民大力培育、不断充实发展和积极践行,需要进一步汇集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高扬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其中对优良都市精神的培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都市戏剧作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为都市精神的弘扬与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20世纪都市戏剧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为城市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培育的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它所形成的优良都市风气,对都市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等同样可以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三、美国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戏剧发展

美国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城镇、到城市,再到都市的过程,而都市戏剧也伴随着都市发展而日益壮大。

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1%,只有少部分人住在城镇;1861—1865年间爆发了南北战争,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城市化进入了鼎盛时期。到了1920年城市人口增至51.2%。有人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了城市,而这个过

程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完成的。^[9]“192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美国人口首次突破了一亿大关,而在这一亿人口当中,有一半居住在城市,即所谓城市居民。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0]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边界无限拓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城市与城市之间连成一片,形成了都市、大都市,乃至特大都市。对于什么城市可以被称之为大都市,美国联邦预算局先后对大都市区进行了定义。1950年定义为:“一个拥有5万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及拥有7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郊县。”^[11]1980年进行了补充,“若该区域总人口达到或超过10万人,并且有5万以上居住在人口统计署划定的城市化区域中,即使没有中心城市,也可以划为大都市区。”^[12]在实际应用中,大都市区概念已取代了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沿用的以2500人口为底线的城市标准。“从此,美国人口分布的分类标准主要是大都市区与非大都市区的区别”。^[13]1991年美国人口统计署公布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的数量40个,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53.6%。^[14]

显见,美国都市诞生于20世纪,而美国都市戏剧是20世纪的产物。何为都市戏剧?

从狭义上讲,是指那些以都市为背景,以表现都市空间人与事为题材,并以戏剧形式再现给读者与观众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换句话说,都市戏剧就是指再现都市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人与事的戏剧作品。美国戏剧评论家维斯盖特是这样定义美国都市戏剧的:“之所以称之为都市戏剧,一是因为作为一种文学与艺术形式,它是对20世纪不同时期都市危机的镜像折射;二是剧作家们将有关都市政治的、文化的和认识论上的这些关怀,变成了他们戏剧作品中的一部分。”^[15]换句话说都市戏剧在形式上既是与诗歌、小说一样的文学样式,同时也是一种集声、光、映像等多重戏剧元素为一体,娱乐大众的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它与都市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内发生的人与事密切相关,它关心都市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反映了都市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是都市精神再现的重要手段。

总体看,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按照美国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叶到20

世纪20年代,城市化兴起到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戏剧反映了都市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城市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揭示了都市化初期的政府法律不健全,贫富悬殊导致的阶级矛盾,外来移民得不到公正对待等都市正义缺失问题,它与优良的都市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期间,比较出色地反映都市生活的是“贫民窟戏剧”。有统计显示:1890—1916年间,有50多部贫民窟戏剧上演,其中有一部分甚至还在百老汇上演。^[16]贝克(Benjamin A. Baker)创作的《纽约一瞥》(A Glance at New York, 1848)、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的《纽约穷人》(The Poor of New York, 1857)、达利(Augustin Daly)的《路灯下》(Under the Gaslight, 1867)以及哈根(Edward Harrigan)的《马丽根系列剧》(Mulligan Series, 1880s)等都是出色之作。这些戏剧以纽约大都市为背景,主要反映了大都市光鲜背后的不光彩的一面,批判都市正义缺失的现象。

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之为“逆都市”化时期。20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化膨胀,内城由于人口集中,社会秩序混乱,居住条件恶劣等原因,有钱人搬到郊区居住。因而郊区得到大力发展。因其住房宽敞,大型商业区、学校、医院等一应俱全,成为有钱人的“天堂”。但新的都市问题也由此而生,贫与富、有色人种与白人、外来移民与本土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有很多戏剧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都市问题,福德·威尔逊(Lanford Wilson)的美国城市“景观”剧,《吉尔德身上的芳香》(Balm in Gilead, 1964)和《巴尔地摩旅馆》(The Hot l Baltimore, 1973)、谢泼德的《真正的西部》(The True West, 1980)、马查多(Eduardo Machado)的《破鸡蛋》(Broken Eggs, 1984)、乔斯·里韦拉(Jose Rivera)的《玛丽莎》(Marisol, 1990)、黄哲伦的《刚下船的人》(FOB, 1980)等。这些戏剧以大都市为背景,反映了都市人构建幸福家园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家园精神正是这些戏剧的核心所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后大都市时代”(爱德华·索亚),其显著特征是中心城市衰弱,边缘城市崛起,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后工业革命等两大浪潮,使得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也呈现出多元、开放的

格局。体现在美国都市戏剧上就是女性戏剧、同性恋戏剧、族裔戏剧等竞相争艳,包容、理解与协商等主题凸显,生活于同一片蓝天下的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都市人,形成团结互助的“族裔共同体”“市场共同体”“同性共同体”,一起与社会、命运、权力抗争。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 1992)、葆拉·沃格尔(Paula Vogel)的《巴尔地摩华尔兹》(The Baltimore Waltz, 1992)等方面反映了都市中那些不被接纳、生活于边缘空间的同性恋群体的遭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些群体团结一致与社会抗争的共同体精神。

纵观以上三个阶段的戏剧,都市空间成为戏剧冲突的焦点,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但不同时期,都市空间扮演着不同角色。维斯盖特曾经这样概述过: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的话,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都市戏剧中,都市更多地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或者事件的背景;而80年代之后的美国都市戏剧中都市直接成为戏剧冲突的根源或调停个人与集团冲突的重要力量。^[17]

20世纪美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从繁荣,到成熟,再到逆城(都)市化过程,最后进入“后大都市时代”。期间,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都市戏剧也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文学与艺术形式,它为都市人提供了一面镜子,既揭露了城市的疮疤,又为都市健康发展提供了精神营养。

四、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正义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对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尊重,是引领城市朝着健康、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石,反之,则会阻碍城市的发展。20世纪初期的美国,城市空间迅速拓展,但配套设施与市政管理严重滞后,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力,又导致了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正义严重缺失。这一期间最为突出的问题当算住房与就业

问题。由于大量人口从农村搬进城市,他们居无定所,只能挤在简陋、廉价、居住环境恶劣的棚户区。因为未受过教育,没有专门技术,因而很多人没有工作,只能靠偷窃、卖淫为生,从而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针对这些现象,20世纪初出现了前文提到的“贫民窟戏剧”(Slum Plays)。这一题材的戏剧聚焦都市特定的物理空间,反映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又分为“妓院剧”“犯罪剧”“拯救剧”“社会心理剧”等多种类型。像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熔炉》(1908)、霍尔特(Charles H. Hoyt)的《唐人街之旅》(1891)、斯卡伯勒(George Scarborough)的《色诱》(1913)等,反映了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移民以及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外来移民的境遇。

贫民窟戏剧聚焦流浪汉、无家可归的难民、皮条客、小偷的生活,将他们所住的坟场、垃圾堆、桥洞等搬上舞台,直观地再现了都市边缘群体的生活场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创下历史票房纪录。霍伊特的戏剧《唐人街之旅》打破了百老汇所有的票房记录。尤金·沃尔特(Eugene Walter)的《捷径》(The Easiest Way)非常受观众青睐,史蒂文森特剧场(Stuyvesant Theater)不得不提前一两周售票。可见“贫民窟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受欢迎程度。

为何这些戏剧如此“成功”?一方面它真实再现了贫民窟居民的不为人知的糟糕的生活状态,引发了人们对共同生活于同一座城市他者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它满足了一些上层社会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因为像《唐人街之旅》《捷径》这样的戏剧表现的是早期外来移民不为人知的生活。这些戏剧展示的是充塞着种族歧视、冷漠、凶残、背叛、无助的世界,与平等互爱、互助、忠诚的温情世界相去甚远。应该说“贫民窟戏剧”引发人们对城市化进程中平等、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对美好、高尚的都市精神缺失提出警示,因而从此意义上讲,有效地发挥了它的社会教育功能。

如果说贫民窟戏剧反映的是阶级差异导致的公平正义缺失的话,那么20世纪美国同性恋戏剧则反映了性别、性向歧视所导致的都市正义的缺失。

人们把同性恋者大胆地公开自己的性向与身份称之为“出柜”，这恰恰说明了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在传统道德观念大行其道之时，他们只能生活在“柜子”里。显然，都市公共空间容不得他们的存在。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构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与异性恋主宰的都市空间抗衡。正因为如此，同性恋主题在美国戏剧中一直是隐蔽的话题。这从20世纪早、中期的美国戏剧中便可窥见一斑，像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中女主角布兰奇年轻的丈夫就是公众舆论的牺牲品。因为妻子当众揭露了他的同性恋身份，他无法忍受谴责的目光与言语，而开枪自杀。都市对同性恋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挤压，使得这些话题以隐蔽的方式出现。威廉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兰福德·威尔逊(Lanford Wilson)的《布赖特夫人的疯狂》(The Madness of Lady Bright)、爱德华·阿尔比《动物园的故事》，阿瑟·密勒的《桥头眺望》等剧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均能见到这种倾向。

不仅20世纪早、中期如此，20世纪末很多都市戏剧中仍然能看到都市空间对同性恋、艾滋病等群体的挤压。

新加坡裔、同性恋剧作家兼导演谢耀(Chay Yew)的《白人地盘》三部曲：《瓷》(Porcelain 1993)、《他们自己的语言》(A Language of Their Own, 1995)和《半生》(Half Lives, 1996)，女同性恋剧作家保拉·沃格尔(Paula Vogel)的著名剧作《巴尔的摩华尔兹舞》(Baltimore Waltz, 1992)等均再现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在都市空间中的边缘状态。

什么是城市正义？“在城市语境下，城市正义包含了城市的平等、民主以及多元化。”“真正的城市正义，应该回到正义的本质，即包含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18]

从以上所分析的贫民窟戏剧和同性恋戏剧来看，在美国都市化过程中，底层贫民和边缘群体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受到了挤压，在意识形态、宗教伦理、传统价值体系等方面也同时遭受着打击，而这正表现出严重的正义缺失，同时也唤起人们对美好都市精神的向往。

五、美国都市戏剧与家园精神

“家园”是家庭成员心之所向、情之所系、魂之所聚的地方，她召唤和凝聚着家庭成员的认同、忠诚和归属。“精神”，是价值、道德和真、善、美的交织复合，精神生成于文化又不简单地等同于文化，它是文化的精髓，具有特殊的、萌生和激发出力量的品质。^[19]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团结友爱、平等相待、理解包容、和睦进步这些都是家园精神的重要内涵。优良的家园精神引领人们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奋发向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家园精神是都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千千万万个优秀的家庭，才能建成充满魅力与活力的美丽都市。

美国戏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表现家庭生活为主题的，这里的家既是具有象征意义上的大家庭，如：流浪汉临时聚居之旅馆、贫民窟、商店拱廊或地铁站地下出入口，也有现实中真正的家。著名戏剧家兰福德·威尔逊(Lanford Wilson)的《巴尔的摩旅馆》、阿尔比的《谁害怕沃吉尼尔沃尔夫》和《在家在动物园》、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谢泼德的《真正的西部》(1980)、Jose Rivera的《玛丽莎》(1990)、Eduardo Machado的《破鸡蛋》(1984)等，都是以大都市为背景，反映主人公构建幸福美好家园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冲突的杰作。

兰福德·威尔逊的《巴尔的摩旅馆》是讲述家园精神的范例。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初位于马里兰州港口的一家老旧的巴尔地摩旅馆。因为廉价，这里成为那些无家可归者、移民、流浪汉的首选之地。在他们看来，这里既是临时栖息之地，也是他们的家。尽管聚集在此的都是些失意之人：靠做皮条活维持生计者、被抛弃的年迈老人、无业流浪汉，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温馨与希望。旅馆的大厅是他们交流心声、分享快乐与忧伤、获得慰藉的心灵港湾。但随着都市拓展，旅馆即将被拆除。他们留恋昔日美好时光，那种温馨友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兄弟情义，那种和谐、互助的邻里关系。因而，《巴尔的摩旅馆》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家园精神：互相关爱、热情相助、积极乐观……这些正是都市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

应该提倡与弘扬的美好民族精神。

但是,现代社会的功利性,使得城市中家园精神受到严重挑战。在诱惑人心的美国梦面前,家园精神不堪一击,取而代之的是处处向前、钱看,沾满资本主义铜臭味的工商主义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1858—1918)对现代都市精神另有一番新解:认为现代人的人际关系逐渐被货币的概念所取代,“货币正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等的多重运作中心,并进而成为价值的绝对表现和中介力量”,一方面,“它(货币)使人们除了利害关系,除了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另一方面,货币成为评价一切的手段,并对现代个体心性施加影响。现代性社会中的神性品质逐渐消退,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取而代之,世俗化的都市精神应运而生。正是因为货币“使人们之间相互疏离,又强迫他们每个人只依靠自己生存的东西。”^[20]简单地讲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就看他占有财富的多少。

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很好地诠释了西美尔有关现代都市精神与货币关系的观点。当60多岁的洛曼去找年轻的老板哈瓦德请求让他继续工作时,被哈瓦德像扔橘子皮一样,一脚踢开。究其原因就是洛曼年事已高,不能给他带来更多利益。货币成为支撑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在该剧中货币同样是衡量一个人成功标准,洛曼的邻居查理很成功,他可以借钱给洛曼;更重要的儿子很有出息,他作为父亲在洛曼面前大肆炫耀;洛曼也因为两个儿子穷困抬不起头来。钱成为都市人生活中的一切,它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道德、伦理等神性的东西黯然失色,使得家庭的温馨、和谐、信任、理解与包容等优秀的精神消失殆尽。阿尔比的《谁害怕沃吉尼尔沃尔夫》以及马梅特的《拜金一族》都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西美尔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对都市发展,优良的都市精神缺失提出了警告。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劳动分工的独立性等因素给都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挑战,人们变得日益疏离,家庭成员之间也难以沟通。

如果说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1958)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带来了都市的改变,使得都市人之间无法理解与沟通的话,那么《在家在动物园》(At Home at Zoo, 2008)则反映了后大都市时代家

庭成员之间也已经变得陌生而不可理解。《在家在动物园》是对《动物园的故事》改写,其目的是要展示彼得夫妇间心灵的隔阂与情感的异化。有学者指出:如果《动物园的故事》提醒我们不得不恐惧地面对现代社会人们的隔绝与异化的话,那么《在家在动物园》一剧中,我们也只能痛苦地直视,即便在一个美满的家庭与婚姻中隔绝与异化也无处不在。^[21]

当今,大都市的生活使得人际交往虽然频繁,但缺乏真正的沟通。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条件下,都市人的都市性格和心理状态就变成一种距离感,喜欢用自我退隐来实现自我内心的平复和保护。西美尔指出,这种心理结构不只是冷漠,它也代表反感、憎恨、排斥、恨意,进而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疏远。都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参与,友好的人际关系,重视亲情与友情,互相理解与包容,彼此尊敬与友爱,团结进取与同舟共济,才能将都市建设成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同时也有助于家园精神的发扬光大。这方面,有关美国都市生活的“家庭剧”从正反两面给我们提供了参考。

六、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共同体

“共同体”一词成为近几年媒体、社会使用的热词,它是指“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伦理价值取向群体的生活方式”。^[22]这个群体在一个共同的区域生活,“这些社会关系以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感深度、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为特征。”^[23]

都市可以视为由多个具有不同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的共同体组成,这些不同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彼此关照,互相尊重,团结互助,为各自共同的目标而尽力拼搏。这其中,能凝聚人心、引领团队克服困难,最终赢得胜利的必有共同的精神支撑,或曰精神家园,这种“精神家园起着昭示、引领、凝聚、合力、寄托的作用,使命运共同体心有所系、情有所终。”^[24]要实现都市繁荣,就必须变各个共同体的不同诉求为都市整体的共同诉求,这样才能将不同共同体的精神汇聚成都市精神。

20世纪,面对经济、种族、性别等诸多社会问题,美国都市人自觉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他们虽

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为着大家的共同目标而敢于奋勇当先。在美国都市戏剧中表现较为出色的当属:为了在激烈的商业大潮中获得成功的“市场共同体”,团结一致为本民族利益拼搏的“族裔共同体”和为了与异性恋话语抗衡的“同性共同体”。

20世纪美国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到70年代的经济滞涨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带来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剧上升等。面对经济走低、失业等难题,都市人为了战胜困难,走出阴霾,自觉形成了“市场共同体”,以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体系抗衡。20世纪有很多戏剧,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商业人以追求市场赋予的自由,彰显个人的主体性为特征,而形成的“市场共同体”。如马梅特的《拜金一族》和《美国水牛》等,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腐蚀下,美国梦已堕落为对物质利益的朝奉,但其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仍然为人们所珍视,并将其视为美国民族精神的精髓。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为了生存,他们积极构建一个松散市场共同体,以打破资本家的垄断与剥削。

作为移民国家,20世纪中、后叶美国虽然没有出现像18世纪、19世纪的大规模的移民潮,但是,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移民后裔们在美国都市各行各业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文化差异,他们与白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沟壑。为了生存,为了融入主流,他们自觉形成了“族裔共同体”,共同维护本族群的尊严和合法权益。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有很多表现这方面题材的戏剧,像狄亚内·西尔丝的《哈莱姆二重奏》、安尼·迪弗·史密斯的《黎明洛杉矶》以及黄哲伦的《刚下船的人》等正是这方面的范例。

20世纪美国见证了同性恋从隐蔽到公开,从被拒绝到被接纳的演变过程。1969年6月28日著名的同性恋群体对抗警察的“石墙暴动”事件,打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维护同性恋权利的第一枪。1974年公开资料表明同性恋不是病。1980年1月1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一项声明,宣布他们支持同性恋权利。1981年艾滋病出现,对同性恋的认同一扫而空。1987年3月24日全国掀起了对抗艾滋病行动(ACT UP),同时对抗艾滋病联盟也渐成气候。1993年1月1日,夏威夷州允许同性恋结婚……由此可见,20世纪下半叶美国同性恋经历了被打击,到被接

纳、赋予法律权利的过程。这其中“同性共同体”功不可没。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有关同性恋、艾滋病题材的戏剧作品问世,像托尼·库什纳的《天使在美国》、谢耀的《他们自己的语言》等对20世纪末繁华的都市中同性恋与艾滋病群体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进行了曝光,这些戏剧冲破了历史、社会、伦理道德等的约束,改变了人们对这些群体的认知。

20世纪末,进入后大都市时代,美国的都市戏剧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但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戏剧中的主人公们有很多的共同追求。相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信仰等让他们走到一起,构建了形式多样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正是都市共同体的重要元素。这些共同体信仰、理念先进,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提倡团结、友爱、进取,事实上是优良的都市精神的体现,它为推动、引领都市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结语

都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它引领都市的发展,传承优秀的都市文化,弘扬优秀的价值观念与伦理思想。都市精神来自何处?无疑,都市文化是都市精神来源之一。都市戏剧作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起着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弘扬都市精神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都市戏剧必将对都市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美国戏剧作为都市文化,在凝集人心,揭露时弊,推动都市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都市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家园精神,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以及共同体意识,无疑是都市发展的正能量。由此,美国都市戏剧的研究,对推动我国都市发展和都市文化建设的借鉴作用无法估量,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 [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齐世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99.
- [2] 艾拉·卡兹纳尔逊.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 王爱松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7.
- [3] 陈柳钦. 论城市精神及其塑造和弘扬[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 报(社会科学版), 2010(9): 1-6.
- [4]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m and Actuality*[M].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6: 86.
- [5]杨鲜兰, 刘怀元. 论城市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7): 168-171.
- [6]杨鲜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03.
- [7]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32.
- [8]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 2014-05-05(1).
- [9]Arthur Schlesinger. *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M].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80.
- [10]王旭. 美国城市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
- [11]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5.
- [12]Kenneth Fox. *Metropolitan America Urban 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0*[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1.
- [13]王旭. 美国城市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74.
- [14]R. I. Forstall & F. James D.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1980s*[N]. Working Paper, 1999-3-26.
- [15]Westgate Christ. *Urban Drama. The Metropoli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Play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
- [16]Westgate Christ. *Urban Drama. The Metropoli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Plays*sv.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
- [17]Westgate Christ. *Urban Drama. The Metropoli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Play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2.
- [18]苏珊·S·费恩斯坦. 正义城市[M]. 武焯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
- [19]严庆.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J]. 中华民族, 2017(21): 66-67.
- [20]吕钊, 龚鑫. 现代性图景中西美尔都市精神探究[J]. 求索, 2013(11): 244-246.
- [21]胡开奇. 迷失: 美国当代戏剧名作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92.
- [22]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1.
- [23]Robert A.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0: 48.
- [24]倪国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家园[N]. 甘肃日报, 2019-2-20(8).

On Metropolitan Drama and Urban Spirit: ——Focusing on American Metropolitan Plays in the 20th Century

Chen Aimin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it can be estimated that metropolises, big metropolises and super metropolises will soon come into being. Urban spirit, the core value of a city, and the soul of a metropolis,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Urban spirit derives from the urban culture. Urban drama, as part of the urban culture, exerts its strong power up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ity spirit and practice of core value of a society.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metropolitan drama, with its sharp criticism of the reality, and passionate eulogy of the city spirit,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American urbanization.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plays, we can find the themes of “family spirit”, “community spirit” and “spirit of justice”, which form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city spirit and become momentum for the urbanization. Undoubtedly, whatever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moment is of great value for China in its fu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Journalism; Metropolitan Spirit; Metropolitan Drama; Urbanization

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来看 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

季 淳

摘 要: 本文先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视角来探讨美国高等教育,从17世纪的起源,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重大变迁与发展,再论及美国公立大学的起源和各种大学的类型与排名,最后再从现代博雅书院教育入手,检视美国公立大学之中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目前推动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实验。

关键词: 美国高等教育; 博雅书院教育; 通识教育; 美国文理大学; 博雅书院; 美国授地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65-09

一、前言

为什么要办大学? 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大学要教什么? 学生又要学什么? 以名观之, 大学教育应该学的是“大学”(big learning)而不是学“小学”(small learning)。所谓“大的学问”指的是“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之学, 而“小的学问”则指的是“经世致用”之学, 前者也就是做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 称为博雅书院教育^①(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大哉之学。

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究从17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 但是若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切入, 将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美国高等教育的立意精神何在, 以及在过去的400多年来, 美国大学如何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 以不同的方式来维护实践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 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同时, 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所以相信从此较为根本的角度出发, 本文的探究可能也会对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启发。

二、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 博雅书院教育

美国早期的大学几乎都是由基督教会所创立的私立大学(如同以前的金陵大学与燕京大学), 它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也不例外。因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专业分工远不及今日细密, 加上教会办学的理念, 以及当时大学教育仍为上流社会的子弟所专属等原因, 所以哈佛学院于1636年创办时所提供的教育就专注于神学、人文、艺术等领域, 也就是后人所谓“大哉之学”的博雅书院教育。而当年的哈佛学院也以人文艺术学院之姿成为今日美国的文理大学, 乃至成为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之滥觞。

古典的博雅书院教育着重于“全人教育”(whole education), 不仅包括了广泛的知识教育、文化上的熏陶、自我的定位与实现, 更包括了道德与人格的训练课程, 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之学。传统上, 博雅书院教育没有可以帮助就业的科系与课程, 因为专业训练被视

作者简介: 季淳, 男, 中国台湾高雄人,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 美国西方文理大学(Occidental College)政治系终身教授兼东亚研究系系主任, 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两岸关系、博雅书院教育。

为“小的学问”，所以不宜在“大学”里开设此类课程。

博雅书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英文名谓中的“liberal”一字与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无关，它指的是此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知识上的“自由人”（a freeman），而不是“识盲的奴隶”（an intellectually blind slave）。至于“arts”一词则可追溯到中世纪欧洲所强调的“七艺”之学（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但是到了17世纪的美国，就如同前述的哈佛学院，博雅书院教育只着重于神学、人文、艺术等课程。所以严格来说，当时这些学院只是人文艺术学院，直到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也包括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之后，这些私立的小型学院才有了今日文理学院或文理大学的规模。到了21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学界更进一步地开始讨论将工程学科纳入博雅书院教育的可能性^②。

至于当代的博雅书院教育在具体实践的层面所展示的内涵，以及此种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处，将于本文第六节进一步地阐述。

三、美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从文理大学的博雅书院教育到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渐趋专业化自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真正冲击美国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外在力量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中的两个阶段，两者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古典博雅书院教育所遭逢的第一波挑战，来自于19世纪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1865—1877）。第二波挑战则来自于20世纪前叶的经济大萧条（The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是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百废待举，还是大萧条期间重振经济之需要，都使古典博雅书院教育变得世俗化与专业化，或是说从“大学”（big learning）教育开

始转型为“小学”（small learning）教育。我们试想在一个百废待举、野有饿殍或是百业萧条、食不果腹的社会，如何还可以盛行魏晋之风，清谈“安身立命”与“修身养性”呢？不久之前才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Great Recession, 2007—2012）的例子，虽不中，亦不远矣。于是在经历了上述两波的冲击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向下述的两个方向转变。

如前所述，第一个转变是在原有的人文艺术学院的课程之中，加入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成为今日的文理学院或文理大学（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ollege，简称liberal arts college）。此种转变以创立于1793年，经常在各种排名之中名列前茅的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以及宋美龄女士和于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母校——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为代表。这些学院也可以被译为文理大学，因为它们至少具备了人文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不同的学门或学院，而以大陆和台湾的标准来说，它们应该被译为“大学”，而非“学院”。而这些学院仍然保留了college之名，是为了保留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博雅书院教育的传统，这可能是一些戮力追求从学院“升格”为大学的人士所难以理解的。

另一个转变则是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纳入博雅书院教育以外，再进一步地成立了工程、教育、法、商、医、农等等的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而成为今日最为常见且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譬如说，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加上了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之后，就称为或必须称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而其中保留的哈佛学院就成为哈佛大学提供四年大学本科教育（undergraduate education）的场所，而这些后来成立的专业学院就以提供研究所教育（graduate education）为主，以保持大学本科教育的纯净性。即便如此，这些年来哈佛学院也日趋专业化。无怪乎学院的前院长刘易斯（Harry R. Lewis）曾于2006年撰书质疑，书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如何忘记其教育的宗旨》^③。不过相对于后来创办的许许多多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哈佛大学以及一些其他的常春藤联盟大学（The Ivy League），已经尽量避免这些专业教育的课程过早地“污染”大学的本科教育。而早在创校之始，这些公立综合性的大学就已经将这些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专业学院与科系，纳入了本科教育的学术殿堂，其中又以工学院、农学院和商学院为最，成为学生趋之若鹜的显学。至于医学院、法学院和教育学院基本上仍属研究所教育的范畴。

由上述的发展也可得知，美国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与文理大学（college）之分际，并不在于是否有数个不同的学门（院），而在于是否有着重于所谓“小学”的专业学院。而在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经历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这两波冲击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此分道扬镳，造就了今日居多数的大型综合性大学与少数的小型文理大学并存的局面。

最后，我们也可以就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从博雅书院教育转换到专业教育之间历史变化的轨迹，反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在早期成立且迄今仍然屹立不摇的主要大学都在距今大约百年之前成立，如在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和于1911年创办的清华大学。那时的中国外有列强窥伺、内有军阀割据，再加上此时美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大学，都已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而渐趋世俗化与专业化，所以这些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大学，从一开始就因为着重于“经世致用”的专业教育的时代必要性，而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抱古典大学教育“安身立命”与“修身养性”的核心价值，不论是和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与人格教育、或是和所谓“礼失求诸野”的美国博雅书院教育都有一段或远或近的距离。

上述发展的趋势在大陆高等教育已如是，在台湾犹有过之。就以于1927年先在南京创办、后于1954年在台北复校的政治大学为例，虽然今日该校已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但是当年创办该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治理人才而以法政专业教育为主。而于1928年日据时代成立的今日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则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需求，再加上不鼓励台民研习法政，所以该校以提供医农理工等的专业教育为主。

总而言之，美国注重博雅书院教育的文理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可说是付之阙如。唯一的例外是香港的岭南大学和在今日香港中文大学之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立的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香港的经验相当独特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院校都和清末民初时由美国和英国的教会创办的十三所基督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美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起源

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学府。除了那些以常春藤联盟大学为主的私立大学和一些小型的文理大学之外，它还拥有数以百计的公立综合性大学，其中包括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和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等重量级的研究型大学。相对于私立院校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公立大学何时产生？创校的宗旨为何？又可分为哪些类型？

为了呼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社会阶级平民化的改变，美国国会分别于内战时期的1862年和之后的1890年两次通过了所谓的“摩瑞尔法案”（The Morrill Acts of 1862 and 1890），由联邦政府授予土地给各州成立“授地大学”或是“赠地大学”（The Land-Grant Universities）^④，包括于1863年2月立即根据此法案，先后由州级的“授地大学”升级为联邦级的“授地大学”并且日后成为此等教育改革典范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两所大学，以及之后数年到数十年纷纷成立或升级的几十所公立大学，如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虽然在此之前已有诸如于1817年成立的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于1819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等老牌的公立大学，而且联邦级的“授地大学”也包括了今日一些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等少数的私立名校，但是依据《摩瑞尔法案》而诞生的公立大学早已成为该国公立大学的核心，也成为今天在

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英国的公立大学系统的前身。

之前提到美国国会通过《摩瑞尔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呼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社会阶级平民化的改变。所以，相对于传统博雅书院教育所注重的较为抽象的人文艺术课程，该法案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聚焦于农业、工程、科学和军事科学等较为具体的实用学科的教学。这个重理工、轻人文的特色在该法案1862年版的正式名称之中明白地揭示：《1862年农业与机械工程授地学院法案》

（Land-Grant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 Act of 1862），成就了美国高等教育从文理大学的博雅书院教育到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的变迁之中，最为重要的篇章。

法案同时肩负着一个更为高远的使命。在此之前美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服务有钱又有闲的上流社会子弟的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而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所以，《摩瑞尔法案》广设公立大学、扩大招生之门，以及提供以农工为主的实用技术课程，不但响应了社会阶级变迁之下平民的需求，也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创造了可能性。

在关注阶级差异的同时，《摩瑞尔法案》并没有忽略内战结束之后的种族差异。因此就有了1890年的第二个版本，要求内战之前蓄奴的南方各州提

出证明种族不是审核入学的标准，否则就要分别设立给少数族裔就读的授地院校，于是今天的一些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院校（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就在当时应运而生。

所以美国国会于19世纪中叶和末叶两次通过的《摩瑞尔法案》，不仅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从较抽象的博雅书院教育走向较专业的实用技术教育、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更试图消弭族裔之间的差异。依据此法案而成立的诸多公立大学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中，除了私立的综合性大学和私立的文理大学之外的另一种类型。

五、美国大学的类型与排名

美国有大约3000多所大专院校，除了两年制的小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之外，其余的四年制大学大致可以区分为六种。在公立与私立的综合性大学的两大范畴以外，再加上私立文理大学的系统，一共就有三大类型。每一类型的大学之中又可以因为是否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外州或是否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而可区分为全国性与地区性的大学，所以一共可以分为以下表1列的六种类型^⑤（括号中为从东岸的麻州及西岸的加州选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表1 部分全国性地区性大学

全国性私立大学 （麻州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地区性私立大学 （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
全国性文理大学 （麻州的威廉姆斯文理大学：Williams College）	地区性文理大学 （加州的惠提尔文理大学：Whittier College）
全国性公立大学 （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地区性公立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除了全国性与地区性的分际之外，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学也因为与博雅书院教育的亲疏远近，以及办学的宗旨是研究型、教学型还是职业型而有所不同。

从以博雅书院教育为核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首先，如哈佛大学一般具有悠久书院传统的全国性私立大学，和某些一流的地区性私立大学仍然在本科生的教育内涵之中，保留着博雅书院教育的传统；其次，毋庸置疑的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文理大学百年来仍然弦歌不辍，忠实地实践着博雅书院

教育的内涵；至于一些全国性的州立大学则在大量的专业课程之外，也努力地加入了一些博雅书院教育的元素；最后，可以说所有的地区性州立大学都和博雅书院教育的距离非常遥远了。

就办学的宗旨而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工相当清楚：全国性的公私立大学都以研究为主、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文理大学则都以教学为主，而地区性的公私立大学除了以教学为主之外，某些院校也提供一些职业教育的课程。当然有一些较为商业化的私立大学只针对市场的需求，提供职业教育的课程。另者，

两年制的小区大学除了提供一般四年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之外，也肩负着提供职业教育的任务。

我们就以美国最庞大也是最优秀的加州公立大学系统为例。该系统由以伯克利分校为首共有10所分校的加州大学系统，和以长堤分校（Long Beach）为旗舰学校共有23所分校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共同组成。前者比较重视研究、学术训练和研究生的教育；后者则着重于教学、职业训练和本科生的教育。虽然两大系统如同美国其他的公立大学一样，都有基本的通识教育，但是谈到博雅书院教育，两者就有所不同。两个系统都有面向优秀学生的某种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或荣誉计划（Honors Program）的设计，但是总的来讲，加州大学系统比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提供较多特别设计的荣誉课程，而前者往往也会辅助以一些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或是住宿计划（Residential Program）的配置，所以这些院校对于博雅书院教育的高远目标，可以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些全国性公立大学具体的做法会在第七节详述）。

既然美国大学有清楚的分工，那么这些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不同类型的大学在排名上孰优孰劣？可以被公正地比较评量吗？

众所周知，任何种类的大学排名与评量总是无可避免地充满了争议，美国的情况自不例外。即便如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从1983年开始每年秋季发布的大学排名，还是被广泛地使用与讨论，因而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但是基于全国性的综合大学和文理大学不论在教育的目标还是内涵都截然不同，所以它每年分开公布了包括312所学校的“全国性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和有着233所学校的“全国性文理大学”（National Liberal Arts College Rankings）的两种排名。虽然此种作法可以避免把橘子和苹果放在一起比较的尴尬，但是却无法满足学生、家长和高中辅导人员的需求。因此长期以来，因为从事商业排名而著名的《福布斯杂志》（Forbes）就于2008年第一次公布了它自己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

根据该杂志2018年八月发布的“美国顶尖大学”（America's Top Colleges）的排名，前十名的

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是全国性的私立大学，第十名到第二十名的学校则有五所全国性的私立大学，一所全国性的公立大学，以及四所全国性的文理大学。若就前50名的学校来看，共有25所全国性的私立大学、6所全国性的公立大学，以及19所全国性的文理大学。由此观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基本上是由全国性的私立大学所主导，但是若就前50名学校的分布数量上来看，全国性的私立大学和文理大学两者几乎等量其观、各擅胜场。

虽然《福布斯杂志》的排名可能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排名争议性更高，但是至少可以给那些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学者，和那些同时被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所录取的学生一些线索来做比较。

六、什么是现代的博雅书院教育？

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脉络来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类型和排名，因为高度不同，自然有着独特的意义。但是博雅书院教育从1636年的哈佛学院肇始，至21世纪，究竟它的现代意义为何？如何去实践它的理念？它又如何不同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对于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与其去定义它是什么，不如去定义它不是什么，可能更加容易了解它真正的涵义。

文理大学所提供的博雅书院教育是培养“通才”^⑥（generalists）的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与全人教育（whole education），在住宿学习（residential learning）、亲密互动的学习，以及小班制（多数课程少于20人）的教学环境之下进行个别化的指导。美国全国性文理大学的学生数目一般在2000人以下，师生比在1：10左右。在如此精致化的学习环境里，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都有着既深且广的互动，因而建立起一个有着既严肃又严格的学习气氛的教育社群，训练学生成为不仅有知识（knowledge）和见识（information），而且有广阔视野（vision）的现代公民。

相形之下，综合性大学所提供的专业教育，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培养“专才”（specialists）的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在全校往往有数

万学生之谱、每堂课有数百学生之多的庞大学习环境之中,提供较具专业性(professional)、职业性(vocational)、技能性(technical)和实用性(practical)的训练。训练学生成为工作能力取向的专业技术人员。所以美国的博雅书院教育和专业教育不论就规模、目的和师生关系而言,都是大相径庭,代表了两套不同的高等教育传统。

博雅书院教育也不同于通识教育。但是因为国内比较缺乏博雅书院教育的经验,再加上它和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不同,注重的是非专业、非职业、非技能与非实用的教育内涵,所以许多人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两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与依存性,所以要用言词加以解释其中的区别也是高度困难的。简而言之,博雅书院教育是此种非专业教育内涵之中较为抽象的“神”(spirit),而通识教育则为其具体而微的“形”(framework)。若就“体用论”的对比来说,前者为“体”、为“主体”(非“形体”)、为“根基”,后者为“用”、为“应用”、为“枝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更加具体地说,通识教育是一个广泛接触各种基本知识的学习过程,仍然是一种可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被评量的知识传授之学。而博雅书院教育是以人格、个性养成为取向的“修身养性”(self-cultivation)和“安身立命”(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之学。因为此种教育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即使可以被评量的话,也将是一个极为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总之,任何一流的文理大学必然有一套扎实的通识教育,因而“形神兼备”,但是任何一个综合性大学,虽然一样有着通识教育的课程,却往往因为缺乏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徒然“有形无神”。因为博雅书院教育的精华不在于一套“机械式”地提供的课程,而在于老师对于学生如“春风化雨”一般、近于无私的承诺与奉献。所以一个理想的书院教育,就如同台湾成功大学的黄昆岩老师所形容“教养”就像“风”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无形也无踪,但是当清风拂面之时,受者自当心领神会。^[1]

所以博雅书院教育应该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从数个如同哈佛学院一样位于美国东岸

的常春藤联盟大学的书院,到数以百计像威廉斯文理大学一般遍布全美的独立的小型文理大学,在在述说着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公开的,因为对于美国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无人不知,但是绝大多数的国人,对于这些小型的文理大学所提供的优质博雅书院教育,几乎一无所知。

如何证明博雅书院教育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呢?虽然此类教育模式较为抽象,不容易被以量化的方式来评鉴,但是所谓“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从长期以来博雅书院教育的毕业生的表现来做论断。

虽然美国文理大学的毕业生在数量上远逊于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今天美国大约1500万的大学生之中,只有约30万也就是2%的学生,在文理大学就读),可是前者在社会许多领域之内,都有远超过其所代表之比例的卓越表现。

一份1998年的调查显示,尽管当时只有3%左右的大学生毕业于文理大学,可是美国8%的企业行政主管(CEOs)、19%的总统(包括尼克松和里根两位总统)、23%的戏剧类、19%的历史类和18%的诗文类的普立兹奖(The Pulitzer Prizes)得主,以及20%美国大学较古老也是较优秀的“斐陶斐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成员都是毕业于这些私立的小型文理大学。^[2]而在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代表共和党的麦肯(John McCain)和民主党的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两位候选人,以及前面提到的在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母校也都是些小型的文理大学。

同一份调查也显示这些文理大学的毕业生在科学领域内的表现也不遑多让。他们拿到科学博士的比例也两倍于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而在调查前两年内的数据也显示他们占有了20%的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席次。^[3]

上述的统计数字也清楚地说明这些学费昂贵的小型文理大学在世俗化、商业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观念不断地冲击之下,仍然能够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七、美国公立大学之中的博雅书院教育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和私立小型文理大学并存至少百年之久的美国公立大学，在其庞大的系统之中，究竟又有哪些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可以平衡这些院校过度重视实用技术的专业教育呢？

美国许多的公立大学对于如何实践博雅书院教育各有不同程度的作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两大类型。

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校内一共成立了三个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以成立最早的“麦迪逊学院”（James Madison College）来说，它约有1150位学生，单独招生，以研究国际关系为主，是一套自有师资、课程、主修和宿舍的精英书院教育的模式，可谓是公立大学里面“校中之校、城中有城”的代表之作。

相对之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模式远较前者平民化许多。它在校内设有六个主题化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每一个学院有3000到4000名左右的学生，前两年住校，没有专属的师资、课程和主修，而是以和学院主题相关的各种住宿、学术、和课外的社团活动为主。但是该校在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模式，并不十分成功。其原因至少有三：（1）主题（如文艺复兴、社会责任、平衡的生命等）似乎过于广泛高远，而且彼此之间缺乏连贯性；（2）该模式没有专属的师资、课程、和主修，所以不够严谨；（3）学生人数过多。可是即便如此，此一模式仍然成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平民化住宿教育（residential education）的代表。

总而言之，从本文所举出的各种公私立大学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的四种书院教育的模式，其中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从上到下依序递减，反映出每一个模式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威廉姆斯文理大学模式：一所独立的小型私立文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书院，学生尽在其中，无所遗漏。

哈佛大学模式：一所存在于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中的本科生书院，所有的大学部的学生尽在其中，

无所遗漏。

密歇根州立大学模式：数所存在于综合性公立大学之中的小型精英书院，只有少部分大学部的学生纳入其中。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模式：数所存在于综合性公立大学之中的大型住宿学院，所有的大学部学生都归属其中，无所遗漏。

八、两岸四地的博雅书院教育

有鉴于“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的重要性，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一些大学在过去十多年以来，纷纷以设立住宿书院的方式来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其中包括了大陆的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康书院”和北京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Schwarzman College）；台湾的政治大学的“政大书院”、新竹清华大学的“清华学院”、东海大学的“博雅书院”、中正大学的“紫荆书院”、亚洲大学的“三品书院”和中华大学的“中华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五所新设的书院和澳门大学的住宿学院，等等。

附带一提，作为一个小型华人社会的新加坡也和耶鲁大学合作，于2013年成立了耶鲁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学院（Yal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llege），招募100名教授和1000名学生，以1：10的师生比来培养未来新加坡社会在各个领域所需要的领导人才。该学院并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名额，面向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招生，以期进一步国际化新加坡的高等教育。

既然博雅书院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直到今天也是美国本科生教育的典范，那么前节所述的美国大学的四种书院模式是否可以给我们参考？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推动博雅书院教育的各种实验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虽然可以说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在上述的四种模式之中，从上到下依次递减，但是国内的大学却不能“取法乎上”（可能除了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和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之外），因为

美国前面两个私立院校的模式自有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优越的财务条件。在只能取法乎“下”的情况下，那么在和国内的大学较为接近的两所美国的公立大学所展示的后两种模式之中，哪一个较适合我们借鉴呢？在高等教育的两大终极目标——卓越与平等（Excellence and Equity）之中，密歇根州立大学模式追求的是精英式的“卓越”，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模式则是以低调的方式“追求卓越的平等”（Equity with Excellence），或是“追求平等的卓越”，也就是“普及性的卓越”（Excellence with Equity）。由此观之，后者可能最适合国内参考，以住宿教育为起步，在“卓越与平等”两者之间逐步渐进。

那么在国内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知道博雅书院教育必须“形神兼备”，那么在推展此种精致化教育的同时，也会遭遇到从这两方面来的挑战。

在“形”的方面，由于博雅书院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识教育和住宿教育，所以要在国内发展，首先就会碰到在通识教师的数量上，以及教学质量上的种种挑战，再加上住宿资源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挑战，可谓是困难重重。

至于在更为重要的“神”的方面，因为博雅书院教育的精华并不在于一套“机械式”地提供课程、或是宿舍的硬件设施，而在于老师对于学生如“春风化雨”一般、近于无私的承诺与奉献。因此这可能就成为在国内推动博雅书院教育最大的挑战，因为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并没有博雅书院教育的经验。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的大环境里面，不论在文化上、观念上和制度上存在的种种挑战。譬如说我们的学生从小在考试领导教学的环境中成长，到了大学阶段才开始接触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是否已经积重难返了？再者，如果在理想中的大学阶段只修习博雅书院教育着重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大哉之学”，到了研究所阶段再念“经世致用”的“小学”的话，那么不继续升学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最后，是我们的社会从学校、家长到学生可以接受在毕业学分之中，只有少数是专业主修学分，其他都是通识教

育和住宿教育的学分吗？

总之，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势必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如何克服“橘逾淮为枳”的难题，找出一条最适合本土历史文化条件的道路，值得大家共同努力。

九、结语

本文先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视角来探讨美国高等教育从17世纪的起源，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重大变迁与发展，再论及美国公立大学的起源和各种大学的类型与排名，最后再从现代博雅书院教育入手，检视美国公立大学之中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目前推动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实验。

博雅书院教育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昨日之起源、今日之典范，那么又将如何走向未来呢？

今天美国的博雅书院教育，正在面临自19世纪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以及20世纪的经济大恐慌时期之后的第三波冲击，而这一波冲击的内容也相对复杂。随着有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称的数位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的兴起、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Great Recession, 2007—2012），加上中国迅速崛起给西方带来的挑战，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另一波更严峻的转型压力，而传统的博雅书院教育正是首当其冲。

譬如说有些公立大学开始考虑削减通识教育的课程，以期提供更多的空间给专业的应用科技课程，并缩短学生修业的年限。笔者任教多年的西方文理大学（Occidental College）也在2017年正式成立了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的主修，以配合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需要。至于尚称注重博雅书院教育的加州大学系统，近年来也有较多的分校除了经济主修之外，也开始设立了更为专业的商业主修。

不过同时也有重量级的大学，如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开始探讨将工程学科和博雅书院教育结合的可能，该校也于2017年揭幕了耗费七亿美元的“南加大村”（USC Village），提供给本科生更好的住宿学习的环境。再加上在世界的范围内，博雅书院教育的推动正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之中方兴未艾。所以，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昨日之起源、今日之典范的博雅书院教育, 未来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地展现不同的风貌(譬如说以研究学科史的方式和工程、教育、法、商、医、农等专业学科结合), 进而继续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 仍然令人高度期待。

注释

- ①“博雅书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词的翻译因人而异, 有人因其重视文学与科学的内涵而译为“文理教育”、或住宿教育的内涵译为“书院教育”, 最为普遍的译名则是取其博大典雅之义而译为“博雅教育”, 又有一说此译名也是根据它的英文“ber”和“arts”的发音而译为“博雅”, 不论如何, 笔者认为唯有译为“博雅书院教育”才可一窥全貌, 至于“文理教育”一词, 因为今天此种教育早已纳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不十分贴切。
- ②关于“博雅书院教育”更多的内涵, 请参阅 Rebecca Chopp, Susan Frost, and David H. Weiss, eds., *Remaking College: Innov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③Harry R. Lewis,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 ④关于“授地大学”更多的内涵, 请参阅 Stephen M. Gavazzi, and E. Gordon Gee, *Land-Grant Universities for the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 ⑤严格来说, 还有第七种类型的四年制大学, 就是包括如位于纽约市的茱利亚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和加州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之类, 着重于表演艺术和艺术设计的专业学院。
- ⑥譬如说人文和社会科学学士和硕士的学位的英文名称, 不论学科, 都是“艺术学士”(Bachelor of Arts: B.A.)和“艺术硕士”(Master of Arts: M.A.), 而除了少数音乐、教育、法学、医学、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等专业学科以外, 其他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的英文名称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这些学位名称的英文原义反应了古典大学教育培养通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黄昆岩. 黄昆岩谈教养[M]. 台北市: 联经出版公司. 2004.
- [2][3]The Nation's Top Liberal Arts Colleges. College News. (<http://www.collegenews.org/topliberalartscolleges.xml>), May 2, 2007.

Origi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sung Chi

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classic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its critic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from being liberal arts-centered to professionally centere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and then touches upon the origin of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ranking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Lastly, making references to contemporary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t examines the cont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ithin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those experiment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urrently undertaken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Key wor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American Liberal Arts College; American Land-Grant University

跨文化的“翻译诗学”对话： 傅雷、本雅明与梅肖尼克之理论探索

姜丹丹

摘要：本文旨在跨文化对话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中国现代翻译家傅雷（1908-1966）的翻译理念，尤其从“神似”“气韵/节奏”等角度将傅雷的翻译观点与西方翻译理论家本雅明、梅肖尼克的理论观点相比较，并在对话的基础上深度探讨了在傅雷的翻译观中种种悖论的结合与融通，最终化用审美“境界说”的术语将傅雷的翻译诗学的境界归结为一种“忘我之境”。

关键词：傅雷；翻译与诗学；本雅明；梅肖尼克；神似；节奏；气韵；境界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1-0074-08

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构与革新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的翻译观无疑有如一座矗立的灯塔，其散发出的光芒至今仍映照和启发着围绕翻译的思考。尽管这位大翻译家论述翻译和有关翻译批评的话语为数不多，但形成了明确、鲜活的统一体，即围绕“神似”为核心，如他在《高老头（重译本）》中提出的翻译与绘画之间关联的著名表述所言：“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①。本文试图在东西方翻译与诗学理论语境的穿梭中重新审视傅雷提出的翻译理念的价值，并进一步在跨文化对话的多重层面上重新界定与探究傅雷翻译诗学的境界。

一、傅雷的“神似”与本雅明

傅雷的绘画批评话语与其翻译话语不可分割，犹如同源之水。在《观画答客问》里，傅雷在回答关于对同时代的现代画家黄宾虹的“画甚草率”的困惑时，为之辩道：“画之工拙，与形之整齐无涉。若言形似有亏：须知画非写实”，并进而强调“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②。在《致罗新璋信》中，傅雷重申了他的翻译观的关

键所在：“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③。这个观点出自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传神论”，在理论根源上可追溯到庄子的思想（《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尤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见解为代表（如顾恺之在论人物画时曰“以形写神”“晤对之通神”，以求人物之“神韵”）^④。正是在“重神似”的意义上，傅雷视黄宾虹为精神同道，并透过对其山水画的批评，指出在审美上要“不囿于形迹”，更深入论述了绘画中“形似”与“神似”的境界差别：“形若草草，实则规矩森严；物形或未尽肖，物理始终在握；是草率即工也。倘若形式工整，而生机灭绝；貌或逼真，而意趣索然；是整齐即死也。此中区别，今之学人，知者绝鲜；故斤斤焉拘于迹象，唯细密精致是务；竭尽巧思，转工转远；取貌遗神，心劳日；尚得谓为艺术乎？”^⑤同样，傅雷在翻译美学上摈弃“取貌遗神”，认为“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⑥，他更进一步提出“破形取神”的说法，因而，在翻译策略上，傅雷可谓“在神似和形似发生矛盾时，舍形而留神”^⑦。

作者简介：姜丹丹，女，山东烟台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哲学系硕士导师，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

傅雷的翻译理念与他的艺术审美境界的追求密切相关，重塑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不求局部的忠实，而求整体上、精神融通层面上的忠实，即审美层面上的“忠实”。正如罗新璋先生指出的，傅雷所言的“神”“既指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又指字句声色里蕴涵的神韵”^⑧。这与德国现代文艺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再定义的翻译的忠实观相接近，本雅明质疑在形式层面的所谓“信”，也批判了仅仅为了“保留意义”的“自由”：“‘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到什么作用呢？翻译中对个别词语的忠实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其对原文的诗意而言，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而是要赢得这样一种诗意，甚至达到所指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指意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音调的时候，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完全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形式再生产方面的忠实何以极大的阻碍意义的转换就不言而喻了。……糟糕的译者毫无限制的自由可以达到极佳的保留意义的目的——而在文学和语言上则是极为糟糕的。”^⑨本雅明所注重的不是翻译对字词的忠实，而是对整篇文章的“气氛”“情感音调”的忠实。

傅雷认为不要过于“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他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都把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⑩“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⑪。傅雷同样抨击了仅仅拘泥在“形似”层面的翻译的缺陷：“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⑫。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求其达意”正是代表了“意似”的阶段，在传递“统一的，完整的”风格的层次上求“神似”显然是傅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本雅明则用“容器”（另译“陶罐”）的隐喻说明了他所认为的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吻合”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了译

文的“统一”：“一件容器的碎片若要重新拼在一起，就必须在极小的细节上相互吻合，尽管不必彼此相像。同样，译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义，而是要周到细腻地融汇原文的指意方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成为一种更宏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恰如容器的碎片是容器的组成部分。”如将这段论述仅仅理解为对“形似”的描述，则有失偏颇，而实际上所喻示是一种“离形（蓝图）的似”^⑬。本雅明反驳了“精确性”的翻译标准，认为这无益于揭示翻译的“本质性”问题，他还指出：“译文所表明语言之间的亲缘性要比两部文学作品之间的表面的、难以定义的相似性所表明的要深刻和清楚的多。要把握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真实关系，需要进行考究，考究的意图类似于认识批判借以证明意象一模仿理论之不可能的思维进程”^⑭。

傅雷提出的“神似说”也同样试图超越模仿原作和超越表面化的“形似”，在此基础上，他探求了原作与译作、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神”与“灵”的层面上的互通，这意味着傅雷在看待两者的关系时实际上先验地认为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相通的“本质”。而本雅明则认为翻译是要接近一种本质的语言，如“各种终极秘密的无张力的甚至是沉默的储存”，即隐藏在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内核”，呈现语言间的互补关系。本雅明在“道”的高度上定义了纯语言：“在不同的语言中，终极本质即纯语言只与语言因素及其变化相关，而在语言创造之中，它却背负着沉重的、陌生的意义负荷。要解脱这一重负，把象征变成被象征，从语言流动中重新获得圆满的纯语言，则是翻译的摸底和唯一的功能。在这种纯语言中——它不再意指或表达什么，而作为非表现性和创作性的‘道’，它成了各种语言所意指的东西——一切信息，一切意义，一切意图，最终都在一个语层上遭遇，并注定在这里消亡。”本雅明还围绕纯语言界定了“译者的任务”“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解放他自身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在对作品的再创造当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为了纯语言的缘故，他打破了自身语言已经腐朽了的障碍。”^⑮而傅雷多次提到他所处时代的白话文在外语的“相异性”的碰撞中凸显的不足，他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

等, 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⑥, 他还试图在翻译实践中吸收不同类型的语言来丰富和改造白话文, 如“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 熟悉各地的方言”^⑦, 但强调不要遮蔽原文风格的“界限”。

在谈到译本接受的问题时, 傅雷指出: “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 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 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⑧。这与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开篇从艺术自足论的角度重构翻译地位的观点有近似之处, 本雅明认为“旨在发挥传达功能的译文……只能交流”, 而“低级的翻译”正是“对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传达”^⑨。傅雷提出的“神似说”超越了翻译沟通的功能局限, 力求传达整体上的“神韵”, 还力求捕捉字里行间^⑩的“弦外之音”“意在言外而又无处不在的神思和气度”。叶嘉莹在论及中国古代审美境界的术语时, 从“心与物相感后所引起的一种感受之作用”的角度将“神韵”诠释为“似偏重在由感兴所引起的言外情趣”^⑪。而本雅明所定义的“好的翻译”的标准, 正是要超越沟通的层面, 把握文本中“不可捕捉的、诗意的、神秘的”维度。但无论是对“纯语言”还是对文本中“不可捕捉的”维度的定义, 本雅明的立场都具有神秘主义和宗教性的倾向, 而傅雷的立场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选择。最终, 本雅明以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在各种限度里定义了可接近本质语言的“逐字直译”, 这一点在法国当代理论家安东尼·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1942—1991) 那里更得到了新的发展, 即在伦理层面上所强调的对相异性的尊重以及让母语接受外语的撞击和考验。而傅雷的翻译观在伦理的出发点上不仅尊重原文, 还要达到“神似”意义上的整体把握, 但在翻译策略上, 又强调译入语的通顺流畅, 但这并不可过于简单地理解为“归化”译法, 这位大翻译家在融纳各种语言要素的层面上趋向一种语言的理想状态, 因而, 傅雷的翻译理念与贝尔曼的观点在表面的差异中有趋同性, 更与本雅明界定的“直译”翻译境界在表述的差异之外有着深层精神上的接近。关键在于, 傅雷式的翻译, 正如本雅明所言, 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 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 而是原作的“再生”, 是原作的“生命延续”。

二、“气韵生动”: 傅雷与梅肖尼克

在傅雷的“神似说”中, “气”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潜在的概念, 正如在他所参照的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中, 作为万物的生命的气, 也是一切艺术的生命, 更是艺术“真假、死活”之关键。在提到杨必的翻译时, 傅雷不乏严厉的指出: “普通总犯两个毛病: 不是流利而失之太自由 (即不忠实), 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 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 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⑫。这段话的言下之意, 即译文是否有“气”是衡量译作质量的标准: 气息不连贯, 译文则失去了韵味; 气息连贯, 则胜于字面忠实而缺乏“气”, 但同样要避免另一极端, 即过于自由的“流利”。可见, 傅雷所讲求的翻译之“度”是对原作的“气息”的回应。正如五代绘画理论家荆浩所言: “似者, 得其形, 遗其气; 真者, 气质俱盛” (《笔记法》)。

在注重把握和传达原作的“气息”的层面上, 傅雷的翻译策略的境界超越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传统二分法, 正如在中国古典画论中, “重气韵轻形似”的理论关键不在似与不似上, 而在如何对待“形”的问题上, 以神统形, 以意融形, 形神结合,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⑬。在批评一篇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的传记的中文译作时, 傅雷写道: “译者原来文字修养很好, 但译的经验太少, 根本体会不到原作的风格、节奏。原文中的短句子, 和一个一个的形容词, 都译成长句, 拼在一起, 那就走了样, 失了原文的神韵……毛病就在于他功夫用得不够”。形式的变形如果损害了原作的“风格、节奏”, 则同样是损失“神韵”的译法; 相反, 在傅雷眼中的好的译文标准应当是自六朝谢赫在《画论》里确立的第一条原则“气韵生动”。

关于傅雷对译入语的要求, 以下观点常被援引: “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 无生硬拗口之病; 又须能朗朗上口, 求音节和谐”, 由此出发将他的翻译策略划入“归化译法”的范畴; 而傅雷的这个论述的后半句所蕴含的翻译标准更不容忽视, 体现了对原作的“相异性”的尊重: “至节奏与 tempo, 当然以原作为依归。”^⑭傅雷在翻译中对

文本节奏与速度感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法国当代诗学与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 1932—）提出的观点的相似性；梅肖尼克把文本视作运动，强调传达气息与节奏，尤其是“口语性”。这种特征在傅雷翻译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的小说时显得尤为突出，比如他在翻译《贝姨》时强调在译文中运用俚语、烘托文白混杂的效果。在这层意义上，傅雷对原文的关注符合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中所探求的对“话语”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对“语言”的翻译，正因为写作“将语言的价值转换成话语的价值”，而这样的翻译观则使翻译如写作一样，具有了“主体化”的特征。梅肖尼克还指出：“翻译要依据一种口语性，一种身体性，依据语言与话语的一种作为话语体系的社会性”，翻译要关注节奏，“因为意指的方式，胜于词语的意义，正在节奏里，正如语言本在身体里，而书写颠倒了这关系，将身体置于语言之中”^⑤。在谈到翻译与音乐的关系时，傅雷还写道，“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chumann”^⑥，他正是强调在内在中体纳、在身体中蕴涵原作的气息，以求在翻译或音乐演绎中灵活再现。

在批评同时代的一些译作常见的缺点时，傅雷还指出：“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⑦他将节奏的连贯与原作形象的“完整”的传递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自我批评中，也同样显示了对“完整”的认同：“说到‘不完整’，我对自己的翻译也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无论译哪一本书，总觉得不能从头至尾都好；可见任何艺术最难的是‘完整！’……但能在某一个阶段求得总体的‘完整’或是比较的‘完整’，已经很不错了。”这种“完整性”是文字的、也是气息的连贯，正如傅雷在黄宾虹的绘画批评中所论的“笔之道”：“一涉图绘，犹有关乎全局之作用存焉。可谓‘自始至终，笔有朝揖；连绵所属，气派不断’，是言笔纵横上下，遍于全画，一若血脉神经之贯注全身”^⑧。梅肖尼克则用“连贯性”（“连续性”，continue）的表达对应对文本的整体性观

照，他认为，译事要“倾听连贯性。以主体化对应主体化”，并用一连串的诗化的语言描述了“连贯性”：“节奏的、韵律的、语义的连贯。语言与主体之间的连贯。语言与文学，话语与文化，语言与历史之间的连贯”^⑨。

傅雷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在写作的高度上定义了翻译的标准，符合梅肖尼克强调主体性的翻译观。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36条主张》里的第10条提出：“如果说文本的翻译和文本一样被结构和接受，文本的翻译是‘阅读、写作’过程中的‘写作’，是创作主体的一次历史性探险。相对原文，译本不该是透明的。”在随后的第11条里，他继续论述：“真正的翻译与‘透明翻译’相对立，应是一个历史主体特殊形式的重新表述，是两种诗学的相互作用，是中心的偏移，包含了语言的内外，和该语言的文本化过程。”傅雷的翻译并不讲求制造传统意义上的“透明”效果，他所讲求的等同于“中文写作”的理想化的翻译，借用梅肖尼克的说法，不是“被动的思维性写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的创作”。这一点在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经验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傅雷写道：“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⑩在问题与气势之间，傅雷倾向于后者，而他的翻译观有别于卞之琳在后期诗歌翻译中提出的“亦步亦趋”“以形似求神似”的观点，而是在带着主体气息的“再创作”中贴近原作的气息，进而达到他所追求的“神似”的境界。正如梅肖尼克所强调的“忠实”是对节奏的忠实，因而，这种视野里的翻译观是节奏的伦理学，也是节奏的诗学。傅雷的翻译把握住了原作的节奏，因而使翻译成为重新的写作（但在傅雷看来不同于“中文创作”），在翻译中实现了梅肖尼克意义上的“中心偏移”。

梅肖尼克认为：“倾听连贯性，不是知识层面上的，而是主体的连贯性，带着它的不确定的方面”，他反对制造所谓“自然幻觉”的译者的“隐匿”和“描红”的摹仿效果，因为那会“抹去属于另一种意指方式的特性，抹去距离、时间、语言和文化。”傅雷则强调倾听原作的“风格”，这里的

“风格”绝不仅是文体意义上的风格，而是带着作者主体特征的知识、气息、气势、气质的综合体。在自我批评中，傅雷时常清醒地意识到与原作风格之间的差距，如他在谈“服尔德”（今译伏尔泰，Voltaire）的译本时，“嫌不够古雅，18世纪风格传达不出”^③。他也指出：“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④。而在论翻译的“过”与“不及”时，傅雷也指出：“这不光是个人的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梅肖尼克在强调传达原作的“相异性”时，批判了“译者的一种朽木之语（langue de bois）”，这对应依据语法系统的惯常知识进行僵硬的、程序化的翻译转换，而梅肖尼克所定义的翻译诗学具有“将朽木之语燃烧的快乐”^⑤。梅肖尼克指出，“翻译一个文本，不是翻译语言，而是在母语中翻译一个文本，译本因为语言成为文本”，他认为好的翻译最终是要传达“诗学思想”“诗学思想是一个主体转换意指、感觉、思想、理解、阅读与观看——甚至包括在语言中生活的模式的特殊方式，主体同时创造了自身。这是对语言发生作用的行为模式”。傅雷从“神似说”出发的翻译观与梅肖尼克强调的传达主体性、节奏和诗学思想的理论有接近之处。为了实现成为新的写作、气脉贯通的翻译，傅雷同样寻求“活”的语言，在语言的层面上，他这样反思：“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⑥。傅雷还指出，在他所身处的时代，“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因而，他认为译文“要求内容生动，非杂糅各地方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坏，斯大难耳”^⑦。此外，傅雷提到他重译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主要是“因为初译本运用文言的方式，使译文的风格驳杂不纯”“有时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问题”“方言有时也得用，但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

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作”，因而，他认为“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至于形成和谐完整的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⑧。

傅雷的翻译观虽与梅肖尼克的节奏诗学、动态语言观呈现出互通对话的可能性，但梅肖尼克极力打破理论与语言传统、致力于翻译诗学革命，因而在他的理论表述和翻译尝试（比如他在《翻译诗学》中对中国古诗《春眠》改造法语规范的创新性翻译）体现出有棱有角、不免极端的诗化特征，而相比之下，傅雷主张的翻译境界与之的根本差别在于：基于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傅雷最终探求的是一种“和谐完整的风格”。傅雷的译作可谓是在另一片文化土壤上生出的另一个生命，带着和谐、鲜活的气息，与原作息息相通，神韵相合。

三、傅雷翻译诗学中的自我意识：“忘我”之境？

傅雷既重视“领悟”原作的精神，又要求翻译应如“中文写作”。在“阅读、写作”的翻译进程中，他强调“化为我”：“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方能谈到译。”^⑨恰因了这个明确的观点，有批评者将傅雷的翻译策略归入“归化”译法，或借用王国维定义审美境界的术语将之归为“有我之境”，但如果细观傅雷的翻译理念内在的悖论性与丰富性，这种归结未免显得过于简化。

傅雷的翻译理念符合梅肖尼克在写作（即话语—系统）的层面上重新定位的翻译诗学观念，当然他的翻译具有“主体化”的倾向。但在译者的主体性的问题上，傅雷的翻译态度既洒脱，又求自我的“度”，既不刻意隐匿自我，也不过分彰显自我，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悖论又明晰，正恰合中国古典思想的“精妙之处”，如马尔罗所言，“专心的不去培育自我”“中国精神的精妙之处在于不对自我有所意识，即不知‘我’之为我”。^⑩或也如梅肖尼克借用波德莱尔在《哲学艺术》里的一段话定义的“主体”的意义：“依据现代观念的纯艺术”，即是“在创

造出一种暗示的魔力, 来包容客体与主体”^③。因而, 傅雷的翻译作品贴上了译者——历史主体 (sujet historique, 借用梅肖尼克的术语) 的鲜明标签, 但并不是安东尼·贝尔曼所批判的自恋意义上的“充盈的自我” (sujet plein)。正是在这个角度上, 傅雷这样批评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 “译者的个性、风格, 作用太大了”^④。在理解原作的过程中, 傅雷表明了对“相异性”的认识, 他强调了不同语言与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同”: 语言层面 (文字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与习惯、修辞格律、俗语) 的不同反映了民族思想方式、感觉深浅、观点角度、风俗传统信仰、社会背景、表现方法的不同。译文的“韵味”“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 过则求其勿太过, 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⑤。由此可见, 傅雷充分认识了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间隔”, 立足在间隔之上, 又置身在间隔之中, 生出融通之可能性。

鉴于难以回避的“相异性”, 傅雷认为如果要强硬地“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 以求“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非但是刻舟求剑, 而且结果往往是削足适履, 两败俱伤”^⑥。傅雷的翻译实践是认识他者、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他力求在翻译前“深刻的理解, 体会与感受原作”, 以至于“人物历历如在目前, 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⑦, 但有时也认识到自我在性格或语言方面“适应”的局限^⑧在翻译倾向的出发点上, 傅雷讲究对原作的忠实, 但并不是描红式的摹仿, 他所讲的“化为我有”, 意味着吸收、容纳“异”, 但又保留了相异性, 这里的“我”不是个体的小我, 而是指整体的文化范畴而言, 关键在于让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产生一种亲密的关系。傅雷如此陈述他在译巴尔扎克《幻灭》一书时的体验: “诚为巨构, 译来颇为费神。如今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 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⑨可见, 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采取吸纳相异性的态度, 但在翻译—写作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力求在与原作精神的交融中“忘记自我”“自我”甚至进入了出神的状态, 与他者相认同。在译入语的策略上, 他既要求中文表达的流畅, 又在译文中传

达原文的气息和节奏感。

沿用王国维的审美“境界”的表述, 正是因了这种悖论的结合与融通, 傅雷的翻译从“神似”的追求出发, 实质上抵达了“无我之境”。王国维在心与物的审美层面上定义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差别: “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⑩, 但正如朱光潜所言, 在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不是绝对的分离, 似不如说换为“超我之境”和“同物之境”, 翻译与诗一样在任何境界中都须有“我”, 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与经验的返照”^⑪, 而傅雷理想中的翻译是自我与他者的互认、融合的过程, 他对译者能力的要求“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无敏感之心灵, 无热烈之同情, 无适当之鉴赏能力, 无相当之社会经验, 无充分之常识 (即所谓杂学), 势难彻底理解原作, 即或理解, 亦未必能深切领悟。”^⑫傅雷在翻译实践中做出了淡化自我、“超我”的努力, 对原作求神似的、气质的忠实, 在一定程度上与原作达到了“不隔”的境界, 而在译文中切近一种理想的、本质的语言标准。时代在演变, 翻译的语言也在经历着时间的考验,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 傅雷的翻译语言显然带着他所在的传统与现代交接处的时代的痕迹, 但他将方言、文言与白话做了恰到好处的结合, 做到了在旧与新、俗与雅之间的艺术层面上的“净化”效果, 如苏轼所言: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傅雷的翻译是与原作有神似切合的写作, 在音质的效果上, 正如莫扎克的音乐, 穿越一层层阶梯, 融合对立的美学元素, 抵达通透之境, 亦如本雅明“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意义, 犹如风触及风琴。”归根结底, 傅雷的翻译之所以能达到“忘我之境”, 正出于他对于文学和翻译的“忘我的爱”, 如他在论莫扎特的音乐艺术时提到的好的艺术需要有“感情的深入”: 带着“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⑬。

梅肖尼克在《翻译的诗学》的“引论”中质疑了千百年来对翻译性质的提问: “翻译究竟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他认为被视为科学的翻译列入“文献学, 属于知识和语言的范畴”, 被视为艺术

的翻译则属于“趣味批评”的领域, 而从诗学的角度看, “翻译既不是科学, 也不是艺术, 而是操作文学思想、语言思想的活动”。他还指出: 翻译在科学与艺术的对立之外, 在语言的意义可称其为一种特殊的科学, 在思想艺术的角度是主体的科学, 正如伟大的“思想家”都是思想的艺术, 他用先破后立的方式最终确定翻译是艺术^⑩。傅雷正是翻译界的思想家与艺术家, 他所提出的翻译理念越出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氛围之外, 回归中国古典艺术精神, 呈现出独成一家的翻译艺术境界。而经过傅雷的翻译, 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19世纪法国文学家的作品的“生命”也直跃纸面之外, 直跃时间的限度之外, 在中文世界中“延续”, 并在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不断“再生”。正如本雅明所言, 在好的译文中, “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最完整的展开”^⑪。归结傅雷的翻译理念与实践的境界, 正如他本人这样论及黄宾虹的画作: “不宗一家一派而自融洽诸家于一炉, 水到渠成, 无复痕迹, 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 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 此其所以继往开来, 雄视古今, 气象万千, 生命直跃缣素之外。”^⑫

注释

- ①傅雷译. 高老头[M]. 平明出版社, 1951; 收录傅雷谈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3.
- ②傅雷. 观画答客问. 收录傅雷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201.
- ③致罗新璋信(1963. 即论文学翻译书). 收录傅雷谈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56.
- ④详见顾恺之画评、魏晋胜流画赞. 收录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文物出版社. 1982:5-8.
- ⑤观画答客问. 出处同上.
- ⑥高老头(重译本). 出处同上.
- ⑦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201.
- ⑧谢天振、李小均著. 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 天津出版社. 2005:126.
- ⑨瓦尔特·本雅明著. 译者的任务. 陈永国译. 收录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9.
- 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致宋奇. 收录傅雷谈翻译之“翻

译书札”. 23、28、23、24、32、29、32、29、28、29、23、31.

- ⑫傅雷. 翻译经验点滴. 收录傅雷经典作品选. 192.
- ⑬在此借用刘宓庆的提法. 参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⑭⑮译者的任务. 5、10.
- ⑰翻译经验点滴谈. 192.
- ⑱译者的任务. 3.
- ⑲参见叶嘉莹. 迦陵论词丛稿·〈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⑳参见朱良志. 中国美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69.
- ㉑致罗新璋. 56.
- ㉒Henri Meschonnic. Introduction. in Poétique du Traduire. Lagrasse. Verdier. 1999. pp. 24-25.
- ㉓《观画答客问》. 第200页.
- ㉔Poétique du Traduire, p. 26.
- ㉕《致傅聪》. 第38页.
- ㉖Poétique du traduire, pp. 21-22.
- ㉗翻译经验点滴谈. 192.
- ㉘致罗新璋书. 57.
- ㉙秦海鹰. 收录马尔罗与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05.
- ㉚Poétique du traduire. p. 25.
- ㉛④④高老头·重译本序. 3.
- ㉜翻译经验点滴谈. 190.
- ㉝“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 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 一时也摸不清. 了解对方固然难. 了解自己也不容易”. 出处同上. 191.
- ㉞致梅纽因. 1962年1月7日. 收录傅雷谈翻译之“翻译书札”.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55.
- ㉟参见王国维. 人间词话(重订). 陈杏珍、刘焯重订. 黄霖等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
- ㊱朱光潜. 诗论. 朱立元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1.
- ㊲致罗新璋. 第57页.
- ㊳傅雷家书. 1956年2月29日夜. 收录傅雷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76.
- ㊴Poétique du traduire, p. 18.
- ㊵译者的任务. 5.
- ㊶傅雷谈美术.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58.

参考文献

- [1]傅敏, 傅雷. 傅雷谈美术[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 [2]傅敏. 傅雷谈翻译[M]. 长沙: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 [3]傅雷. 傅雷经典作品选[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
- [4]谢天振, 李小均. 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 [5]陈永国.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6]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7]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8]王国维. 人间词话(重订)[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9]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0]许钧. 法国当代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1]许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翻译对话录[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12]朱光潜. 诗论. 朱立元导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3]朱良志. 中国美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4]Walter Benjamin,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in *Mythe et violence I*. trad. par Maurice de Gandillac. Dossier des lettres nouvelles. Denoël. Paris, 1971.
- [15]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Gallimard coll. Tel. Paris, 1984.
- [16]Antoine Berman.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in *Les tours de Babel*, Trans-Europ-Repress. Mauvezin, 1995.
- [17]Henri Meschonnic. Le texte commémoratif et sa traduction comme mouvement. dans *Le texte en mouveme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I. Paris, 1987.
- [18]Henri Meschonnic. Poétique du Traduire. Lagrasse. Verdier, 1999.

A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al Poetics” Dialogu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Fu Lei, Benjamin and Mesehonnic

Jiang Dand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 concept of Chinese modern translator Fu Lei (1908—1966) and try to compare his point of views with Benjamin and Mesehonnic's theoretical viewpo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likeness”, “rhythm”. Then, on the basis of dialogue,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opinions in Fu Lei's translation are deeply explored. Finally, in terms of aesthetic, the realm of Fu Lei's translated poems comes down to a kind of “ecstasy.”

Key words: Fu lei; Translation and Poetics; Benjamin; Mesehonnic; Spiritual Likeness; Rhythm; Realm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构建

邢会强 银丹妮

摘要: 智能投顾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智能投顾是从传统投资顾问发展而来的,其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一方面应符合证券投资顾问行业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符合智能投顾具有的新特征。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包括算法说明的披露、利益冲突的披露、资产和费用的披露、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披露、服务内容的披露、重大变化的披露、合规审查的披露等。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智能投顾; 信息披露; 算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 F275, D9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82-08

相较于传统投资顾问,人工智能投资顾问(以下简称智能投顾)是以算法为基础、通过机器学习来实现投资顾问服务。根据机器学习结果的不同运用,智能投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机器学习结果作为投资依据的阶段,简称智能投顾1.0阶段;二是机器学习后直接进行投资和账户管理的阶段,简称智能投顾2.0阶段。不同阶段的投资顾问服务具有不同的模式,所借助的工具也有所不同。

关于智能投顾的性质,主要有欧美等国的“投资顾问说”和日韩等国的“资产管理说”。各国立法之所以在规制“智能投顾”时采用不同路径,源于其在“智能投顾”上的不同立法思路。欧美投资顾问包含了资产管理,从事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的证券公司及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管理人等均注册为投资顾问,可以从事智能投顾业务。亚洲诸国采用狭义上的投资顾问,凡是符合一般经营者标准的机构,均可以提供投资建议服务;但只有符合较高标准并拥有资产管理牌照的经营者,才可以从事客户账户的全权委托业务。这也就是说,所谓的“投资顾问说”实质上包含了资产管理。^[1]本文对“投资顾问行业”也做广义理解,因为从事客户账户的全权委托业务是智能投顾的必然要求,也是智能投顾的优势所在。

智能投顾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由于智能

投顾是从传统投资顾问发展而来的,因此,其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一方面应符合证券投资顾问行业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符合智能投顾具有的新特征。

一、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的必要性

(一)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是市场公开原则的内在要求

在证券法的“三公”原则中,公开是首要的核心原则,是证券法律制度的精髓所在。信息披露制度是公开原则的规则化体现,监管者能够通过信息披露机制来更好实现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树立并维护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2]信息披露制度是保证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制度。^[3]信息公开原则是各国证券立法的核心原则,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本途径,是实现证券市场效率的基本条件。一部证券法的发展史,就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史,是信息披露不断扩张的历史。^[4]表现之一是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的扩张。最初的信息披露义务主体是上市公司,后来又扩展到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如今又扩张到了金融机构。投资顾问机构是金融机构的种类之一,也需要向其客户披露有关信

作者简介: 邢会强,男,河南漯河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金融法和财税法;银丹妮,女,四川理县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法。

息。智能投顾是升级版的投资顾问活动,也需要遵循投资顾问行业的一般规定,通过信息披露向投资者说明投资相关的基本信息,使处于信息劣势方的投资者能够根据必要信息的披露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

(二)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

信息与价值的关系是现代金融领域内核心问题之一,信息论奠基人沙农(Shannon)将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通过影响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进而决定了价格的变动、收益率的差异化以及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5]市场经济活动以市场信息交流为前提条件,市场信息是市场参与者决策的主要依据,其显示、传递的程度、方式和范围直接影响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适当的信息披露能够保障交易成功率的上升,促使接受服务方在足够理性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能够提高市场效率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这在投资顾问业务领域也是适用的。投资者作为智能投顾的客户,需要在知情的基础上进行委托,将其资金交由智能投顾打理。

(三)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是减少信用风险的重要途径

传统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是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接受客户委托,按照约定,向客户提供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议服务,辅助客户作出投资决策,并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经营活。动。^[6]在传统的投资顾问业务活动中,涉及三方主体,即客户、证券投资顾问(自然人)以及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法人)。开展一项投资顾问业务,应由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与客户签订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证券投资顾问应当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投资顾问,且只能以公司名义、公司账户向客户收取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用。在这个关系当中,客户与证券投资顾问是直接接触关系,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向客户提供服务是通过证券投资顾问来实现的。证券投资顾问必须遵守相关义务,如不得代客户作出投资决策,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勤勉、审慎地为客户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通常来说,证券投资顾问与客户会进行直接

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有特定的服务场所,向客户提供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信息介绍。

但在智能投顾业务模式下,不再需要自然人的证券投资顾问,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也不仅限于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①用户只需要填写相关问卷,机器人顾问便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和掌握的数据用算法分析出适合投资者的投资理财组合,通常不需要特定场所,不需要人工证券投资顾问的参与。在这种没有直接人工交流的情况下,一般客户很难对机器产生信任。而智能投顾面对的又是更广泛的中低净值人群,服务对象范围更大,要实现个体化的服务体验难度很大,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如何构建客户与机器人顾问之间的信任关系,是维护智能投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而信息披露则能成为客户了解投顾机器的最直接途径,因此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是使得客户信任投顾机器的重要链条。

(四)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的掀起,金融理财领域众多机构也纷纷涉足智能投顾,传统金融机构、IT公司、创业公司以及各互金平台都想赶上这一趟“快车”。从正面效益而言,这可以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强劲的市场竞争,但与此同时,也容易导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倘若没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则平台很容易利用智能投顾的特殊性来隐藏其背后真实业务模式,或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过算法设置牺牲客户利益的智能投顾建议。

信义义务对传统证券投资顾问的规制主要就是对“人性之恶”的规制,而机器比人更加“忠诚”,所以现阶段而言(不考虑机器深度学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智能投顾会出现问题更多是因为其背后的“人”出了问题,主要会存在这样一些操作:(1)利益勾结。为了节约技术成本,智能投顾平台可能会与科技类公司达成合作,由精通算法架构的公司为智能投顾平台公司提供智能投顾的核心算法,那么负责提供算法的公司和可能受其他第三方或智能投顾平台公司的利益蛊惑,专门设计使某只股票、某个金融产品被优先推荐的算法。

(2)自我交易。在智能投顾进入高级阶段时,则

会开展全权委托业务交易，此时智能投顾公司很容易进行自我交易，即将自家产品优先推荐给客户。

(3) 滥用用户信息。智能投顾提供服务的前提是了解客户，因此智能投顾平台能够收集到客户大量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价值非常高，很难排除智能投顾平台不会利用客户信息去谋取非正当利益。(4) 挪用用户资金。在全权委托模式的智能投顾服务中，客户的账户交由智能委托管理，投资的资金是处于一个流动变化的状态（尤其是短期投资），中间可能出现投资空档期，在复杂的技术黑箱里，客户很难明确了解自己的资金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智能投顾平台很可能利用这种优势而挪用客户资金。

要防止智能投顾平台利用投顾机器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信息披露使智能投顾平台置于监管者和投资者的监督之下，以促使智能投顾平台规范化运作，减少平台利用信息优势方地位做出违法违规行为。

二、目前我国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

迈向2.0时代的智能投顾市场亟需信息披露制度的支持。就当前我国市场上的智能投顾APP来看^②，在其整个业务模式中，人工参与度较高，仍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人工参与的主要方面包括：(1) 金融工程人员和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完成带有倾向性的资产配置体系，这一过程是有业务的倾向。

(2) 资产配置模型（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的资产配置模型）必然会涉及到对各类资产的趋势判断的问题，这其中大部分工作是由系统完成，但是最后会有人工审核。(3) 在购买完成后仍然有专属的投资顾问，为客户解决投资问题，帮助账户管理，普及智能组合知识。

在智能投顾发展的初级阶段模式下，智能投顾平台更多是被作为一种辅助建议性的投资工具，从法律地位来说其属于法律客体。其交易步骤主要分三步：第一步，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试^③。第二步，即在做完风险测试后，可直接进入产品购买界面，智能投顾平台便会根据客户的风险等级向客户推荐投资组合。第三步，客

户确认并购买投资组合。因而可见，智能投顾平台主要是依赖于客户的风险等级而做出的投资建议，这种建议并非是根据客户个性化的信息、特别的需求或相关反馈而做出的。这种模式实质上仍未脱离“同质化”推荐的做法。在此模式下，用户对智能投顾信息披露的要求确实偏低，一是客户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不多，对应的个性化算法较为缺乏；二是智能投顾平台所给出的仅为投资建议，而非全权委托业务模式，最终的投资决定仍需要客户重新考虑；三是人工投资顾问与客户直接沟通较多，客户对于书面规范化的信息披露关注度不高。然而，当智能投顾发展进入2.0时代时，人工参与度将非常有限甚至近乎没有，此际构建客户与智能投顾的直接信任关系必将成为智能投顾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信息披露制度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既有智能投顾信息披露规则缺乏可操作性。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简称“资管新规”）第二十三条针对智能投顾做出了专门规范：“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严格遵守本意见有关投资者适当性、投资范围、信息披露、风险隔离等一般性规定，不得借助人工智能业务夸大宣传资产管理产品或者误导投资者”，以及“充分提示智能投顾算法的固有缺陷和使用风险”，这是智能投顾首次出现在监管文件中。但是对于应该披露什么、如何披露没有细致规范，因此在实践中缺乏披露的参照规则和强制性要求，使得智能投顾平台“难”披露，监管者“难”监管，投资者“难”监督。

三、构建我国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建议

智能投顾是从传统投资顾问发展而来的，其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一方面应符合证券投资顾问行业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符合智能投顾具有的新的特征。

（一）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 真实性、客观性及完整性原则

智能投顾信息披露制度应当遵循真实性、客观

性及完整性的原则。信息披露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智能投顾市场的发展,提高监管效率,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首先,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应当是真实的,以构建起客户与智能投顾之间真实有效沟通;其次,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必须是客观的,不能以智能投顾方的主观利益作为出发点做信息披露,应当从客观出发,准确披露投资者或监管者需要知晓的信息;最后,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还应当是尽可能完整的,不能刻意回避某些对于智能投顾方可能带来不利的信息,需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2.上位法一般性规范与特殊规范相结合

美国是智能投顾的起源地,其智能投顾行业的发展和监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对于传统投资顾问行业的监管主要有两部一般性的法律,一是《1940年美国投资顾问法》(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二是《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前者主要是规范注册投资顾问(自然人)的行为,也就是投资顾问在为客户提供顾问服务活动中所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后者主要是规范投顾公司(法人)的组织结构、内部操作或具体投资行为。针对智能投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17年2月发布了专门性的指导意见,称为《智能投顾升级指导意见》(Investment Management's Guidance Updates),要求智能投顾在履行《1940年美国投资顾问法》(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规定的法律义务时,应牢记某些独特的考虑。这就要求智能投顾既要遵循投资顾问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受到《1940年美国投资顾问法》的实质和法定业务的约束,也需要遵循根据智能投顾特点所制定的某些更为特殊的规范。^[7]

我国智能投顾信息披露也需要遵循《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证券投资顾问服务信息披露的一般性要求。例如,《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向客户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应当告知客户的基本信息;第二十七条规定以软件工具、终端设备等为载体,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或者类似功能服务的应当向客户说明软件工具、终端设备的

功能,揭示软件工具、终端设备的固有缺陷和使用风险,说明软件工具、终端设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方法和局限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针对智能投顾特点对其信息披露规则进行细致化的设计。

(二)智能投顾信息披露的特殊性内容

1.算法说明的披露

智能投顾是AI时代在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一种重要产物,其能够实现优质投资顾问服务之核心在于算法。具体而言,智能投顾服务是通过算法在数据库大量噪音信息中快速且准确找到与客户基本信息相匹配的部分,利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等技术进行信息处理,然后基于各种内嵌的金融模型和相关假设予以分析,预测出符合用户预期的最优投资结果。^[8]算法的运作方式需要有很大的透明度,才能评估算法的政治、绩效、公平性和治理关系。^[9]在智能投顾中对算法的有效监管能够保障该行业的积极发展,但由于算法专业性很强,并涉及商业秘密等问题,对算法的披露争议较大。

美国《智能投顾升级指导意见》(Investment Management's Guidance Updates)规定的与算法相关的披露内容包括:管理客户账户所使用的算法的说明;算法功能的介绍(如通过算法能对客户个人账户进行投资和重新调整);算法的假设和限制(如该算法是基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说明背后的假设和该理论的局限性);对使用算法管理客户账户所固有的特定风险的描述(例如该算法可能不考虑市场条件而重新调整客户账户,或者进行比客户预期更频繁的调整以及算法可能无应对市场条件的长期变化);任何可能导致用于管理客户账户的智能投顾算法重写的状况描述(如智能投顾可能在紧张的市场状况下停止交易或采取其他临时性防御措施);关于第三方参与管理客户账户的算法的开发、管理或所有权的说明,包括对这种安排可能产生的任何冲突利益的解释(例如,如果第三方以打折的方式向智能投顾方提供算法,那么此算法同样可能会将客户引导到一种能使第三方获利的产品上)。总之,该指导意见要求披露的是对算法的说明而不是算法本身。

总体而言,披露算法说明的目的是使监管者能

够发现其中的问题，投资者明白可能会造成的投资损失。但是由于算法是智能投顾的核心，如果过多披露则会引发商业秘密泄露等问题。另外，由于专业性较强普通投资者很难读懂，因此算法披露必须考虑成本问题。据此建议以不同对象为划分标准，将算法的披露分为两份，一份“深度披露”以机密形式送交监管机构，另一份“浅显披露”通过公共途径向投资者公布，以自然语言或结构化流程图这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向投资者呈现。

2. 利益冲突的披露

在智能投顾产业中，存在着与传统投顾业务有所不同的利益冲突，其所提供的服务背后可能涉及多方主体。正因如此，应当让投资者了解到提供智能投顾服务背后的主体有哪些，并由自己选择是否接受这样的服务。首先，存在第三方利益介入的情况须明确披露。由于智能投顾需要专业技术支撑，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许多智能投顾平台可能都会选择将技术研发、算法设计外包给科技公司，因此应当披露第三方参与管理客户账户的算法的开发、管理或所有权的说明，包括对这种安排可能产生的任何冲突利益的解释（例如科技公司可能与第三方存在利益勾结）以及为避免这种冲突采取了什么样的隔离措施。例如，美国马塞诸塞州出台《智能投顾外包服务商监管政策声明》，要求智能投顾平台必须使客户了解到提供的投资咨询服务可以从外包的算法服务商来获得，必须披露外包的算法服务商的背景信息，必须详细披露每个算法服务商提供的服务的内容以及不能提供给客户的服务，必须向客户提示外包算法服务商可能限制客户可用的投资产品等。^[10]

此外，许多投入智能投顾的公司本身属于金融行业（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行业等），有自己的金融产品，例如招商摩羯智投、浦发财智机器人等资金池中有招商基金、浦发银行的理财产品，平安智能投顾资金池中有非标准化P2P产品，而平安集团旗下拥有互联网金融平台陆金所。^[11]在这种利益关联中，投资者无法知晓智能投顾在进行智能推荐时，是否存在主观性设置，将自家产品优先推荐给客户。为了发挥智能投顾“自动化”客观推荐投资组合的本质特性，有必要向投资者说明智能投顾平台的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以及可能存在的风

险，涉及到关联产品时应详细说明推荐理由，并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投资者注意。

3. 资产和费用的披露

客户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资产的增值，资金去向是客户重点关注的问题，智能投顾可以直接帮助客户打理投资资产，但是也需要向客户披露其资金的去向。在非全权委托模式下，应向客户披露其资金的具体投资分布，并由客户做出最终是否投资的决定。在全权委托模式下，投资空档期资金如何保管、是否使用应向客户明确说明。应当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根据智能投顾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及限制，对客户资产进行经营操作，将客户资产与公司资产分账分类管理，实行资产隔离。

在提供智能投顾服务前，还应当事先向投资者明确披露是否收取管理费、服务费等费用，如果收取必须明确费用比率和扣缴日期和办法。国外的智能投顾服务一般都会收取管理费，必须在其网站或应用程序上明确披露收费标准和费用明细。我国的智能投顾大多数没有明确管理费、服务费，但实质上多是通过基金组合销售的方式来推荐投资理财组合，而这其中会涉及基金销售费用，但平台很少会向投资者清晰呈现或明确提示这样的收费事项，有必要在费用披露中进行说明。再者，智能投顾是在线化的投资顾问服务，通常会与投资者的银行卡、移动支付工具等在线支付方式进行绑定，如果有代缴代扣费用的项目，也应当向投资者明确披露并获得投资者的授权。

4. 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披露

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有益于保护投资者的最佳选择。^[12]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要求金融中介机构将适当的产品提供给适当的投资者。^[13]智能投顾服务是在对客户进行画像的基础上进行的，画像越准确，推荐的投资组合产品会越适当。但是，画像准确意味着对客户了解越多，收集到的客户信息和相关数据也可能越多。在对客户进行画像的过程中，除了客户通过平台在线调查问卷等方式填写的信息外，也可能会使用到用户在其他平台的信息，例如广发“贝塔牛”的用户持仓诊断功能便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以用户画像系统为依托，汇总客

户在集团内各项资产账户,如期贷子公司账户、香港子公司账户、基金公司账户等,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客户的历史收益率、夏普比率、最大回撤等指标,然后根据客户的风险等级和投资偏好生成相应的智能投资计划,并以历史数据对该计划进行回测,从而对比分析客户的投资能力。^[14]这些信息的获取应当获得用户的授权,仅限于某一次的智能投顾活动,并且应向客户披露接触信息的主体、对保密义务的遵守、限制性要求等内容。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和数据的价值巨大,不排除智能投顾平台将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用于其他活动,尤其是与关联方共享等,或者通过客户的信息、数据谋取私利。通过披露的方式能够使得用户更好地监督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情况,督促接触信息人员自觉遵守保密义务。

5.服务内容的披露

智能投顾应考虑其提供的投资咨询服务的说明是否明确,并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以避免对这些服务的范围产生错误的含义或意义而导致可能会带给客户重大的误导。例如,智能顾问不能暗示机器人顾问正在提供全面的财务计划而事实上并未执行、税务亏损收获服务还能提供全面的税务咨询、在产生投资建议时会考虑除调查问卷收集的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15]需要明确向投资者说明服务的资金门槛、主要的投资工具、投资逻辑、投资的种类等,增强智能投顾服务的透明度。如发展较为成熟的智能投顾公司Wealthfront Advisers就在其网站上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披露,包括投资策略、投资风险、服务流程、绩效披露等内容。^[16]在美国金融监管局(FINRA)调研的面向零售客户的智能投顾工具中,绝大多数具备自动化账户再平衡(rebalancing)功能,智能投顾平台需向客户确认是否接受此类功能(是否接受全权委托),并明确披露自动再平衡工具的运作原理,包括触发条件等。^[17]

6.重大变化的披露

投资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活动,在投资前应当让投资者明确了解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这是传统投资顾问也需披露的重要内容。智能投顾是一种在线投资顾问,在全权委托模式下人力参与的程度更加微少,投资策略的调整和变动可能更频繁、更

快速,应当运用与之匹配的实时监测技术向客户推送投资策略的调整变动,使投资者随时了解投资状况,以有充足的空间做出投资决策和承受风险。美国《智能投顾升级指导意见》中要求,可能对投资组合产生重大影响的算法代码变更时应当向客户披露。算法是智能投顾的基础,因而算法代码变更影响到投资组合时也应及时向客户披露,以便客户能够及时做出决策调整。

调仓频率对于智能投顾投资组合的收益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智能投顾调整的仓位如果涉及股票型基金,按照智能投顾不提供基金销售费率折扣的做法,投资者将支付高达1.5%的申购费,但智能投顾服务方却能够获得更多的基金销售费,因此调仓频率将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收益,应当将调仓频率做出标准化的规范,明确披露调仓的条件,使得调仓制度更加透明化,防止智能投顾服务方通过滥用调仓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

此外,在以网络为支撑的智能投顾服务中,网络环境也可能发生动荡,如网站停更、系统维护、受黑客攻击等,在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或者市场情况的变化对投资会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向客户进行披露。总体而言,在发生的变化可能引起投资者资产发生异动或面临较大风险时应当向投资者做出披露。

7.合规审查的披露

智能投顾具有特殊的商业模式,其对算法的依赖、与客户的人机交互以及在互联网上提供咨询服务的有限性,都可能会产生或加重智能投顾的风险。为了保证投资业务的连续性,跟踪机器的深度学习,降低因技术原因、操作原因等带来的风险,智能投顾平台应当定期对硬软件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对投资策略、投资逻辑进行合规性检查,定期监测算法代码是否合规,有无算法偏见、算法黑箱等违法违规情况,以及智能投顾所进行的投资活动是否合规等。应当明确披露筛查监测的时间、程序、方式和监测人员等信息,向监管层进行报送。

(三)智能投顾信息披露的形式要求

如果投资者或用户无法理解智能投顾所披露的相关内容,那么做出再完善的披露规定也无济于事,只能局限于符合披露要求而无法真正达成披露意图,智能投顾平台若只是为了披露而披露将徒增

合规成本。因此,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披露,使投资者能够真正获得和了解披露的内容至关重要。如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强制用户阅读并了解信息披露内容就是一种方式。^[18]

美国《智能投顾升级指导意见》对于披露的形式做出了相应规定,要求注意披露是否具体明确,并尽到了合理谨慎义务,以避免对服务范围产生错误的含义或意义而导致对客户重大的误导。智能投顾平台应仔细考虑其书面设计是否为有效设计(不是隐晦或难以理解的)。具体而言,需考虑是否在客户注册之前已经向客户披露了关键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成为客户决定使用智能投顾做出投资决定的重要依据,以及这些关键信息是否被特别强调,例如通过弹窗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客户阅读披露内容,以及需注意是否有必要的细节补充,所呈现的内容和格式是否适用于移动平台等。

在无纸化和去人工化的模式下,信息披露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客户是否能够成功关注到所披露的信息和是否能够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设计智能投顾信息披露的形式时,必须从用户角度考虑信息的获取度。例如,在用户注册前,不能默认用户同意注册协议,使用智能投顾必须做调查问卷,并且尽可能丰富问卷的内容。在用户决定使用智能投顾前,可以通过弹窗形式、电子邮件、智能语音提示等方式向用户披露应当披露的内容。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智能客服的建设,实现实时支持,以提高向客户披露信息、解答问题的效率。

四、结语

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大大提高社会运作效率,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智能投顾在投资领域的运用亦是如此。相比于传统投资顾问,它具有更好满足投资者个性化需求、投资门槛低费用少、客观理性等优势,能够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使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实现更有效的投资收益。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弊,智能投顾的出现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风险,而监管机构的目的是应当尽可能使智能投顾的利大于弊,而不是一味去抑制新生事物的发展,否则容易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而信息

披露制度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监管工具,如果智能投顾的信息披露工作是有效的,智能投顾其他方面的漏洞就会更小。在一个有效的信息披露环境下,智能投顾平台能够更加自觉运营,投资者能够更加理性选择,那么就可以更放心地让市场进行自我管理。只有投资者拥有更加广泛的投资选择空间和更安全有效的投资环境时,才是真正实现智能投顾为人们所带来的便利。

注释

- ①目前布局智能投顾的主要有三类机构。第一类是国内金融IT公司以及创业公司,如理财魔方、盈米财富、蛋卷基金(投资于国内公募基金),弥财(主投海外ETF);第二类是互联网金融公司或大型财富公司,如京东金融“智投”;第三类是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智能投顾服务,如招商银行摩羯智投、广发证券贝塔牛、工银AI投。<http://fund.jrj.com.cn/2017/12/04152523737337.shtml>
- ②各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了智能投顾服务:包括招商银行的摩羯智投、浦发银行财智机器人、兴业银行兴业智投、平安银行智能投顾、江苏银行阿尔法智投、广发智投、工商银行“AI投”等。金融科技行业也积极投入智能投顾行业,出现了京东智投、理财魔方、宜信投米RA等智能投顾产品。
- ③实践中,在某些智能投顾平台上甚至可选择跳过风险测试并默认投资者风险等级为5。

参考文献

- [1]吴焯,叶林.“智能投顾”的本质及规制路径[J],法学杂志,2018(5):16-18.
- [2]王从宁,李宁.法学视角下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若干问题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9:3.
- [3]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课题组.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案例研究与评估年度报告(2014年度)[J].金融服务法评论,2015(7):258.
- [4]邢会强.金融法上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反思[J].证券市场导报,2018(3):64-72.
- [5]金博.基于信息披露的市场效率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8.

- [6]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EB/OL] (2010-10-12) https://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oo306201/201010/t20101019_185679.htm.
- [7] Se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Guidance update: Robo- Advisers, SEC website, <https://www.sec.gov/investment/im-guidance-2017-02.pdf>.
- [8] 李文莉, 杨玥捷. 智能投顾的法律风险及监管建议[J]. 法学, 2017(8):21.
- [9] Brauneis R, Goodman E P.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for the Smart Cit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8.
- [10] 郭雳, 赵继尧. 智能投顾发展的法律挑战及其应对[J]. 证券市场导报, 2018(6):75.
- [11] 姚崇慧. 两方面起底智能投顾潜在的合规风险. <https://www.iyiou.com/p/74158>,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0-5.
- [12] 郭锋. 新一轮证券法修订的理念与若干基本性制度研究[J]. 证券法律评论, 2017(15):1-18.
- [13] 李东方, 冯睿.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经济和法律分析[J]. 财经法学, 2018(4):18.
- [14] 广发证券“贝塔牛”智能投顾技术解构. <http://mt.sohu.com/20170109/n478160324.s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0-5.
- [15] 李燕. 数字化投顾在中国: 兴起、发展阻碍与规制探讨. http://www.sohu.com/a/225078898_467315,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0-5.
- [16] 智能投顾公司Wealthfront网站信息披露内容, <https://www.wealthfront.com/legal/disclosure>,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0-5.
- [17] 巴洁如. 智能投顾面临的法律合规问题及国际监管经验[OL]. http://www.sohu.com/a/158381216_455313, 最后访问时间: 2018-10-5.
- [18] Nicole G. Iannarone, Computer as Confidant: 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 and the Fiduciary Standard[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Robo-Advis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Xing Huiqiang Yin Danni

Abstract: Robo-Advisor requires the disclosur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Robo-Advisor is developed from traditional investment consultant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should meet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consulting industry on one hand, and should also match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Robo-Advisor on the other h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Robo-Advisor includes disclosure of algorithm description, disclosur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 of assets and expenses, and disclosure of collec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service content, disclosure of major changes as well as disclosure of compliance review, etc..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Advis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lgorithm Regulation

数字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与国际贸易的法律治理

李娜 沈四宝

摘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国际市场的深刻变革, 贸易竞争从传统商品价格与质量等条件的竞争转向数据流动等规则的竞争。面对数字化时代贸易行为与贸易主体的变化, 国际贸易法律制度也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本文分析了数字化时代贸易的核心特征, 面对以数据作为交易对象、数据跨境流动作为交易过程的新型贸易关系, 欧盟与美国采取了不同的规制路径, 积极推动本国目标的实现。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实现公民个人信息权、国家安全保护等施政的目标, 纷纷采取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 这些措施在本质上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平衡贸易自由利益与合理政策目标利益为中心, 通过共商、共建的谈判方法, 协调国内合理政策目标与贸易自由关系的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 提出在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理论依据和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 数字贸易; 跨境数据流动; 贸易法律治理

中图分类号: DF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90-07

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会推动国际市场发生深刻的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的“电气时代”, 联通了陆陆、水陆, 形成了世界市场, 扩大了贸易的地理范围, 产生调整运输关系等国际法律规则, 推动国际治理的深入化, 国家成为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体之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的“信息化时代”, 交易的网络化、电子化, 加深了国家之间的联系, 信息产品成为交易对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推动传统数字化产品消费变为产品的数字化消费, 如2016年远距离服务的交易金额已达到2488美元; 2018年统计显示, 一些从事跨境数字贸易企业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不少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 以《世界贸易的未来: 数字是如何改变全球商务》^[1]为题, 再次显示出这场数字技术的革命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根本转

变, 首次提出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的规则成为数字贸易比较优势的观点。数字贸易依赖于传统贸易方式, 但又具有与传统贸易不同的特点, 即数字化的订单、数字化平台、数字化的交付等。^[2]这场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改变了贸易行为与贸易主体, 法律制度也需要做出回应。

一、数字化时代贸易的核心特征

前数字化时代是通过电子化的手段提高交易过程的效率, 在国际市场中, 各国生产的产品相互竞争, 生产、分配、销售各交易环节没有连接在一起, 网络与数据成为实现贸易便捷化的工具, 1990年国际商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承认了电子数据交换(EDI)作为交易凭证的法律效力。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 企业根据本企业顾客的需求及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交易安全视阈下大数据交易监管法律研究”, 项目编号: 18XFX015; 中央高校基金“丝绸之路法律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017GKY001。

作者简介: 李娜, 女, 陕西西安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沈四宝, 男, 上海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法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企业自身特点,通过万维网或者物联网平台向消费者提供开发的产品、服务,产品的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并联,从而改变市场、消费者、生产者的关系,政府也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推动智能化治理。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新的经济模式,其核心要素是数据的交换。^[3]

(一) 数字化时代贸易的核心要素是数据

目前国际社会没有普遍接受的“数字经济”定义,Bukht和Heeks在2017年将数字经济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定义是指以《电信基础协定》生产的部门和各种数字服务、平台经济服务。^[4]广义的定义包括各种数据技术使用,如电子商务、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分享经济和在线劳动平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将数字贸易定义为建立在数据流动基础上的贸易^[5],区分数字贸易的标准是订单是不是购买数据,是否购买信息以及参与交易的主体是谁。但这种分类方法是不能完全厘清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区别。数字贸易应该是以平台为基础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态体系,包括传播和持续措施的结合,数据的搜集和数据的流动以及连接使用者的设施,缺一不可,而核心要素就是数据。

数据是以电子化方式存贮的资料,数据获取、分析的基础是数据类型,通常分为名义分类数据、顺序分类数据、等距数据、比率数据,名义数据是带有个性特征的数字化资料,其他类型的数据是用统计等分析工具获取的加工数据。笔者更倾向于Aaronson对数据的分类,即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商业机密数据、机器间传输数据、大数据。^[6]这些数据并非都能用于国际贸易,最早纳入法律调整范畴的数据是商业数据,各国通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由于商业数据不能公开,所以法律通常禁止商业机密数据的市场交易。1988年澳大利亚的《隐私法案》将个人数据作为隐私权保护范围,欧盟将个人数据与隐私权保护分离开来,现行法律认为规定个人数据是指与可识别或已识别自然人有关的信息;可识别自然人是可以被直接或者间接的识别,特别是参考识别的特征如姓名、类别化数字、地点数据,在线的身份或者一个或者更多与物理、生理、基因、心理、经济、文化或者社会身份有关的特征。由于大数据是对相关既存数据的分析,实际是将大数据纳入到个人数据和隐私权保护的范畴

中。政府数据有公开数据与机密数据,通过一国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机关的义务以保证其公开性,贸易领域中要求政府遵循透明度原则,公开涉及具体贸易措施的文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定的可流动的数据仅限于个人信息和政府公开文件。

(二) 数据化时代贸易的过程是数据的跨境流动

数据跨境流动与贸易联接首先是因为贸易的电子化,即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跨境的交易,产生了数据的跨境流动。OECD在1980年发布的《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南》中首次提出“跨境数据流动”的概念,其所指仅仅为个人数据。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将跨境数据流动定义为“可被计算机等互联网设备识别的数据跨越国境进行读取、处理、存储等活动”^[7]。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跨境数据处理是个人数据的处理、获取行为发生在一个以上成员国的控制者或者处理者之间,或者发生欧盟的一个控制者或者处理者的单一获取行为但该行为实质性的影响或者可能实质性影响一个以上成员国的数据主体。笔者认为由于数据的无形性,传统地理上的国家领土边界,即关境、国籍等不能作为跨境的标志。跨境的数据流动应以数据行为发生地为判断标志,即数据提供者、数据处理者、数据的控制者间的交易行为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境内。

二、国际贸易规则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现状

在数字化交易时期,国际社会更关注交易的安全,但当数据本身能够成为交易对象时,网络的无国界和数据的滥用行为使政府和民众产生了恐慌的心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家通过制定本国法律平衡个人权利保护和技术、商业数据跨境流动需求,通过设立超越国境的规则,即划定法律上的“跨境边界”,控制网络主权范围,保护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由于国内法的域外管辖适用产生了保护权利的冲突,所以欧美等国家都积极地通过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等形式,协调国内政策制定者的立法空间。^[8]这些规则区别于一国制定的单向限制本国数据传输至境外的法律法规,而是指为了保护数据安全和确保合理的数据流动,在国际层面达成的

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范和标准。^[9]

(一) 欧盟主导的跨境数据权保护与贸易协定

欧盟在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与安全问题上, 采取了两元路线和双重待遇标准。在欧盟内部, 主要通过制定欧盟内部统一的法律, 将个人数据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实现欧盟内部的数据自由流动,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1995年通过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95 /46 /EC号指令》, 2018年5月正式产生法律效力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10]取代《数据保护指令》, 作为协调欧盟各成员国隐私权保护, 延续了对欧盟委员会认定具有“充分保护”的国家和区域进行跨境数据传输的一般规则, 并且制定了行政处罚的措施。欧盟有对个人信息权严格保护的立法传统, 在欧盟国家内部数据的跨境流动以自由为原则。在向境外第三国转让数据时, 数据控制者、数据处理者必须得到个人数据主体的同意, 同时要求处理者和控制者之间就责任分配的问题进行协商, 并且写入合同之中。

但对外时, 一方面通过欧盟内部的规则产生的域外效力, 影响数据交易的各类私人主体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欧盟与外部国家的经济合作谈判推动内部规则的外部化。针对由欧盟国家传输至非欧盟国家的数据行为, 第一, 通过其内部规则要求跨境数据的处理者、控制者所在的国家必须得到欧盟公共机构的评估与认证。第二, 欧盟与少数国家签定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包含数字贸易的内容, 如欧盟与印度尼西亚在2018年签定的协定涉及到跨境数据流动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条款, 规定跨境数据流动中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 明确提出禁止跨境数据流动的保护性壁垒, 要严格遵守欧盟的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则, 承认数据权是欧盟基本权利之一且不具有协商性; 取消影响数据流动的四类本地化措施, 禁止要求在成员国境内使用的计算设施进行强制性认证; 数据的强制性本地化措施; 禁止在另一成员国地域内存贮和处理数据; 其他依靠计算设施完成跨境数据传输的限制。

(二) 以美国主导的商业信息自由流动贸易协定

美国认为信息是对数据的处理而获得的资料,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数据, 主张信息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 但要求数据控制者确保数据安全。美国最先

在双边贸易协定中规定对数字产品免征关税的条款。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第一个在电子商务章节中专门规定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保障和例外条款的多边贸易协定^[11], 这在贸易协定中纳入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定提供了参考的范本。

在美国退出上述谈判之后, 又将其观点融入到新的协定中, 2018年10月30日达成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第19章中用了18个条款规定了“数字贸易”的专题, 包括算法、投资、计算设施、数字产品的定义, 把信息分为政府信息、个人信息, 信息内容的提供者、交互式信息提供者、主动商业信息提供者等。第一, 数字贸易分为数字产品的贸易, 规定了数字产品是计算机程序、文本、影视、图像、录音或者其他通过数字编制、为商业销售或者分销, 能够以电子形式传输, 要求提供给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 第二, 保护在线消费者的权利和个人信息, 承认在线消费者免受欺诈和欺骗性的商业行为的权利和各国采取国内法保护措施; 第三, 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 肯定了保护个人信息对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 要求各成员提高本国国内的立法水平, 尽可能地与国际机构的规定保持一致。包括限制收集、选择权、数据质量、意图特定化、使用限制、安全保障、透明度、个人参与和责任, 提供给数据使用者非歧视性待遇; 第四, 承认APEC的自愿保护体系, 要求各成员国应该纳入本国的立法中, 符合隐私保护标准的企业, 被授权在亚太组织成员国之间进行自由数据传输; 第五, 禁止采取限制或者禁止跨境信息流动自由的措施, 禁止本地化计算设施的要求。为了公共政策而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GATT第20条的规定, 不能构成任意或武断地歧视, 且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第六, 通过禁止采取限制进入和使用网络, 消费者选择服务和应用必须有安全管理措施、不能损害网络安全、可以获得措施的信息。

欧盟确立自身的个人隐私、数据权利保护标准, 并积极推动欧盟法律的域外适用, 政府通过公权力介入数据的保护, 要求数据从个人转移给处理者进行流通环节之前必须满足一定条件。美国则以交易客体为划分依据, 建立消费者个人信息与商务经营者之间平等的跨境环境, 在保障消费者权利的

同时, 经营者也有救济的权利; 在肯定国内法效力的同时, 要求制定统一的标准, 通过企业自愿认证的方式加以实施。虽然欧美采取的路径不同, 但也有共同点, 即认为本地化的数据规则可能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越来越重视权衡国家数据主权、信息安全以及信息流动自由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保障国内公共数据的平衡。

三、数字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贸易法律治理挑战

根据比较贸易理论, 促进数据的跨境流动,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在理想贸易模型之下, 什么是各国贸易的优势? 各国如何获取比较优势? 制定怎样的规则才能保证公平的竞争市场? 传统国际贸易法律治理的路径, 是通过取消或者限制贸易各国采取阻碍贸易自由流动的措施, 让资源在国际市场中进行合理的配置, 从而接近理想的模型状态。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给予货物、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所有者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这样在货物贸易中, 取消或者降低关税, 禁止数量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 在服务贸易中, 逐步取消市场准入限制和给予国民待遇; 在技术贸易中, 要求各成员国给予最低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 等等。那么, 跨境数据流动是否存在这些措施? 实现数据的跨境流动是否能够带来福利目标的实现? 这些都对现存国际贸易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

(一) 贸易自由化与安全目标的实现

自由贸易是当今区域经济组织和WTO共同推进的目标。自由贸易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各国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取消、削减关税壁垒, 减少对国际贸易的限制性影响。^[12]在自由贸易环境下, 国家仍然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利益涉及到资源等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安全利益。WTO协定既保证公平贸易环境, 同时又将安全例外作为成员方行使义务的豁免。虽然各成员方没有对什么是安全划定明确的界线, 但经过分析应该包括经济安全(保障措施、国家收支平衡)、公共道德等。在数字化背景下保障安全成为贸易的首要价值追求, 因为网络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病毒通过网络扩散到各个地

方, 影响着网络使用者的安全; 大数据技术发展, 数据实现了大规模集中收集、存储和分析, 跨境传输的数据不单局限于个人数据, 企业、社会团体、政府数据的大规模传输成为可能。维护数字贸易环境下的网络安全、数字交易安全, 既是国家主权的的要求, 也是保障数字贸易主体权利实现的要求。追求安全价值不是单一国家的任务, 而是各国共同的任务。

(二) 自由贸易与数据本地化措施

近年来, 用户信息大规模泄露事件在全球频繁发生, 特别是“斯诺登事件”之后, 目前, 已有超过60个国家陆续以合理公共政策目标为由出台数据本地化^[13]的要求。数据本地化措施包括要求数据必须在当地存贮、数据处理主体的当地成分化要求、禁止某类数据出口等。这些措施在结果上限制了数据的自由出口, 但是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因为阻碍贸易的自由流动。Anupam Chander 和Uyen P. Le在2014年发表一份《数据本地化和全球网络》^[14]的报告, 研究16个国家的数据本地化措施目的, 结果证实这些国家的目的多数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侵害个人数据和隐私权或者侵害国家的公共安全, 也有防止某些国家对海外数据和信息进行监控而损害他国的安全。采取措施的国家希望将数据控制在本国地域范围内, 通过行使司法主权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实施必要的刑事或行政性惩罚。

当然这些数据本地化措施确实是阻碍了数据的自由流动, 但是否真正能达到对个人信息和国家安全保护的效用存疑。^[15]有学者认为,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 只要服务器接入互联网, 存储地点并不能影响数据的安全水平, 数据安全实际上并不取决于数据的存储地点, 而是数据存储和传输的方式。^[16]因此, 要求数据本地化措施并不合理, 而应以保障数据安全为目标, 对数据处理者、控制者施加保障安全传输的义务。这也是欧盟所采取的措施, 即评价一个国家、企业是否能够达到提供保证数据处理、控制的安全标准。这种措施虽然没有直接限制数据的出口, 但也有其不合理性, 因为企业在提供商业服务时往往涉及大量、多次的数据跨境流动, 这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合规成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的域外传输。

四、调整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贸易法律治理的建议

伴随着新技术发展,从传统的机械时代到现代的网络智能时代,跨境数据流动事实上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加注了新的动力。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自由、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流动,它强调的是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数字贸易治理的根本原则是缩小技术鸿沟,先进的国家与后进国家应该不冲突,不对抗,双方管控分歧,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以此为核心原则形成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12月欧盟与日本签定的《经济合作协定》是欧盟与受美国规则影响的两大体系间的首次对话与合作。该协定使用了11个条款为数字贸易制定了框架性的规则,明确了数据跨境流动谈判将在未来三年内完成。我国在世界达沃斯论坛表明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电子商务的谈判,支持数字贸易的多边合作框架,通过共商、共建达成符合数字经济生态环境需求的数据跨境流动贸易规则。

(一) 建立贸易环境中的安全原则

对话与协商是网络环境下国际规则制定的方式与程序。促进网络使用者对网络空间的信赖,维护诚信的贸易环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以欧盟与日本经济合作协定为例,数据跨境流动的贸易环境是各方认为欺诈性的合同或者行为、侵犯个人数据和隐私权是法律或者规则所禁止的。

数字贸易中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体现了国家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认识,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贸易战略、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应以一种动态的、多元的国家利益观为指导。因此出于安全考量对一些政府、公共数据跨境流动进行合理限制是符合自由贸易的发展目标的。目前讨论以WTO法律框架规制一国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措施的国际法限度停留在理论层面,迄今为止没有一例通过适用GATS条款解决成员国限制数据跨境政策引发争议的案例。即使是在理论上的适用探讨中,也遇到了许多规制空白和解释困境。美国将金融数据服务排除在外,而欧盟也将WTO裁决的赌博、广播等涉及在线的服务也排除在了数字贸易之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在现有

WTO附件规则之外就数字贸易再行协商。数据跨境流动不依赖有形货物的交易,也不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但电子商务的在线交易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服务贸易的范围之外,因此由WTO主导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是必要的。

(二) 通过包容性制度提升各国数字贸易的准入能力

数字贸易必须通过网络设施和平台完成。技术发展水平在国家间的差异性,一些落后国家没有能力分享数字贸易带来的全球福利增长,差距不断地扩大。网络基础设施的垄断性和高额的建设花费,使这些国家负担成本,此外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政府在引进技术时非常慎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打破网络基础设施供给的壁垒,允许多元主体参与市场的竞争,保障政府的选择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顾虑。WTO虽然达成了《基础电信协定》作为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附件,对电信产品关税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禁止或者限制关税措施是不能提高落后国家的参与度。因此,通过谈判,应该减少网络基础设施的准入壁垒,促进数字贸易的便利化。

(三) 通过谈判确定跨境数据流动的协调路径

跨境数据流动不是单纯的国内法问题,也不仅是私法的问题。对于兼具有公法和私法特性的法律关系的国际协调,可以选择制定统一的实体法律制度(国际条约)或者制定统一的冲突规范(国际私法规则)。传统国际法理论具有公法性质的措施原则上只能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那么在另一国获得承认的前提也是不能与本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对于数据的保护,越来越倾向于纳入公法控制的范畴,这种公私兼有的领域是其他类型权利的保护所没有的。

在利益错综复杂的数字贸易领域,制定统一的实体法律制度,约束或者统一各国政府对该领域的干预标准,必须在实质问题上取得一致共识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WTO成员方在2012年开始尝试在WTO协定之外达成一份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补充协议,讨论数据跨境流动问题。谈判各方在数据保护的政策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欧盟要求遵循WTO的基本义务并承认国内法措施的合法性;美国不认为WTO现行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数据贸易,各成员方应该保障商业信息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取消数据

本地化措施;日本主张自由流动仅限于数字编码信息;我国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保障各国的平等参与权,促进贸易的便利化。这些分歧使统一实体规则的谈判停滞。

在2018年欧盟与日本签定的《经济合作协定》中,我们看到主要国家和地区观点的妥协,为未来实体规则承诺的达成奠定基础。具体表现在:第一,根本原则的一致性;无论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认可数字贸易的根本是增加消费者对于网络环境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增强消费者的信心是发展的基础。第二,目标实现有赖于各国的合作;在现行国际贸易法律规则中,只有涉及到数字贸易内容的协定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数据的流动涉及到一国的公共秩序,由于“公共道德”与“公共秩序”本身属于模糊性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它也是变动性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对“公共道德、秩序”的界定存在差异,如WTO虽然允许各成员方引用例外条款,但在援引例外条款时无论在条文解释上还是举证责任上都面临相当的困难。因此,各成员方之间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

(四)通过设置跨境数据流动的例外条款作为安全阀

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的前提是,保障数字贸易各方主体权利的实现。因为一国实施本地化措施具有合理性,如果完全要求国家禁止使用,以经济利益的获取换取一国国家安全是不对等的。所以,各国应该承认本地化措施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国际合作逐步取消直接限制或者将直接限制转为间接限制,由国家直接保持权利转向由国家与市场主体共同承担责任。

例外条款是多边贸易协定项下的重要规定,承担着“安全阀”的作用。一般来说,WTO以促进自由贸易,最小化对贸易的限制为规制目标,各国必须遵守具体承诺。在特殊情况下,当遵守承诺构成对国家利益、人权、环境保护等的威胁时,例外条款即被触发,成为豁免一国贸易限制措施的依据。例外条款作为贸易价值和非贸易价值的平衡手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政府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做出承诺的基础上,赋予政府权力,在需要保护其他位阶相同或较高的法益时得以触发例外条款,允许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只要该限制措施不构成对贸易的变相限制。例外条款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区

分贸易保护主义和合理保护政策,划清合法保护与非法保护的界限。因此,在适用中如何界定“合理公共政策目标”、如何论证该限制措施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所“必要的”、如何判断是否满足序言“非歧视性”是三个关键点。对于“合理公共政策目标”的解释主体与解释方法,可以采取有限制的单边主义解释方法,即:由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国家来定义何为合法公共目标政策,以及该目标政策存在于该国,亦由被诉国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是为了实现该公共目标政策。判断限制措施是否构成“歧视性”,主要关注政府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对数据跨境传输限制措施的。如果一项数据跨境传输的限制措施是针对特定国家,或是对于不同国家适用不同的标准,或是为本地企业提供豁免的,都应当被认定为“歧视性”。

总的看来,国际社会认识到规范各国数据跨境管理行为的重要性,所推行的区域性规则和贸易协定推动了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数据流动自由和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政策利益的关系,但在规则的实际运行层面存在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行国际协商,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营造更加公平、公正、诚信的数字贸易环境,为缩小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充分参与国际合作,提升我国网络和数字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8, [EB/OL]. [2019-1-1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tr18_e.htm.
- [2]UN Statistical Commission, [EB/OL]. [2018-9-18]. E/CN.3/2018/17
- [3]Dan Ciuriak, Digital Trade: Is Data Treaty-Ready?, [EB/OL]. [2018-10-12]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digital-trade-data-treaty-ready>
- [4]Rumana Bukht, Richard Heeks,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Digital Economy, [EB/OL]. [2018-12-10] http://hummedia.manchester.ac.uk/institutes/gdi/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di/di_wp68.pdf

- [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OECD Glossary of Statistical Terms, [EB/OL]. [2018-5-12].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
- [6] Susan Ariel Aaronson.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Discuss Digital Protectionism? [J] Working Paper for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 2017(7).
- [7] United National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UNCTC).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nsborder Data Flows: A Technical Paper [EB/OL]. [2019-1-10]. <http://unctc.unctad.org/data/e82iia4a>. 1982.
- [8] Mira Burri. The Governance of Data and Data Flows in Trade Agreements: The Pitfalls of Legal Adaptation [J]. U.C. Davis Law Review, 2017(51):65.
- [9] 黄宁, 李杨. “三难选择”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演进与成因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172-182.
- [10]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EB/OL]. [2018-11-5]. <https://gdpr-info.eu/>.
- [11] 尹秀.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则体系: 趋势与启示 [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7(5): 29-36.
- [12] 高伟凯. 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评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2): 1-6, 60.
- [13] Matthias Bauer, Martina F. Ferracane, Erik van der Marel, Trac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Regulations on the Free Flow of Data and Data Localization,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aper Series, [EB/OL]. [2018-9-10]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tracing-economic-impact-of-regulations-free-flow-of-data-and-data-localization>.
- [14] Anupam Chander, Uyhen P. Le. Breaking the Web: Data Localization vs. The Global Internet. [EB/OL]. [2018-11-15] <http://ssrn.com/abstract=24078>.
- [15] 黄宁. 数据本地化的影响与政策动因研究 [J]. 中国科技论坛, 2017(9): 161-168.
- [16] 洪延青. 在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中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框架 [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7(2): 36-62.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Leg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gital Age

Li Na Shen Siba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rade competi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competition of traditional commodity prices and quality conditions to the competition of rules such as data flow. Facing the change of trade behavior and trade subje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legal system also needs to make the necessary response. This paper uses norm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new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data as the object of transaction and data cross-border flow as the trading proces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dopted different regulatory paths 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own goals. At present, gover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adopted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cross-border movement of data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vernance goals of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otection. These measures have a greater restrictiv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e need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free trade with the interests of legitimate policy objectives and harmonize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overning the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in relation to legitimate domestic policy objectives and trade freedom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joint effor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uggestions to regulate the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Cross-border Data Flow; Trade Legal Governance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及实现

杜人淮 申 月

摘 要: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军民融合发展最重要领域,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内在要求。本文在阐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内涵和特征基础上,从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两个方面,分别揭示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和提出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实现模式,重点探讨了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三种主要模式。

关键词: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动力;模式

中图分类号: F426.48, E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97-09

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不仅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1],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和逐步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发挥军民产业集群发展的集聚规模效应、学习互动效应、协作创新效应、资源共享效应、竞争优势效应,促进军民产业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协调互动、强强叠加,推动区域内军民产业资金、技术、物质、人才及信息等要素的相互交换、流动与共享,带动区域内配套产业发展、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提高经济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和系统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产业集群理

论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中的运用和发展。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不同于一般产业集群化发展,也不同于国防工业集群化发展,其内涵和特征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内涵

1.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界定

产业集群是指某一产业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实现地域上的集中,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横向、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网络。“集群化”的概念与“现代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等概念的用法相似,是一个“使……成为……”的过程^[2]。因而,产业集群化可以看成是某一产业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某一区域不断提高集中程度,构建上中下游产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横向、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网络,从而推动创新发展、提高竞争能力、拉动区域发展的过程。

结合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化等概念的界定,可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定义为:国防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防工业发展的军民融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BJY07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7WTA014。

作者简介: 杜人淮,男,江西新建人,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军民融合发展;申月,女,江苏泰州人,解放军某部,研究方向为国防经济理论与实践。

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就是发挥集群在构建创新网络、社会网络、组织网络等方面功能,将相互关联的军工和民用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军地研究机构、大学、服务机构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地域上的集中,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构建以军民两用技术为核心,以军民结合产业为主导,上中下游产业链完整,支撑机构健全的产业网络,从而促进国防和民用工业的协调发展,实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跨越式发展的模式。简而言之,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就是将具有关联性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及机构进行空间集聚,推动集群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合作和竞争,改变国防工业发展“军民分割”的现状,形成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和军工与民用产业发展相互兼容、开放共享和协调互动的发展模式。

2.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特征

(1) 产业特征。从产业特征来看,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主要属于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武器装备制造业。^[3]我国国防工业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兵器、核、船舶、电子六大行业。从行业特征来看,这六大行业均属于先进装备制造业,因此,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具有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条长、关联性产业多、技术含量和要求高、配套服务要求高等特征。

(2) 地域特征。集群化发展的地域根植性是在地域经济发展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自发或者通过政府引导形成的。与一般集群化发展不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大量的军工企业和国防资源,关乎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因此,从地域布局看,国防工业的区位布局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区位布局具有重大影响,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对国防工业区位发展依赖性较强。同时,与一般中小企业集群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往往集中在一个城市不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涉及上下游企业多、配套

单位多、产业规模大、技术工业复杂。因此,在集群化发展中往往涉及某个特定军工产业区域,如我国船舶工业产业集群就主要包括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多个区域。

(3) 结构特征。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具有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等特点,因此集群化发展结构属于轮轴式产业集群(也称中心—卫星式产业集群)。集群由少数核心大型企业(军工企业或民参军企业)、众多中小型企业及机构围绕核心企业形成配套生产的格局。集群内部的大型核心企业是集群内部的系统集成主体,负责系统研发、系统集成、总装试验等,这些企业是影响集群规则、竞争优势和影响力的主要因素。配套产业对核心企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依附性,与核心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和层次关系。

(二)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系统

按照系统科学原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内部各主体互动发展,形成了集群发展中的核心主导系统和辅助促进系统,共同组成了国防工业产业集群系统。系统内各类组成元素构成了各级分系统,分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协作,从而形成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系统整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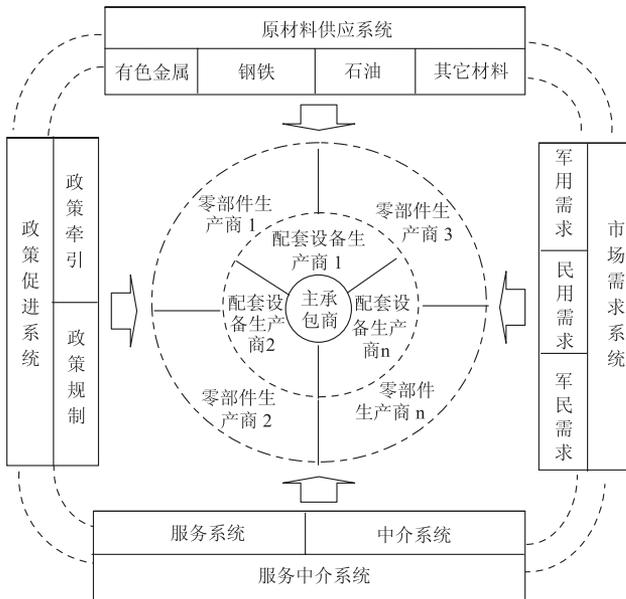
1. 核心主导(生产制造)系统

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的上下游企业、配套生产体系数量较多,关联性的军、民企业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网络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参与产业创新和创新增值最直接的部门^[4],是集群的主体和核心部分。

集群内各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上形成特定的合作竞争关系,各企业在集群内部所承担的生产、科研任务分工也有所不同。在产品总体设计、核心设备研制、核心机械组装、大型技术创新等环节,主要由具有强大集成能力和研发能力的重点企业承担,这其中武器装备等国防产品必须是由大型军工企业负责研发和组装。民用企业、尤其是部分民用高科技产业,在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较弱,但在资金、管理、特定技术、运行模式等方面存在发展优势,主要参与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中间加工环节和产业链下游的产品分包和销售,发挥相关

的技术和生产配套功能。

图1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系统结构



2. 辅助促进系统

根据内部结构，除了核心系统，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还存在辅助促进系统，这一系统可以细分为原料供应系统、市场需求系统、政策促进系统、服务中介系统四个子系统，其中包括科研院所、教育机构、政府和各中介、服务机构等。

军工和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是实现军民技术相互渗透、转化和交融的重要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利用军、地两方的技术资源，实现技术转化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通过培训和教育机制促进技术的扩散、交流和价值实现、提供等技术和人才服务。它们的存在对提高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是决定集群系统创新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政府部门不直接参加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集群内的生产创新活动，但在营造外围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协调多方资源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涉及到军、地双方企业、机构、组织等多方面利益关系，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对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氛围，协调军、民各方的利益，促进军、地双方的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支撑性机构是集群化发展的润滑剂，它们在军、民各资源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促进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技术转移、资源流通，主要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企业之间的创新、生产需求，促进企业活动更好开展。相关支撑性机构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机构，会计、律师等中介机构，金融、信息、技术转移等服务机构。

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动力机制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首先离不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的实现，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的实现，既需要遵循集群形成的一般规律，又需要相关因素的驱动，包括内在动力和外部助推。

(一)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内在驱动力

1. 基于空间集聚优势

影响产业集聚最基本因素是：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马歇尔的外在性。之所以将它们称为基本因素，是因为产业集群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距离的缩短和空间范围的集中。韦伯（1909）^[5]提出的空间区位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认为产业的空间布局首先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1）地价与地租；（2）厂房机器设备与其他固定资产成本；（3）原材料、动力和燃料成本；（4）劳动力成本；（5）运输成本；（6）利率；（7）固定资产折旧率。经过层层剖析，韦伯将这七个方面区域因素进一步概括为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两类。韦伯还提出产业集聚受到地域生产密度的影响。生产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日生产量，主要受生产单位的自然距离和生产量影响。如果某一特定点区域因素（尤其是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或者交易成本比其它地区低，则企业就会在这一地区实现集聚。一个地域生产量的增加将有助于生产的集聚，从而形成集聚“规模”。马歇尔（1920）从外部经济角度，认为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具有三大优势，能够形成专业化的供应商和服务队伍，能够培育具有共享性的劳动力市场，有助

于非正式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因此,空间的集聚效应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防工业具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高度精密性、战略保障性的特征^[6],该行业的发展不仅与石油、有色金属、钢铁等上游产业有密切联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配送、维修等下游企业的影响,任务技术复杂程度高,涉及环节多,运输、交易成本高,生产协调的难度大。例如船舶制造产业,不仅需要由大型核心造船企业、中小型船舶制造企业、船舶配套企业等组成的船舶制造和船舶配套生产中心,前向产业链中涉及大量原材料、新材料、高精度机械加工等企业,后向产业链中涉及大量物流、维修保障、分销等辅助性企业。距离的缩短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对于集群发展具有重要激励作用。

同时,对于参与军民融合科研、生产的企业(机构)而言,尤其是通用性较强的企业,需要面对两个市场,来自两个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将通用性较强的生产系统、配套零部件交给更多中小企业进行协作生产,自身专注于核心系统或者优势产品的研发生产,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发展效益。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集聚在大企业和众多科研机构周围能够在信息、技术、资金方面也能够获得规模效应。集群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助于形成中小企业相互配合的企业规模结构,进而获得规模效应。

2.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

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这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和知识传播方式越来越便捷,速度越来越快,但知识的传播具有地域局限性,总有一部分人或地区在一类信息的掌握上具有优先性。William.J.Coffey & Richard.G.Shearmur (2001)、Audretsch & Feldman (1996)研究发现,现代通讯工具不断发展能够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但是,因地理集聚而产生的信息、知识共享等发展优势仍然不可替代^[7]。有关空间距离与技术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凯尔论证了知识传播的效用会随着传播主体间距离的增大

而减弱。^[8]技术和知识传播的成本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加,因此,地理位置的集中是提高技术传播速度和效益的重要手段。同时,知识包括可编码知识和不可编码知识两类。^[9]可编码知识是指容易编码,具有单独含义,能够解释的一类知识;不可编码知识是指含糊的,不容易编码,往往需要通过偶然的方式认知。大部分技术属于不易于编码,无法通过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可视信息等正式的信息渠道传播,需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长时间的接触才能实现共享,知识技术的传播与一定的地区和社会环境分不开,因此,集聚发展是提高传播效率的重要选择。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是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目前科技发展进入了活跃的“大科学”时代,科技的协同创新,尤其是军民技术的协同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柱。冷战以来,美国实施了“两用科学技术计划”“NASA技术利用计划”等,俄罗斯颁布了《俄联邦2007—2010及2015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等,大力推动军民技术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发展。我国国防工业长期自我封闭发展,民用产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壁垒较高,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军工科研部门与民用科研部门各自分割、自成体系,缺少必要的交流机会和交流平台,成为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发展的重要障碍。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离不开军、民技术知识转化或溢出,需要密切军工和民用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提高军民企业、机构的区域集中度,通过集群化发展方式,加强军民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交流合作,推动军民技术融合,促进国防工业创新发展。

3. 基于应对多变市场

产业是否集聚与产品的市场状况密切相关,企业区位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市场需求、产品差异化等因素的影响。从市场需求来看,如果市场需求相对稳定,那么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就相对稳定。相反,如果产品和技术需求瞬息万变,产品研制和生产的速度就要提高。为了减少协调、沟通、反馈的交易成本,供需企业或者配套企业之间就会选择地域上的临近,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应对市场变化需求。从关联市场来看,根据赫希

曼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理论,企业的发展会涉及到前向、后向产业,因此,为了减少市场进入的难度,关联性产业倾向于区域集中,这样能有效扩大和巩固产业的关联优势。

国防工业任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风险。国防工业产品尤其是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周期内技术不断进步,在研制过程中外部威胁不断变化,技术和需求的不确定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但同时,武器装备需求呈现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和多变的趋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大批量定制成为一种趋势;另一方面,产品功能、性能日趋复杂化,制造链条长,涉及越来越多的环节,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工序型企业,过程日趋复杂化。任务可分性和技术可分性,为集群化的分工合作提供了可能。通过集群化发展,实现军工企业(特别是军工核心企业)与民用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军工企业可以从事能够充分发挥其核心能力的任务,而将其他非核心环节外购或者外包出去,提高组织生产的灵活性,加快国防工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提高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性,降低开发、生产、维护的费用,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二)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实现,不仅离不开内部动力,而且离不开相关的外部因素的助推。

1. 区位优势作用

国防工业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地域根植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变革,我国国防工业布局呈现出鲜明的集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提供了区位优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型工业区形成。“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个毫无疑问的”^[10]。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指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也

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11]这一时期是国防工业的初建阶段和布局调整期,经过充分论证和联合设计,通过宏观纵深调整,国防工业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实现了相对集中,形成了多个综合性工业区。

三线建设时期新兴军工城市兴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军工企业按照“靠山、分散、进洞”原则,分散在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生活不便的偏远地区。^[12]各军工企业自成一体,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局面。但与此同时,我国集中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建立了以多个三线城市为中心的航空、造船、常规兵器等工业基地,尤其是形成的多个军事工业基地和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军工城市为中心的国防工业集聚度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后集群化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被分成了成功、比较成功和需要“关、停、并、转、迁”三类,并根据要求进行整改。这期间,全国约有2/3三线军工企业进行了搬迁或者就地改造,大量的军工企业进入了大中城市,国防工业发展呈现出由“点”到“线”到“面”的趋势,集中发展趋势明显。随着我国军民融合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军转民”企业和“民参军”企业通过分包、外包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网络。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配套企业、科研院所及相应的中介服务机构不断聚拢,相应的生产、交易、营销网络初现雏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工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和完善,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奠定了区位优势。从集群化发展现状来看,有大量的集群都是在原有国防工业集聚区域基础上产生的。

2. 相关政策推动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具有典型的国家主导特征,国家有针对性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成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特别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也成为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

重要动力。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发展,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有关法规政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这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和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发展,确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明确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布局。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指导军民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目标任务。为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部署,制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就“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和“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用单篇单章进行总体部署,颁布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行了专门部署;颁发了《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协同创新的意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对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特别是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

与此同时,各省、市、区和有关行业部门为响应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号召,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就有关区域、行业、部门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作出了部署,并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和集群化发展作出了部署,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善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特别是集群

化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助于更好地驱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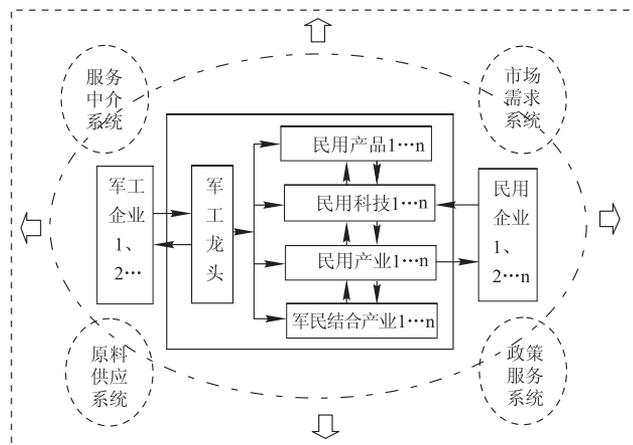
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实现模式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实现模式。为加快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结合我国国情可采取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军民融合基地孵化培育、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等模式。

(一)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是指兵器、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工业等军工行业内某一大型骨干企业凭借其产品规模、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将大量分散的具有技术、产品等关联性特征的军工、民用企业集聚在某一空间区域,通过军民交融、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等形成“中心——卫星式”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模式(见图2)。

图2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



由图2中可知,通过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的内在机理是:带动能力强、产业规模大、产业链条长的龙头军工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关键性技术的衍生、裂变或者被模仿,产生民用科技、民用产品,并将其商品化、规模化、资本化裂变出军民结合产业和军工关联民用产业→在形成一定市场需求、规模效应的基础上,相关专业的军工、民

用企业向核心龙头企业集聚, 形成集聚之势→随着众多军民企业的集聚, 区域内的市场需求体系、原料供给体系不断完善, 服务中介系统和政府服务系统推动作用不断增强, 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 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网络逐渐形成→在专业化合作网络基础上, 各军工企业(机构)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区域内的生产网络和社会网络不断巩固, 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不断增强, 军民融合的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区域内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军民交融不断增强, 进一步推动军民企业、机构的深度融合, 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水平与质量的不断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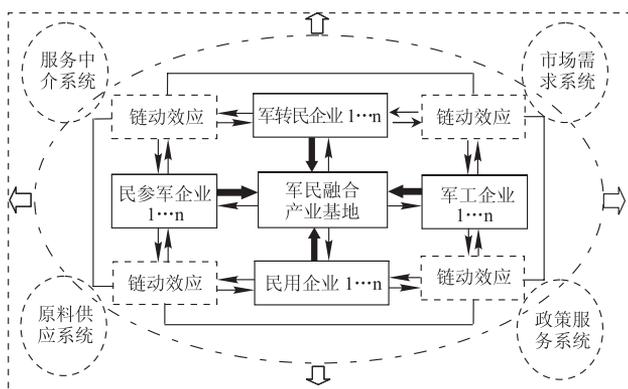
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模式的核心是龙头企业的强大带动力和军工企业向民用领域的广泛延伸和深度融合因而需要着力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改变军工企业“大而全”的生产模式, 提升产业裂变和衍生效率, 对配套技术、配套系统进行分解、外包, 扩大与民用企业的合作范围, 重点培育核心能力, 加快催生民用航天、民用航空、民用船舶、民用电子和核电站等军民结合产业或军工关联民用产业的裂变效率。二是提升龙头军工企业的牵引能力。龙头军工企业应该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延伸和市场的扩张, 借助集群网络中的技术产品转让、合作生产、联合攻关、资产重组等环节, 充分发挥其科技、设备、人才等优势, 积极解决上下游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技术、人才、资本等问题, 协助中小企业突破关键设备、关键材料、关键器件和关键软件等瓶颈, 不断提升民用产业的高新技术含量和水平。

(二)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和军工管理部门引导, 鼓励军工企业或军工关联民用企业进入地方产业基地(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等)。通过产业基地内军工企业军转民、民企“参军”及军工和民用企业协同创新和生产合作等方式, 逐步延伸和健全军工产业链条, 构建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系统, 形成以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为基础培育转化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模式(见图3)。

由图3可知,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的内在机理是: 鼓励、引导和支持军工产业、民用产业广泛进入各类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发挥基地在基础设施、公共平台、政策条件方面的优势, 推动区域内的军工和民用产业之间实现技术双向流动、人才互动交流、信息互动共享、生产设备共用、共同拓展市场, 增强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间的联系, 形成同行业的竞争合作关系→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 进一步提升军民产业之间的融合层次和水平, 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军民融合集群网络→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 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和民用产业的发展规模、水平、质量和效益。

图3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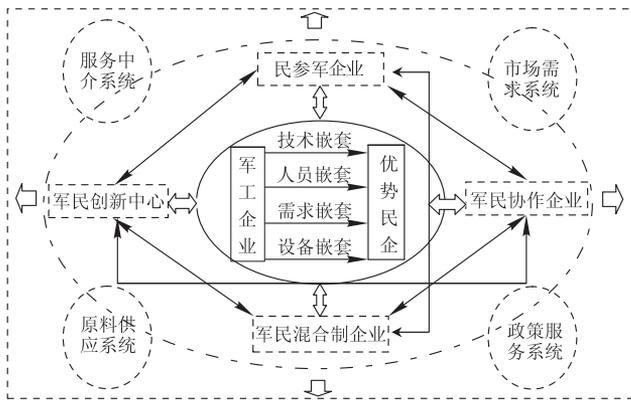


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的核心是军民企业机构区域集中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 因而需要着力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扩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对民用产业的开放程度。进一步规范基地的准入制度, 维护成员之间的公平竞争, 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鼓励和支持民用产业广泛参与国防工业军品及其分系统、配套件等科研生产、供应和服务等经营, 保证军民企业在技术装备、设备、设施、材料等要素使用上的公平权益。二是鼓励民用产业与国防产业通过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联系, 实现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不仅要实现距离上的集中, 更需要加强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 找准发展优势, 构建核心能力, 建立集约发展、联动发展和互补发展的稳定的共同体组织。

(三)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是指军工企业围绕着大型民用企业,在一定区域内衍生出军民结合协作企业、军民融合创新中心、军民混合制企业和军民融合技术、产品,通过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军民企业和机构在优势企业周围集聚,通过产业链条的连接构建稳定的集群网络,形成以优势民用企业为带动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如图4)。

图4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形成机理图



由图4中可知,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的内在机理是:军工企业通过军民技术嵌套、人员嵌套、设备嵌套、产品嵌套等方式,将部分产业嵌入到优势民用企业中→通过融合发展不断衍生出以国防工业(企业)为纽带的军民协作企业、民参军企业、军民混合制企业、军民创新中心等企业群,形成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区域内军民融合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更多军民企业和机构向核心企业集聚,从而健全基于公共协作的产品链和基于共同利益纽带的价值链→产业集聚产生专业化分工效应,进一步促进集聚区内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功能集聚,使集聚区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竞争与合作效益、创新网络和技术学习等优势→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产业深入融合,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和民用产业的发展规模、水平、质量和效益。

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民用企业的优势带动和企业机构之间的融合互动,为此需要着力抓好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注重政府的培

育和支持。由于在我国“民参军”起步较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和发展规模的“民参军”企业还不是很多,相对于前两种模式而言,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型集群化模式发展较慢,因此,这种模式的集群化可以通过进入国家已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各类工业园区等方式形成,借力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优惠政策。二是知识、技术的扩散和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作用。需通过推动知识、技术等创新成果不断扩散,并依靠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拉动作用,促进区域内的企业和机构构建稳固的专业化的集群网络。

这三种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模式,并不相互排斥或者独立,可以实现同时发展或者相互转化。其中,军民融合基地培育转化模式具有“自上而下”“由块到面”的特征,是当前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的最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最便捷的途径。除了这三种模式,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依靠重点项目或者资金链条牵引的柔性(项目终止、任务完成后集群就解散)发展模式也是集群化发展的可行途径。

四、结语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将具有关联性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及机构进行空间集聚,推动集群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合作和竞争,改变国防工业发展“军民分割”的现状,形成军品与民品科研生产和军工与民用产业发展相互兼容、开放共享和协调互动的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是由核心主导系统和辅助促进系统等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的实现,需要遵循集群形成的一般规律,同时还需要相关因素的驱动,包括基于空间集聚优势、知识溢出效应、应对多变市场等内在动力和基于区位优势作用、相关政策推动等外部推力。为了加快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可结合我国国情采取军工龙头企业牵引发展、军民融合基地孵化培育、优势民用企业带动发展等模式。国防工业是高科技产业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最重要领域。充

分发挥军民技术和产业优势, 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 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国防工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军民融合发展质量效益, 而且有助于加快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和促进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因而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集群化发展探索。

参考文献

- [1]杜人准. 不断提高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11-02 (5) .
- [2]兰天. 产业集群化评价研究[D]. 沈阳: 东北大学, 2009.
- [3]邱爱莲等.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 46-52.
- [4]杜人准. 国防工业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系统及其构建[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 (5): 113-120.
- [5]阿尔弗雷德·韦伯. 工业区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6]郭克莎. 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趋势、作用和战略[J]. 产业经济研究, 2005 (5): 1-13.
- [7]Coffey, W.J and Shearmur, R.G.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 1981-96[J]. Urban Studies, 2002 (39): 357-378.
- [8]Audretsch, D.B and eldman, R & D-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 630-640.
- [9]Keller, W (200)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7509, Cambridge, MA.
- [10]Von Hippel, E (1994) 'Sticky information and the locus of problem solving: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40, 429-439.
-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723-724.
- [12]兵器工业部. 光辉的历程[M]. 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 1986: 93.
- [13]刘世庆. 国防科技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战略转型[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6): 130-133.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Cluster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Du Renhuai Shen Yue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The clustering development mode focuses on three major aspects: the tract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military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cul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ode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bases,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advantageous civilian enterprises.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lustering; Power; Mode

建立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研究

刘硕扬 张健光

摘要: 现有授信方式导致的“信用歧视”是民参军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源,通过基于应收账款规模提升授信额度、基于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提升信用评级、基于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提升融资能力,重构金融系统与民参军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可以有效消除“信用歧视”,解决民参军企业融资难题。因此,要以满足民参军企业融资需求为目标,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融资机制,打造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

关键词: 军民融合; 应收账款; 授信增信

中图分类号: F426.48,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106-06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金融支持军民融合发展也驶上了快车道。金融支持军民融合的方式有政策性金融、内源性资本、银行贷款、保险资金、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民参军企业面临着自身融资策略反向、银行逆向选择、贷款到期再融资难等融资障碍(Besancenot和Vranceanu, 2006; 宋海云, 2010)。在实践中,参与军民融合的企业,特别是主要从事军品配套的中小民营企业也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遭遇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近年来,供应链金融成为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重要方式(丁振辉, 2015),基于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存货抵押的供应链金融是主要方式(孟玉龙、布海力切木·阿吾冬和洪艳, 2016; 谢世清和何彬, 2013)。建立基于应收账款的军民融合授信增信体系有利于创新供应链金融应用模式,有效解决民参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为金融支持军民融合发展,特别是支持参与军民融合的中小民

营企业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和模式。

一、“信用歧视”是民参军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源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早已成为普遍问题。民参军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也最需要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问题高度重视。国务院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然而,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第三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小微型企业的贷款审批指数分别为44.6%、44.0%和47.7%,连续三个季度一直保持在50%以下,反映出银行贷款审批一直保持较高要求,银行机构的贷款难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民参军企业除具备中小企业特点外,还存在保密性等问题,信息不对称加大导致融资难度更大。目前,金融机构授

作者简介: 刘硕扬,女,天津人,经济学博士,武警后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防经济学;张健光,男,山东临沂人,管理学博士,武警后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

信方式使得一些民参军企业在获得有效的军品订货, 急需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也较难获得银行授信。由于缺乏向民参军企业授信需要的特殊评价体系, 直接导致民参军企业强劲的金融支持需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之间的冲突。由于缺乏有效协调商业银行获利性要求与民参军企业配套资金保障需要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 直接导致一些民参军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遭遇资金紧张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 其根源在于没有建立起适应民参军企业需要的授信增信体系。

导致这一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信用歧视”。所谓“信用歧视”, 是指在我国现有金融信贷体系内, 银行等金融机构多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授信, 这使得缺乏固定资产同时信息披露不足的民参军企业, 面临无法从银行获得授信或者授信不足, 融资成本也在这种背景下激增的情况。正是由于“信用歧视”的存在, 造成了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了“货币分离”问题。一方面, 国有商业银行更愿意将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于具有国家背书的国有大型军工企业, 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并非全部都是最需要金融支持的企业; 另一方面, 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民参军企业却由于“信用歧视”的存在而无法得到金融系统足够的资金支持。长此以往, 矛盾不断积累, 民参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顽疾,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

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和信贷管理模式框架内以及金融科技手段创新不够的条件下, “信用歧视”的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

从金融系统内部来看, 导致“信用歧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内在属性以及与这一内在属性密切相关的风险评价体系。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 我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不是政策性银行, 而是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并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的和发展动力的企业。因此, 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必然具有自身的商业性约束。这些约束主要包括风险约束、体制约束、成本约束、存款约束和能

力约束。在上述五重约束中, 对传统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约束力最强的是风险约束。风险约束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国金融机构对于企业风险的评价体系存在缺陷。过于注重不动产抵押和政府等第三方的信用担保, 必然会得出民参军企业信用不如大型军工企业的结论, 加之由于保密制度限制、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控制规定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 更是难以对民参军企业的信用情况做出准确判断, 使得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时所能掌握的民参军企业真实经营和信用状态与金融机构监管、风险控制和考核激励机制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 以致产生“信用歧视”。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 风险约束还表现为民参军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民参军企业对信贷更高的依赖程度。在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民参军企业比大型军工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更高, 同时具有较强的依靠贷款进行扩张的冲动。其次是军品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会可能使得民参军企业的还款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增加了金融机构对民参军企业信用评价的困难, 另一方面也加重了金融机构对民参军企业信用情况的担忧。再次是由于银企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对于民参军企业的违约风险更为关注。由于保密等因素的制约, 金融机构获取民参军企业的有关经营数据的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民用企业, 金融机构往往难以获得评价军民融合企业信用最重要的财务数据, 尤其是现金流、负债率、净资产等关键数据, 即使开展现场尽职调查, 也往往无法取得可靠的数据, 缺乏足够信息对企业信用做出评价。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对军民融合企业的违约风险更为担忧。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引起“信用歧视”, 导致金融机构对民参军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等问题。

要真正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国家战略, 从根本上解决民参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就必须正视客观存在的“信用歧视”问题, 采取有效手段, 创新民参军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重构金融系统与民参军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 有效消除“信

用歧视”。

二、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可消除“信用歧视”

注重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在信用评价中的地位作用,赋予民参军企业信用融资以全新的时代内容,是挖掘民参军企业信用资源,服务民参军企业发展,助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有效方法。信用评级是反映受评对象的违约概率或违约的损失率,金融机构对民参军企业的授信规模和期限会以其信用评级为基础。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是企业之间经营性融资的重要内容。作为变现能力强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民参军企业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为提高金融机构对其评级提供信用增级支撑。此外,应收账款也可以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创新民参军企业的融资方式。这是因为,民参军企业的应收账款,是企业在获得有效的军品订单,并按照合同完成所承担的军品任务的情况下,应收(应收即为未回收的部分),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暂时没有收回的账款。这种应收账款实际上是以军队信用作为背书的。这是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与一般民用企业应收账款的最根本区别。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使得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通常不会出现不能收回,形成呆账、坏账等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其授信增信的现实基础。构建这种新型的授信增信体系,是解决“信用歧视”的有效方法,可以切实为民参军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一) 基于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规模提升授信额度

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反映了其未来的应收账款现金流规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应收账款规模越大民参军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综合授信额度是指银行为客户核定的短期授信业务的存量管理指标,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民参军企业可便捷地循环使用银行的短期授信资金,从而满足客户

对金融服务快捷性和便利性的要求。开户银行可以用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规模乘以风险系数确定提升民参军企业的综合授信额度或给予特别授信额度,也可以根据每笔应收账款的业务性质和客户信用情况给予民参军企业收款便利融资。如果用 s 表示应收账款规模, r 表示某民参军企业的应收账款风险系数,则可以通过应收账款提高的授信额度为:

$$LOC=s \times r \quad (1)$$

其中, LOC 表示信用额度, s 和 r 分别表示应收账款规模和风险系数。其中 r 可以通过对应收账款波动率、周转率和收款政策等综合确定。应收账款构成复杂,涉及期限结构、信用等级结构、管理政策结构等多种分类。每一种类的应收账款,其变现能力都有一定差别,影响着企业信用等级。应收账款波动程度反映了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和管理水平的稳定性。信用评级时,利用连续数月至几十个月的应收账款数据,可以计算其应收账款规模的方差和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方差。应收账款波动程度越大其信用风险越大,金融机构能够根据应收账款波动程度确定信用等级增级程度。

为了更准确反映不同类型应收账款风险,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应收账款来源的不同性质和类别,按照分类确定授信额度,从而提升民参军企业融资能力。即:

$$LOC=\sum_{i=0}^n(s_i \times r_i) \quad (2)$$

其中, LOC 表示综合授信的信用额度, s_i 和 r_i 分别表示第 i 类应收账款规模和对应的风险系数。

(二) 基于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提升信用评级

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反映了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和民参军企业的应收账款综合管理水平。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应收账款变现能力越强。金融机构可以使用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指标确定不同债务融资期限的信用等级区间,针对不同区间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民参军企业给予相应的信用评级增级。不同行业民参军企业的应收账款存在一

定差异,但从信用等级的角度看,这一影响因素可以忽略。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能够直观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度,便于制定信贷政策。因此,金融机构对于民参军企业可以按照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作为提升民参军企业的信用评级依据,例如,可以把60天、120天、180天、270天、360天作为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分级的一个标准,每个等级给予民参军企业不同的信用增级或增加一定的授信额度。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倒数乘360,是一年内应收账款总额的全部变现次数。金融机构给予民参军企业授信额度时,可以综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企业规模和经营风险确定信用增级或授信额度增加。即:

$$LOC=t \times l \times o \quad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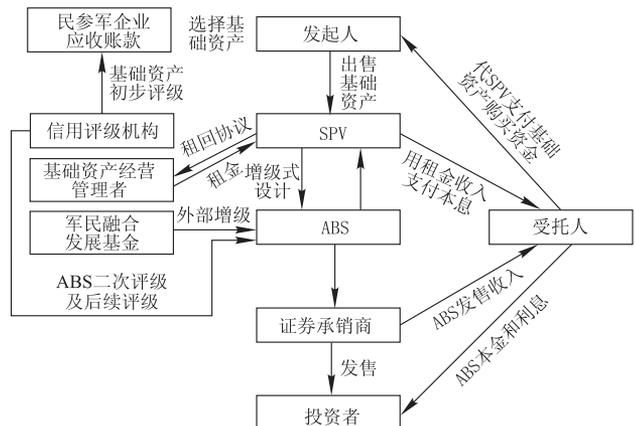
其中,LOC表示信用额度, t 表示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l 表示资产规模或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o 分别表示民参军企业经营风险。

(三) 基于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提升融资能力

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大,波动程度小时,比较适合采取证券化模式融资,这也是提升民参军企业融资能力的一种创新方式。应收账款证券化应选择利息收入足以支付抵押证券的利息支出、具有抵押价值和清偿价值、还款条件明确的应收账款。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证券化的交易过程可以分为八个步骤:第一步,由民参军企业作为发起人,选定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从具体持有单位中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形成基础资产池;第二步,民参军企业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公司转移资产,在法律形式上构建“真实出售”;第三步,信用评级机构对基础资产进行信用初评,SPV通过内部或外部方式进行信用增级;第四步,信用评级机构对基础资产进行信用增级后的信用进行评级;第五步,运用谈判或招标的方式寻找合适的承销商,委托其代为发售应收账款支持证券;第六步,支付对价。应收账款支持证券发行成功后,SPV利用发行收入向民参军企业转让方(即发起人)支付购买的价款,以及各专业中介

机构的费用。第七步,民参军企业根据与SPV签署的作为服务商协议,管理好应收账款,按照要求向SPV支付利息,以便SPV有足够资金向投资者支付本息;第八步,SPV委托受托人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具体流程可由图1表示。

图1 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典型交易流程



发行应收账款证券化产品时,可以采取破产隔离、划分优先证券和次级证券、金融担保等方式提高应收账款证券化资产的信用等级。信用增级是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发行成功率的必然选择。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证券化除可以用企业集团内部增级外,外部机构增级将会大大提高信用等级。当前政府机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机构等设立了各类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民参军企业以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发行债券时,可选择各类军民融合发展基金作为担保。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政策性强、规模大,以此为基础作为应收账款证券化外部增级的资产将会十分有效。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相关企业也可以作为信用增级机构,可以根据实际发行规模确定增级机构。

三、构建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的路径

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可以彻底打破金融机构原来主要依托抵押担保作为对

民参军企业授信依据的做法,真正实现风险定价和风险分散,注重企业应收账款在民参军企业信用评级中的地位作用,消除“信用歧视”。这种模式不但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而且可以有效解决民参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以及轻资产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和质押物,从而导致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问题。同时,这种方式还可以对民参军企业产生强大约束作用,提高企业违约成本,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支持。建立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以民参军企业融资需求为目标

金融机构要响应中央号召,牢固树立起为中小企业特别是民参军企业服务,把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性融资需求作为金融机构发展的第一要务的先进理念,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全心全意为企业排忧解难之忧,解融资贵之虑,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可以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对民参军企业资金需求、信用结构以及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帮助企业及时获得资金支持。既满足民参军企业的需求,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的效益,同时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有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 以重塑民参军企业信用评级结构为重点

导致“信用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金融机构对授信企业信用评级结构存在着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重单一评价,轻综合评估等缺陷。因此,要真正消除“信用歧视”,就必须重塑企业信用评价的结构。应把民参军企业的应收账款纳入企业信用评级结构中,打造既重有形,又重无形,既重现有资产,更重综合资产的独特的民参军企业信用评级结构。比如,在分析研究企业数据时,要注重利用企业提交的数据、互联网采集的数据、自身分析得出的数据和企业团队访谈得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不但要注重民参军企业的抵押物价值等因素,更要注重企业的应收账款的状况,保证对企业信用评价的科学性、完整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又比如,在构建基于应收

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时,不仅要重视对企业有形资产的评价,还要重视对企业的企业家精神、道德风险以及信用历史等一些传统评价手段难以量化评价的要素进行精准评估。通过这种新型多维度、全方位企业信用评级体系的构建,打破原来主要以抵押物作为贷款依据的企业信用评级模式,为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建立提供基础支撑。

(三) 以融资机制创新为手段

机制创新是推动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的关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民参军企业应收账款授信增信体系融资机制构建。一是要构建与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相匹配的风险定价系统,并通过这一系统,着重构建起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的风险定价和风险分散机制,并依照市场规律和企业情况,为企业制定个性化的基于应收账款的授信增信融资方案,从行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道德风险、信用历史及企业家精神六大维度对企业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同时针对应收账款融资的特点,采用互联网技术高效验证贸易真实性。二是以信息平台为技术支撑,构建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管理系统,并通过这一系统,完成民参军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用传导机制建设。三是构建网络借贷服务系统,完成以充分披露为主要措施的企业信用约束机制建设。通过融资机制创新,为民参军企业及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风险可控的融资服务。

(四) 以发挥金融科技作用为支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有效发挥支撑军民融合发展作用的第一推动力。要把金融科技运用到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构建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以金融科技为支撑,打造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云平台,实现融资自动化、智能化、数据化、电子化。开发针对民参军企业融资的电子账户体系,打造基于供应

链的授信模式, 实现供应链整体授信控制、信用主体与融资主体分离以及融资现金流与经营现金流的配合。金融科技手段的有效运用, 可以为基于应收账款的民参军企业授信增信体系建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 [1] 龙红山. 扎实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J]. 国防, 2015(6): 10-12.
- [2] 董小君. 军民融合融资模式: 从财政主导到多元化资金支持[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2): 87-92.
- [3] Besancenot D, Vranceanu R. European Defence Firms: The Information Barrier On Private Finance[J].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06, 17 (1): 23-36.
- [4] 宋云海. 准入国防工业的民营企业的融资壁垒[J]. 军事经济研究, 2010(5): 14-18.
- [5] 丁振辉. 供应链金融的国外文献综述[J]. 华北金融, 2015(4): 4-7.
- [6] 孟玉龙, 布海力切木·阿吾冬, 洪艳. 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与优势[J].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16(6): 31-34.
- [7] 谢世清, 何彬. 国际供应链金融三种典型模式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4): 80-86.

A Study on the Issue of Establishing Credit System for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Based on Accounts Receivable

Liu Shuoyang Zhang Jianguang

Abstract: The “credit discrimination” caused by the existing credit granting method is the root that leads to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the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By increasing the credit line based on the siz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improving the credit rating based on the turnover rat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securitizati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ssets, it is effective to reconstruct the cred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and eliminate “credit discrimination” as well as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the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meet the financing needs of the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 to create a credit-granting and credit-increasing system for civil-inve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based on accounts receivable.

Key words: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Accounts Receivable; Establishing Credit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刊,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老图书馆21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其他约定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超星域出版平台”等数据库,并授权网络合作方使用本刊稿件。不愿通过网络媒体发布者,请在来稿中注明。